



南京

史志

国内外发行

特大号



大亚山堂主朱亚雄

奋斗者的足迹 左笔画家傅小石

张恨水金陵轶事

汪伪警卫三师起义前后

南京营造业和「四大金刚」

洪水无情 人有情

南京抗洪抢险纪实

端纳其人其事



NANJING LOCAL HISTORY

1991年第6期

CN32-1024

洪水无情人有情



《新华日报》记者王广林
在江苏察看灾情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王广林摄
机场换乘直升飞机察看灾情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南京



(详见本期介绍)



▲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南京市委书记顾浩在江浦县看望受灾群众

《南京日报》记者高明伦



▲ 江宁县土桥乡6000多名干部群众日夜奋战在河堤上

《南京日报》记者刘小元

▶

数千名军民战斗在六合县龙池乡滁河险堤上

《新华日报》记者于惠通



▼ 公安干警在水中指挥交通。 刘小元



▲ 高淳县干部群众在奋力抢险
《南京日报》记者蒋逸明

南京举办凡高画展



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胡序健、副市长沃丁柱、荷兰驻华大使共同举杯祝贺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剪彩



荷兰王国大使馆
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南京市文化局
南京市博物馆

主办



农夫(1888年)

蓝色的鸢尾花(1888年)



丁卫摄影

中统特务是怎样监视中共代表团的.....一 发 27

始创时的晓庄师范和冯玉祥.....邵仲香 12

初访冯玉祥.....赵纯继 24

孙中山三临黄埔军校.....冷春煦 10

朱德过宁属前后.....扶 昌 35

对诺那呼图克图的几点补充说明.....赵家璧 33

· 神州风云 ·

南京市抗洪抢险实录.....曾向东 战学平 4

四十年来外国首脑访华录(之四).....郑永喜 蒋永才 36

汪伪警卫三师起义前后.....范长琛 31

· 古都研究 ·

六朝古都建康的都城位置新探.....「日」村圭尔 21

· 南京经济 ·

南京营造业和「四大金刚」.....刘 凡 76

新型建材 方兴未艾.....陈 雷 73

蓬勃生机的玄武区市政管理所.....玄武区管理所 72

消费者投诉纪实.....叶 舟 28

· 方志研究 ·

寓褒贬于事实之中.....周其高 65

程嗣功与《万历应天府志》.....王桂云 66

· 建康风情

瑰丽多姿的金陵绒花.....牧咏南 25

三十年代南京的人力车行.....许自强 71

· 白门掌故

朱德赠蒋介石战马.....田秋平 14

汪精卫做寿生悲.....远 秋 47

· 志苑信息

「热爱南京 振兴中华」知识竞赛获奖名单.....竞赛办 59

1992年全国地方志刊物联合征订.....50

《南京史志》1991年总目录.....78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编辑部主任 庄淑玉 国外代号 BM 四一八六

副主任 汤惠兰 国内发行 本刊发行部

责任编辑 董宁宁 电脑照排 南京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电脑部

卢海鸣 广告许可证 宁广字第五六号

胡星侠 全年订价 7.20元 本期定价 1.20元

李哲民 地址 南京市政府大院

邮 码 210008 1991.11.10出版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

史志

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总第五十期)

顾问 郑风翔 张治宗

姚文烈

主 编 王能伟

常务副主编 陈济民

南京

· 人物春秋 ·

记左笔画家傅小石·····	董克信 7
左右逢源的大亚山堂主朱亚雄·····	程堂发 15
张际春中原军事生涯·····	王宗伯 高成林 19
范鸿仙与南京光复·····	方 晓 34
张恨水金陵轶事·····	刘 元 44
华罗庚的启蒙老师·····	安士才 51
端纳其人其事·····	季智洲 12
左宗棠在南京的治水活动·····	张其立 57
寓居如意桥的程廷祚·····	凌 昕 54
近世南京一怪——汪士铎·····	陆霄鹏 23
· 秦淮杂忆 ·	
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选定梅园新村经过·····	王德裕 施善萍 69

· 白下艺文

文天祥赋诗诀列金陵····· 于 江 67

· 金陵文教

周兴嗣妙著《千字文》····· 朱 明 62

聚珍书局始末····· 徐 苏 30

· 争鸣园地

《西洲曲》之西洲在金陵····· 魏芝波 袁亮 52

也谈江南贡院的最后一次乡试····· 张铁宝 61

· 江东文物

稀见的青花萧何追韩信图梅瓶····· 葛玲玲 55

南京六朝墓葬的分布及其特点····· 华国荣 74

东晋史学家谢沈的六面铜印····· 李光斗 49

「辛亥革命」瓦檐····· 韶 华 46

· 县镇专栏

高淳县淳溪古镇的建筑艺术····· 陈翼雄 63

六合文庙····· 朱振堂 60

· 地名探源

苜蓿园与红花地····· 陆永贵 43

梅园新村一名的由来····· 慰 仙 45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体育明星在南京举行赈灾签名活动 朱平摄



南京市医务工作者走上街头赈灾义诊 朱平摄

从6月中旬以来,南京市连续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袭击,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全市百万军民团结抗洪,终于保住了铁路、机场、重点工矿企业、城市和主要湖库堤埂的安全。

雨 情

今年以来,南京市天气极为反常,雨水一直偏多。从1月份截止7月18日,降雨1286~1522毫米,已超过正常年份一年的降雨量。特别是5月21日入梅以来,全市已多次遭受暴雨和特大暴雨的袭击,我市梅雨日56天,累计降雨931~1189毫米,梅雨量比正常年份多3~4倍,雨日之多、雨量之大、范围之广,为历史罕见,居全省首位。其中江宁县降雨1189毫米,是全省同期内降雨量最多的两个县(兴化、江宁)之一。全市主要暴雨过程有三次:第一次是6月13日至6月16日,4天累计降雨量为197~402毫米。其中溧水县24小时降雨量221.6毫米;第二次是6月30日至7月7日9时,8天累计降雨量213~403毫米。第三次是7月9日至11日,3天降雨量190~230毫米。其中城区1天降雨量达152毫米。

水 情

连续的大雨和特大暴雨,使南京市江河水位猛涨。滁河、秦淮河、句容河、溧水河及高淳县的胥河水位都相继突破历史最高洪水位,固城湖、长江的水位也都超过警戒线。

江北的滁河流域,滁河水位关系着津浦铁路的安全,历来是南京市防洪的咽喉要地。今年汛期晓桥水位两次突破历史最高洪水位,6月14日18时达

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南京市抗洪抢险实录

曾向东
战学平



省武警总队战士在高淳县抗洪抢险 蒋逸明摄
12.33米,超过历史最高洪水位0.26米;7月10日又升至12.63米。6月14日上午,津浦铁路因路基出现了100多米的塌方,下行线列车运行被迫中断58小时,滞留在南京站的旅客一度达10万人以上。

江南的秦淮河流域:6月14日18时,句容河土桥水位达14.12米,超过历史最高洪水位1.08米。6月13日,溧水县城淹水,最深处1.5米以上。6月14日,高淳县的胥河1天内水位暴涨3米,超过历史最高洪水位,桡溪镇街上最深处积水1.7米。7月9日23时,固城湖水位达到12.07米,超过警戒水位2.07米。

长江水位:7月7日凌晨,下关水位已超过警戒线;7月14日11时20分,下关水位已达9.69米,超过警戒线1.19米。

灾 情

连续的特大暴雨和洪水,给南京市工农业生产、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初步统计:全市遭受重灾17.4万多户,人口达61万多。全市破圩、漫圩24个,紧急转移2.36万户,人口达8万多。全市受涝农田面积500多万亩次(其中严重成灾120多万亩次),绝收40.9万亩;4.7万亩常年性菜地被淹,90%的棉田受淹,20万亩鱼池被大水漫溢,损失成鱼1300多万公斤,霉变损失小麦1亿多公斤、油菜籽1400多万公斤;冲毁水利工程1200多处;全市因灾有2000多家企业停产、半停产(其中市属以上150家);474所中小学一度被迫停课;市域范围内有21条公路被淹中断交通,公路路面被冲毁458公里;全市农村有60个乡镇所在地和548个村庄被淹,水深1米至2.8米;城区象房村、二道埂子、外关头等居民区进水最深处达1.7米。全市民房进水12.28万间,损坏民房7.07万间,倒塌房屋3.42多万间,死亡30人,受伤233人。城市道路、发电、制



在省文化厅主办的大型义演晚会上,新街口百货商店的全国劳动模范陶佩芬受职工委托向灾区捐款

朱平摄

煤、自来水、商店等基础设施以及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均遭到洪涝的袭击,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据初步统计,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以上,其中农村直接经济损失10.93亿元。除此外,因工厂停产、农作物减产绝收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仅工业就影响产值6亿多元,减少税利6200万元。全市在抗洪抢险过程中,还耗用了大量的物资。

抗洪抢险

组织指挥体系健全:市里成立了“防汛抗灾领导小组”和“防汛指挥部”,分别设在市政府办公厅和水利局,对一些重大问题及时进行研究处理。市委、市政府的15位领导及市顾委、人大、政协的领导分到县、区进行指导。城区组成了“城市防汛指挥部”,设在江苏路20号;各区、县也相应成立了防汛指挥部,加强对抗洪救灾斗争的集中统一指挥。各级各方面的防汛指挥人员昼夜值班,24小时保持信息通畅;市级机关各部门都相应建立了昼夜值班制度,局以上领导全部投入了与抗洪有关的工作。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各级指挥系统的工作联系,在市公安局、电信局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快速、高效、方便的电子通信系统。这一通信系统在抗洪抢险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县中医院医生在船上为灾民治病 章学泰供



南京内燃机配件三厂领导同职工在水中抢捞产品 哈耀奇摄

群众发动广泛：抗洪抢险斗争开始以来，全市动员和组织了 100 多万人力，直接、间接投入以“一江两河”流域为主战场的 2100 多公里防汛第一线。在农村，防汛抗洪主要依靠县、乡（镇）、村三级组织，动员了绝大部分农民和乡镇企业职工投入抗洪；在城市，则是由各区组织干部、职工、居民参加抗洪。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共计 13397 人，其中有 30 多位将军亲自带领部队，奋战在江河湖库堤坝为主的抗洪前线；工厂民兵 1 万多人，组成了召之即来的抢险队、突击队。此外，还组织了有 2300 多人参加的机关干部抢险队，作为后备梯队关键时刻投入使用。据统计，到 7 月中旬止，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 6.5 万人次；386 辆军车，3620 车次；58 条船，64 部电台，加固堤坝 31.6 公里，抢运物资 30409 吨，完成土石方 1.8 万立方，堵漏排险近百处，抢救转移群众 9638 人。人武部门出动民兵 47.7 万人次。

关键时刻炸堤分洪：为了确保津浦铁路安全，市委、市政府坚决执行国家防总的破坏路路决定。7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21 分，在解放军舟桥部队、其他驻军指战员和民兵的大力协助下，迅速撤离江浦县星甸镇的 1500 多名群众。中午 12 点 25 分，炸开小熊圩堤和孟家圩堤。炸堤后，圩内 6000 多亩良田一片汪洋，蓄洪总面积 12450 亩，分洪量达 4000 多万立方米，有效地降低了滁河晓桥地区水位，农民直接经济损失 600 多万元。

加强城市防洪：市里对位于江边的 6 座自来水厂逐一仔细检查，对其中上元门水厂存在隐患的防洪墙及时进行了加固。市供电局调节供电计划，对部分耗能大户采取限电措施，确保抗洪防汛用电。园林局对主干道上可能危及供电、通讯、电车运行的 1000 多棵人行道树作了紧急修剪。建工局抽调了 80

辆汽车，组织了 3000 人，作为城区抢险救灾机动大队。

社会募捐情景感人：7 月 8 日，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发出组织社会募捐的号召后，社会各界纷纷响应。仅 10 天，全市已募捐资金 510 多万元，粮票 325 万公斤，各类药品价值 40 多万元，各种麻袋、编织袋不计其数。全国各地有 20 多个省、市、地区和人民解放军驻宁各部队向南京市发来慰问电、慰问信，各地区和部队还支援了一批资金和物资。一些港澳企业、团体和知名人士、本市的一些三资企业也纷纷捐款捐物。各级政府对人民高度负责，及时对灾民的生产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市里已发放各类抗洪救灾资金 900 多万元、救济粮 240 万公斤、各类食品 25 万公斤、衣服 5700 多套，还组织医疗队赴灾区巡回医疗，使广大群众在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面前情绪稳定，增强了团结抗灾的信心，纷纷表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责任编辑 霁 明）

关于知识竞赛 有关试题的说明

1. 第 2 题中的市区与城区是不同的范围，市区包括郊区，城区不包括郊区。
2. 第 19 题正确答案为：李忠，因《简志》误印为“季忠”，所以该题两种答案都算对。
3. 第 46 题后半道正确答案是小卷阿，有个别书上误为“小巷阿”。
4. 第 53 题中的“1972 年”，应为 1979 年。 特此说明

一掬辛酸的泪 一曲奋斗的歌

记左笔画家



傅小石与本文作者

傅小石

● 董克信

“为什么他在海外和首都北京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抱着既敬佩又疑惑的心情去采访小石。时值石城的盛夏，在古城东北面一所普通公寓的底层，敲开了他家的门。

开门的是他的夫人王汝瑜。听我说明来意，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小石，立即起来相迎。他赤裸着上身，蹒跚地向我走来，伸出左手与我相握。

面前的小石，个子不高，显得有些清瘦，一双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唯有那不协调的动作，告诉人们，过去那些坎坷岁月带给他的种种不幸。我细看他的行动，果如刘海粟所言：“三肢失灵”。其实何止三肢失灵。他连讲话也很困难，别说他讲得吃力，就连我听起来也颇感吃力。以致他的许多话，不得不由他的夫人代述。

然而，有谁想到眼前这位有严重的残疾人（他现在是南京残疾人协会名誉会长），大学时代竟是戏剧舞台上的一名活跃的业余演员。那时，他扮演唐·吉珂德。骑在一匹“瘦马”（由两位同学扮演）上，一手举着盾牌，一手挥舞着长矛，勇敢地向风车冲去。最后落马折矛，摔倒在地。引得满堂捧腹大笑。当时，他年轻健壮。摔跤不当一回事，走下舞台，依然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

岁月如流，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还是让我的笔再回到过去，追寻一下他半生坎坷的历程吧！

丹青世家 艺苑灵童成才

小石 1932 年生于南昌。乃国画大师傅抱石之长子。由于家学渊源，从小智慧出众。两、三岁上认字，过目不忘。三岁那年，南昌举行儿童健康、智力比赛，母亲罗时慧带他去参加，面对陌生大人的种种提问，他竟毫不畏惧，对答如流。评选结果，居然荣获第二名。三、四岁上，他开始对画发生兴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那些东洋画册，成了他最喜欢的读物，当别的小朋友正在嬉戏玩耍的时候，他常常瞪着一双大眼睛，入神的在一旁观看父亲作画。有时候，还能给父亲当个小帮手，协助父亲烤画（因画的某些部分须要速干，以免洇漫开去）。

就这样耳濡目染，他也学着抓笔作画。不过那时父亲并不教他，他也只是随心所欲，任意涂鸦。就这样在涂涂画画之中，竟也领略了一点绘画的门道。

那是在他 9 岁的时候。一天父母外出。待父母归来，小石告诉父母有人来找。父亲问他来客是谁？他这才想起忘记请教客人的姓名。接着他灵机一动，将一只空烟盒翻转过来，在上面画了一幅来客的尊容，交给父亲说：“就是他。”父亲看到画中人的面貌特征，一下便认出来了：“啊！原来是老王。”（一位中央大学的同事。）父亲对母亲夸赞道：“这孩子日后比我能干。”

抗日战争时，他们全家逃难到四川，住在重庆金

刚坡,有一次,他们躲警报回来。看见三圣宫旁一棵黄桷树上绑着一个身穿黑衣、头戴礼帽的人。原来,他在地面上插日本太阳旗给空降特务作内应,小石见到后,对他十分愤恨。和小朋友们一起用石块砸他,吐沫唾他。到家后,他振臂画了一幅《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彩笔画,深得大人赞许。

10岁时,他与画家司徒乔的女儿司徒圆两人合作。由小圆写诗,他作画,共同出版了一本《浪花集》,为抗日捐献而作义卖。一时传为佳话。

小石不仅作画,还搞雕塑。也是10岁那年,他所上小学的老师,看到他的泥塑人物——唐·吉珂德,很有童趣,便将它拿去展览。

1953年,他在南京二中高中毕业,终于以语文和美术双优的成绩,考进了全国美术的最高学府——中央美术学院。为了更好地吸取外国美术文化的营养,他选择了以西画教学为主的版画系。

在班上,他不仅勤钻学业,而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受到同学们的尊敬,被推选为班长。

学业上,他是全校的尖子。当时,他的作品发表在全国专业杂志——《版画》上。他还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航空公司作广告画,系主任李桦夸他是高材生。院长、版画家江丰对他的父亲傅抱石说:“你儿子是个天才。”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小石春风得意之际,一场风暴袭来。

世途坎坷 横遭不测风云

1957年反右运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党委书记王曼硕(曾任过延安鲁艺教育长)首当其冲。他们的高足也未能幸免。小石在快要毕业之际,戴上了右派帽子,下放到京郊双桥农场去劳动。

虽然小石被迫离开了美术的殿堂。但他仍未放弃自己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逆来顺受,把艰苦的劳动当作深入下层,体验生活的锻炼。他一边劳动,一边注意观察,当时来不及画,就在下工之后,当别人躺下休息的时候,他不顾疲惫又开始投入创作,将劳动中细心观察记忆在脑海中的印象,一一画成素描,他一共画了几百张人物、景物的速写、素描。这些生活积累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农场劳动四年。1961年,小石被调到南京江苏国画院。不过,他到国画院不是去做画师,而是去当一名勤杂工。他在这里打扫庭院,采买、打杂,什么都干,就是没有画画的份。



天女献花 傅小石画

有一天,刘海粟到画院办事,经过庭院时,看见小石拿着大扫帚在扫地。这位仁慈的长者感慨万分,勉励他道:“坎坷是造就人才的大熔炉,遇到挫折,不要气馁……你要画呀!超过你爸爸,至少跳出他的樊篱,自立门户。”

小石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坚持着对艺术的不懈追求。白天劳动,晚上作画,往往通宵达旦。这期间,他创作了几幅很有灵气的版画:《虎丘塔》、《相见在天安门》、《黑人依期波尔》等,被省美术馆收藏。

60年代中期,小石较多的接触了国画,对国画的博大精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便转而改攻国画。攻国画,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父亲对他悉心指导显示了他国画创作的才华。1965年,他的国画山水《虎踞龙盘今胜昔》,在十竹斋举办的画展上受到好评。

同时,患难之中,他在本单位遇到了一位知音——王汝瑜。她当时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又很敬佩他为人忠厚老实的品德,常常在别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暗中帮他打扫卫生。小石为她的情义所感动。对

她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到1966年，两人终于结成伉俪。

正当他充分地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准备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的时候，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又向他袭来。

身陷囹圄 农场劳改折腿

尽管在“文革”中，小石并不参加两派之间的斗争，但仍难逃厄运。本来1968年底，他已被下放到泗洪劳动。可是到了1969年，又将他抓进看守所，拘留审查。他只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不满，曾骂过林彪和江青，这就成了地道的“反革命”，判处了他10年徒刑。

服刑最难熬的日子，莫过于在看守所。在那里，终日枯坐，不能随便讲话，不能随便动弹。然而，即使在那样的日子里，小石也没有忘记他的艺术。嘴不能动，手脚不能动，脑子可以动。于是，他的大脑便神游在艺术的天空里，他思考着有关图案学的规律，经过一年的看守所生活，一部《图案设计新探》的著作，便在他的脑海中初具轮廓了。

到了泗洪劳改农场，虽然劳动很繁重，白天干活，但晚上可以学习，10天有一次休息。他抓紧劳动之余的一切时间，将在看守所里的构思写成文章。那时的条件之差是难以想象的。没有纸，就拿手纸；没有桌子，就拿一块硬纸板放在大腿上。有时，他正专注地写着，忽然一个管教干部走到他的面前。不仅遭到严厉的训斥，有时还将写好的稿子被没收、销毁。遇到这种情形，他不得不再重写一遍。就这样，前后经过7年的呕心沥血，一部4万多字、图文并茂的《图案设计新探》，终于完成了。

后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张仃看到这本书的手稿，激动不已。他在为该书所作的前言中写道：“……小石勇于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披荆斩棘去开拓、去寻找艺术规律，为攀登艺术高峰，他怀有雄心壮志——我们需要这样的勇士。”

著名画家黄永玉看了他写的书以后，兴奋地说：“我认为这本著作，至少可以用五国文字出版。”

在狱中，小石除了完成这本美术理论专著以外，还不停地作画。他画劳动场景，画各种人物。大都是速写和素描。如将这些小品积累起来，数量当在千张以上。

劳动的繁重，创作的艰辛，都不曾压倒他。然而，一场意外的事故，却给他造成终身的残疾。



琵琶行 中国美术馆藏

那是1973年5月，一个春雨绵绵的上午，小石与另外两人，赶着一辆马车运送猪草。道路坎坷而又泥泞路滑。忽然马车朝左边一倾，将坐在高高草堆上的小石猛抛下来。正好又撞在路边大树一卡，他的左腿骨从膝盖以上折断，当场昏死过去。赶紧将他送到卫生所，大夫一看腿已断，吩咐转送场部医院。经过复位，打钢钉将断骨固定，整整三个月动弹不得。

这时，唯一能体贴他的，是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她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南京赶来探视，给他带来鸡蛋、粽子、老母鸡，带来纸和笔，更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

伤残是不幸的，但却意外地给了小石一些时间。腿断了不能走路，手还好，可以作画，他利用这一段不需要参加劳动的时间，在病床上画了大量的画。

出院后，腿跛了，他仍继续在农场劳动。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年——1977年11月，他提前结束了7年的劳改生涯。

雪上加霜 腿残又遭中风

当他光着头、瘸着腿，在深夜回到南京家中，见到年迈的老母，成长起来的弟妹以及患难相依的妻子，真是百感交集，恍如梦中。

三代同堂的居室里，架起一块木板。一支笔，一张纸，这就是他的全部天地。

他躲在自己狭窄的蜗居里，埋头作画。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的画上，他不得不用一个化名：“傅益钧”。但不管怎样，他总算可以作画了。他失去了太多的宝贵光阴，深知时间的可贵。于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

小石自60年代中期，改攻国画以后，便设想将父亲山水画的泼墨技法，运用到人物画上去。他深谙西画以色块的明暗来反映物体形态的奥秘，又深为古人，特别是宋代梁楷的减笔画法所折服。他在继承民族画法；吸收西洋画法以及乃父创造性画法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新的画法——没骨人物画法。这种“没骨法”，摆脱了传统的以线条勾勒画人物的方法。而代之以笔的轻重，墨色的浓淡来表现人物肢体与动态。

从1977年到1979年，他创作了《屈原和渔夫》、《钟馗驱鬼》、《蕉阴仕女》、《二娇戏鱼图》、《卖糕图》等一百几十幅作品。可惜这一时期的作品，后来大都被人拿到新加坡，流散在国外。现在国内，特别是在他自己手上的却很少。

喜极生悲。1979年2月3日，小石正在为一个姑娘画像。突然，省高等法院的代表来向他宣布：冤案平反。20年的抑郁胸怀，猛然间心花怒放。其势如火山迸发，过于羸弱的身体使他经受不住这一巨大的激动。当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往上涌，一阵晕眩栽倒在地，便不省人事。

送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脑溢血。经过脑外科手术，从脑中取出40CC瘀血，这才将他从死神手中夺回。但却落下了半身偏瘫的不治之症，整个右半身失去知觉，右手右腿完全动弹不得。

小石的左腿早已伤残，现在右手、右腿又瘫痪了。这雪上加霜的一击，几乎使他再也无法提笔作画了。

不幸中之大幸，是上帝还留给他一个思维清晰的头脑和一只不曾瘫痪的左手。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绝不肯向命运低头。当他昏迷将近一个月，醒来后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

还能作画吗？”他要妻子拿来纸笔，让他试试左手用笔。那时，他的身体还很虚弱，左手也很不听使唤。当他像小学生一样握住笔，画出一个很不像样的圆圈时，心里想到阿Q画圆的情形，不禁哑然失笑。

然而，他并不气馁，决心从零开始。

为了练习左手的臂力，他让妻子买来一只弹簧拉力器，不时进行锻炼。左臂有力了，再练习写字、作画。

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又拿起了画笔，给坐在病床旁的妻子画了一幅肖像。后来，他索性叫妻子在床上安放一块木板作画案，以病房当画室。有人来看他，他就给别人画像，没有人来，他就画护士，画病友。住院7个月，除去昏迷的那一个月以外，他就画了6个月。

祸福相依 左笔绽放新花

出院不久，即有人邀请他参加在鼓楼公园举办的“未名画展”。他当时很高兴。心想不能光拿过去的东西，还要拿出新作。于是，他拖着病残之身，以曾被摔断的那条左腿支撑着（现已成为他重要的支柱），奋力以左手作了两幅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和《美髯公朱仝》。这是两幅以没骨法创作的人物画。风格特异。过去画家一般只以没骨法画山水或花卉。因为人物造型比花卉、山水要求更精确。色块的掌握如不恰到好处，则可能画人不成反类怪了。所以用没骨法画人物，不仅要有大胆的构思，而且非有过人的功力不可。

通过这次画展，小石的没骨人物画被大家所接受，并且深得好评。人们为他的开拓精神所叹服。

这以后，小石便一直驰骋在没骨人物画这块新天地里，不断进取，画出了更多更好的作品在省美术馆、在扬州等地展出。

1983年12月，小石与他的弟弟二石，为促进内地与香港的文化艺术交流，应邀赴香港办画展，展览在香港最大的文化艺术中心——香港大会堂高座展厅举行。开幕式由香港著名画家郑家镇剪彩。香港中华商会及各大银行、各大公司、《大公报》、《文汇报》等60多个单位与个人赠送了花篮。

参观者络绎不绝。有一位意大利观众，站在一幅《女儿国》的画前，注目凝视良久。他从这幅画上仿佛看到了他的祖国——意大利的雕塑。于是便向站在一旁的小石夫人问道：“傅先生是不是到过意大利？”“没有，从来没有”。但他那里知道小石从小就喜欢雕

塑。以后,在他进行大型作品的创作时,往往先用橡皮泥捏成各种人物造型。摆出不同的角度,再参照作画,因此,使一些画具有立体感。

画展期间,林风眠等艺术家都去观看,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许多观众对小石的画,十分喜爱,不惜以重金要求割爱,但他坚持只展不卖。因此,许多人只得借助于临摹或照相了。

这次画展对海外的影响颇大,香港的十几家报刊和亚洲电视台都作了专题报道。《美术家》杂志刊登了他10幅作品。行家评他的画:构思奇崛,意趣高远,神采天成。

4年后,1987年9月,在母校——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和校友们的亲切关怀之下,《傅小石画展》在北京举行。他以比在香港办画展更增加一倍半的作品(香港展出40幅,北京展出106幅),奉献在首都人民面前。

画展期间,一些领导人,他父亲的挚友彭冲、钱昌照、曾涛、吴作人以及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胡风夫人梅志、著名画家潘洁兹、李桦、郁风、袁运甫、邓琳等都来参观。还有海外的一些艺术家,也专程赴京观赏。90多岁高龄的政协副主席钱昌照,看了画展,激动地一连说了三声:“真了不起!”

他的业师,著名画家黄永玉在为画展的题词中写道:“小石的作品呈献在同志面前。它的意义远在作品之上。”

美术大师刘海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文章:《勉小石》中写道:“对小石的画,不能用寻常的尺子去量。这是一颗热情的,不甘沦为平庸而虚度岁月的心,对祖国,生命,青春,历史,爱情,土地,平凡与不平凡的人们,唱出的赞歌,是生命和艺术战胜死亡,残疾(左手之外,三肢失灵)的丰碑……。”

首都美术报刊的记者和他母校的老师、校友专门为他开了“小石作品学术讨论会”。会上,大家给他以崇高的评价,说:“这次展览会是一首生命的凯歌”。说:“他的身体虽然又残、又弱,但在艺术上却是一个巨人”。甚至说:“小石不但是一个才子,而且是一个英雄。”

这是一部苦难的,满布斑剥刻痕的个人历史记录,更是一部他们整整一辈人的苦难的历史记录。

我敬佩小石的智慧和艺术的功力,他充实的文学修养、洞察事物的本领和难得的幽默感,更敬佩他的人品!他正以更大的努力,投入到新的奋斗中去……

(责任编辑 霁 明)

通贯金陵今古 纵览名城春秋

《南京史志》简介

《南京史志》本着“以史资政,以志育人”,宣传、介绍、研究文化名城南京为宗旨,着重为编史修志征集资料;为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做好城市管理、建设、古都研究提供阵地;为弘扬传统文化,介绍两个文明建设成就提供窗口,是立足南京,面向全国,具有资料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刊物。

主要栏目有:古都研究、石城变迁、史海钩沉、神州风云、人物春秋、三江揽胜、南京经济、金陵文教、科技踪掠、白下艺文、史志论坛、江东文物、建康风情、白门掌故等二十多个栏目,适合各层次读者的需要。

本刊为双月刊,逢单月10日出版,国内外发行。国内订阅:本刊发行部;国外订阅: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国内统一刊号cn32—1024;国外代号BM4186。国内订价每册1.20元,全年7.20元;国外订价每册人民币外汇券7元,全年42元。地址:南京市政府大院,邮编:210008

端纳其人其事



● 李智洲

看过电影《西安事变》的人，一定对其中的那位奔走于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之间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澳大利亚人端纳。

提起端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甚了解，稍微知晓的人也往往只是将他与“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其实“西安事变”时端纳的经历只是其在中国长达三十年的“顾问”生涯中的一小段落而已。作为一名二十世纪初来华的澳洲记者，端纳与中国近代史上极有知名度的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伍廷芳、王正廷、张学良、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都曾有较深的交往，且被视为上宾、谋士。这种经历在中国近现代来华西人中是绝无仅有的。笔者收集海峡两岸有关文史资料，大略讲述端纳在中国的部分传奇经历。

发迹起于酒 清民两逢源

1902年，端纳以悉尼《每日电讯报》通讯员的身份来到香港，经友人介绍到《中国邮报》担任记者，大约在1904年，端纳受报社委托单枪匹马，亲赴广州，准备采访当时清朝政府两广总督张人骏，他没有到英领事馆请求联系与两广总督会晤事宜，而是每天到总督衙门守候，终于感动了张氏幕僚温宗尧，遂为引见。张人骏盛服相迎，命人摆酒款待。端纳声言不会喝，张氏侍从劝他假装喝以取悦总督，端纳正色道：“这样不忠实的事不应该做！”张人骏大喜，认为端纳很诚实，产生了和他谈下去的愿望。端纳口若悬

河，遍论天下事，说来头头是道。张人骏惊叹其见识广，当即聘请端纳做他的私人顾问，可以随时到广州晋见。从此，端纳在中国担当要人顾问的生涯开始了——从清廷总督的顾问一直当到中华民国总统的顾问。

众所周知，端纳接交张人骏之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年代。一天，革命党人在澳门雇佣日人载运军火潜赴广州，在珠江口为清兵所捕，械斗之际，清兵撕坏了日本国旗，引起两国争端。日本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两广总督向日本国旗磕头赔礼，并赔款12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迫于日本的压力，降旨两广总督执行。张人骏手足无措，问计于端纳，端纳遍访广州72个工商团体、13个慈善机关及商会，发动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人听说后，非常吃惊，决定收回成命，不再追究，事端不了了之。张人骏大喜过望，此后对端纳更是另眼看待。

端纳以一个新闻记者特有的敏锐，深知中国革命不可避免，暗中赶赴香港求见国父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不在，由胡汉民接待，胡氏对端纳早有耳闻，并对这位外国友人志愿加入中国革命行列的热情大加赞赏。从此，端纳左右逢源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之间，他的新闻报道的来源更加充实，名声大噪，英美许多报社争相聘他为特约记者。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端纳以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结识宋子文一家，成为宋家座上客，后由宋子文介绍与伍廷芳、王宠惠、王正廷、虞洽卿等名流相识。

武昌起义后，上海方面的革命工作由伍廷芳主持，端纳成为他处理涉外事务的顾问及帮手。端纳建议，为争取国际支持应宣布遵守条约义务，并保护外侨财产，伍廷芳深以为然，于是请端纳起草有关外交文告。

拿张勋姨太太换火车

端纳在上海时，听说江南各省多已响应革命，只有南京尚在张勋控制之下负隅顽抗。忽然心血来潮，只身来到镇江民军前线指挥部，路上又遇到美孚行经理美国人安德生，两人凭借外国人的有利条件，开火车头为民军观察镇江至南京铁路沿线敌情，一直到南京太平门，端纳登高观察南京地形，回去建议民军以炮轰城，终于成功，张勋外逃，南京光复。民军入城后捕获张勋姨太太数人，众人群情激昂，建议将她们拍卖，而端纳另有主张。他托人到江北与敌交涉成

功,拿张勋姨太太换取浦口的火车头及车厢数辆,以供北上之用。

与孙中山的一段交往

经宋子文、伍廷芳诸人的引见,端纳和孙中山相识,并被委为其私人顾问。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对外宣言,就是由端纳起草的。不久,南北和谈成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的孙中山带领王宠惠、端纳到全国各地考察,端纳向孙中山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端纳充任孙中山顾问的生涯告一段落。直到1925年,端纳才再次见到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已病危床头,说不出话来,端纳与先生相顾无言,唯有垂泪而已。孙中山逝世后,端纳异常痛苦,潜心研究孙文著述,越发敬重孙氏人格之伟大。

护送王正廷 泄露“二十一条”

离开孙中山后,端纳停滞北京,任伦敦《泰晤士报》及纽约《先驱报》记者,出入财政总长周自齐门下,结识顾维钧等政府要人。袁世凯善后大借款,遭到全国一致反对,恼羞成怒之下解散国会。副议长王正廷性命不保,端纳让他化装成老妇,亲自护送出京。

1915年,袁世凯为取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同意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端纳听到风声后,为打探条约内容绞尽脑汁,财政总长周自齐暗示他,袁政治顾问英人莫理逊处可能有原文译本。端纳立即前往拜访,莫理逊出于对西方利益的考虑,也有意让端纳将“二十一条”泄露出去。于是与端纳寒暄数语后便故意离室,任端纳将原文译本盗窃而去。端纳以最快的速度,诉诸报端,引起世界各国注意,一时舆论大哗,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抗。端纳首次揭露“二十一条”的功劳不可埋没,然而端纳并没有因为这一举动而成为袁世凯的迫害对象,反而充当了袁氏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拟稿人,说来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二十一条”提出之后,经过三个月的谈判,日本政府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48小时内全部接受,否则兵戎相见。袁世凯决定接受“二十一条”,命外交总长陆徵祥回复日本政府,陆氏六神无主,最后请端纳代为拟稿,端纳根据他的意旨拟定了电文,接受了这一辱国条约。

充任张学良顾问

端纳与张学良相识,大约在1923~1924年之

间,为了安置这位外国朋友,张在北京设了一个经济研究所,由端纳担任经济讨论处新闻处长,负责经济调查事项。此时,端纳还兼任北洋政府顾问。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端纳为了安慰朋友,赶赴沈阳晋谒少帅,正式做了张学良的顾问。这是民国历史上的大时代,张学良不顾日本人威胁,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其中之情形,端纳都是一清二楚的,而且从中起了积极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为平息国人义愤,少帅被迫充当蒋介石“替罪羊”,于1931年3月11日通电下野。一个月后,张学良乘意大利邮船出国,端纳随行。在此之前,端纳力劝少帅戒掉烟瘾,并教以西洋礼节及应付技巧。少帅凭其翩翩风度加上端纳悉心指教,出访意、德、英、法获得极大成功。

1933年底,张学良被电召回国,回到上海。蒋氏夫妇为表示欢迎,邀请少帅到杭州游玩。席间,端纳与蒋氏夫妇谈笑风生,并不时陈述时政,不知不觉谈了四个多小时。离别时,宋美龄对端纳讲:“你何不为我们做事?”

1934年底,张学良忍痛割爱,正式将私人顾问端纳转让给蒋氏夫妇,那时端纳已年近花甲。

西安事变中的端纳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端纳正在上海,听到这一消息他匆忙赶到南京。此时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各派之间为了各自利益明争暗斗,端纳以冷静的目光注视时局的发展,不时向宋美龄献计献策,抵制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随后凭借与张学良深厚的友谊,充当宋美龄的信使,单枪匹马飞抵西安。端纳了解到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转而十分同情张学良的立场,于是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做蒋介石的“思想工作”的行列。

当晚,端纳在张学良陪同之下去见蒋介石,向蒋氏进言道:“我这次是受蒋夫人委托而来的,我同张将军谈话后,我应首先向您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外籍人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成这样伟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成为这样小小的人(俯着身子用手在地上比划



朱德赠蒋介石战马

● 山西 田秋平

抗战初期的1937年年底,任中国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收到一特殊礼品——一匹优种战马。此马驽悍壮俊,蹄高腿长,趑蹄成坑,毛色红似炭火,驰骋似同闪电。赠马的不是别人,正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朱德总司令。

那是1937年10月26日至28日,我十八集团军129师386旅772团在刘伯承师长、陈赓旅长指挥下,协同其他抗日友军,在山西娘子关东南平定县七亘村附近,以主力分布于进攻之敌两翼及侧后,连续进行两次伏击战斗,歼敌20师团辎重部队4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步枪20余枝,炮弹无数,沉重打击了日军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嚣张气焰。篇首提到的朱总司令赠给蒋介石的那匹战马,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我军获得的战利品。

朱德总司令为什么要赠一匹战马给蒋介石?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作为

国共两党合作后的一支抗日军队,应时时处处显示其抗日力量的强大,将战利品赠蒋,意在让蒋知道十八集团军是复兴民族、能打胜仗的最精锐的部队;二是中国有句吉语叫:“马到成功”。朱总司令赠蒋介石战马一匹,寓意中华民族、中国军队是不会屈服于外来之敌的,只要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日军终将被赶出中国,那时必然是“马到成功”。

蒋介石收到朱德总司令赠给他的特殊礼品后,并得知1937年10月下旬,于山西忻口战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利用阵地战与游击战密切配合,在20多天的战斗中,歼敌2250多人,毁敌飞机20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迟滞了敌军自攻陷平津后“长驱直入”的攻势,以及八路军在晋东南连战皆捷时,于1938年2月8日特电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叶剑英转八路军总部,嘉奖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

(责任编辑 霁明)

着)。”端纳带来的信及一番真诚的话语使蒋介石的态度多少有了点改变。第二天,端纳飞往洛阳,向宋美龄讲明一切,着重强调张学良的善意及和平解决的愿望,遂使蒋夫人决定亲自飞陕。

西安事变最终化干戈为玉帛,奠定了中国八年抗战的基础;毫无疑问,端纳利用私人情谊在这次事变中发挥了积极影响。

端纳出走及其晚年

西安事变后,端纳在蒋氏夫妇身边呆了将近三年,这段日子里他的心情异常苦闷,原因有二:第一,他毕竟是西方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有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与蒋介石的作风是格格不入的。他目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及处处与共产党人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不良行径,不免发些议论,导致蒋氏极不愉快。第二件事是他到死都一直耿耿于怀的,那就是觉得对不起张学良,少帅被软禁后,端纳异常痛苦,因为在西安时,他曾与宋子文一道担保过张学良的安全,宋子文一气之下还可以和蒋介石吵一架飞往

上海。他端纳除了向宋美龄埋怨之外,便别无他途了。不过,他对张学良的自由仍念念不忘,每逢有机会便坚决建议释放张学良使之参加抗战,但始终不能为蒋氏采纳。他逐步遭到冷遇,不得不决定引退了。

1940年,端纳离开了他生活近四十年的中国,前往南太平洋各岛游历。据说,蒋介石买了一艘游艇送给他,使他有可能常常在南太平洋的暖流中荡漾,欣赏旖旎的热带风光。只是他仍旧没有忘却苦难中的中国,除了常在各地替中国宣传外,还屡次向蒋介石、宋美龄申请允许其返华服务,可惜都没有得到答复。不久珍珠港事变爆发,端纳在菲律宾被日军囚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恢复自由,终因久陷囹圄,身患不治之症——肺癌。端纳自知不久于人世,致电蒋夫人,请求死在中国,宋美龄接到电报后,立即派飞机送他赴美就医。1946年春,病势转危的端纳,被送往上海虹桥医院,不治而逝,享年70岁。

(责任编辑 惠兰)



左右逢源的

大亚山堂主朱亚雄

● 程堂发

一、留日归来 投靠帮会

朱亚雄 1901 年出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上。其父兄弟三人，伯父务农，叔父经商，只有朱亚雄父亲一人求学，毕业于北京京师法政学堂，后来派到上海地方审判厅任推事。朱亚雄即离开家乡到上海民立中学读书，学名改为朱毓华，后来考进南洋医科大学，始取名亚雄，号德字。大学毕业后即去日本见习，24 岁时回国，经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的介绍，任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厂医。一年后升任水月华医院院长，并兼任上海法政学院、大厦大学校医及惠生妇产科女医学校教授等职。

1925 年朱亚雄回国后，又在上海参加了帮会洪门五圣山。五圣山的山主是尚松坡，又名向海潜，湖

北大冶县人，在辛亥革命时曾任鄂军民军司令。他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即杨啸天）是金兰兄弟。当时尚松坡住上海前法租界浦柏路耕余里，他家里来人甚多，门庭若市。由于朱还在日本人开的内外棉纱厂做事，故很多洪门弟兄对朱有看法，认为朱不配加入洪门。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朱离开内外棉纱厂，又参加了上海洪门主办的抗日团体“洪兴协会”，负责救护队，并由尚松坡介绍认识了军统少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督察处长文强。

一天朱亚雄到尚松坡家，尚说文强很赏识你，又说你的运气好，不要错过机会。一番话说得朱亚雄飘飘然，此时的朱亚雄已无心从医，一心想在社会上混出一些名堂。他表示要珍惜良机。邀请文强到家作客。经尚从中极力撮合，文强欣然同意。第二天朱亚

雄忙了一天,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了文强。这样吃喝相互往来数十次,两人互相吹捧,相处甚好。但文强始终未暴露过自己是军统少将的身份。淞沪沦陷后文强离开上海。朱亚雄也离开上海到了老家南京。

二、自开山堂自称主

回南京后,因生活无着,朱亚雄去找伪维新政府内政部部长陈群。陈群是福建人,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曾任过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朱当时为校医,故结为好友,不到两天陈群就任命朱亚雄为内政部卫生司第三科科长。卫生司实为有名无实的机关,终日无事可做,当时内政部主办的警官学校及青年团两个单位都缺少医生,朱兼任了一段时期,每周三次,隔一日诊视,汪伪政府成立后,朱的所有职务自然取消了。

朱亚雄投靠陈群后,并未发迹。

1940年朱的几个朋友从上海到南京看望朱亚雄,都认为朱亚雄应在南京开山立堂,军统文强也赶来南京劝其开山,文强住在南京,做各方面的宣传工作。按照洪门规则,朱亚雄的资格还浅,根本不够开山,但是南京人不了解朱在帮会的资历,原有南京的帮会山头都隐姓埋名。那时南京只有青帮并无洪门,朱也想借助机遇大干一下,谋个前程。当即取名为大亚山正义堂。开第一次香堂时,约有10人左右,其中有大学教授、伪政府官员,也有从青帮中转来的流氓(按帮规青门可进洪门,但进了洪门就不能进青门)以及陈群与胞弟陈事。随着洪门逐渐被人们了解,一批伪政府官员如:伪立法委员张桐、伪卫生局长徐锡良、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张今吾、警察局长余觉曾(亦叫余炳文),伪江阴县长张一声、江宁县县长陆超、无锡县长杨彦斌、伪感化院院长黄凯相继参加。商界、新闻界以及三教九流都有人参加。最多时洪门大亚山正义堂有门徒千余人。

所谓大亚山并不是真有其山,而是以义气二字相标榜,凡愿参加只要有人介绍就成。参加者的心理都是藉此与上级长官有着弟兄同门关系,可以向上爬。商人是借此发展营业并求得保护,免受欺侮;新闻界是企望消息更灵通些;青帮转来的,是想多混出一条门路;当然也有为好奇心驱使而参加的,总之各有各的目的,至于真诚以侠义相交那就极少了。

凡初次进门参加洪帮的都要缴纳香资,分甲乙丙三种,即为36元、72元、108元,量力缴付,有的地位高的还要摆酒席、拉场子,香资除了香堂及执事的一切开销外,余下的都归山主。因此朱亚雄身为山



朱亚雄

主,无需再去谋求其他职业,仅靠这个收入已够一家维持生活了。

大亚山正义堂虽门徒众多,但活动很少,有的会员仅开过一次香堂后,从此就不来了,经常来的则很少。每次都是以朱亚雄公寓为活动基地,当时朱为显示自己的地位,常常身边有两个彪形大汉做保镖,自己挎着手枪(内政部长陈群送的),经常出没在政界、军界及社会名流之中,很是威风。

三、成立护路总队,接受党的指示

朱亚雄当了洪帮帮主后,与汪伪政界官员、商界、报界及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帮会在南京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942年3月,八路军司令部秘书处(情报处)派共产党员徐楚光到南方沦陷区工作。徐楚光,湖北省浠水县人,1927年参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受到进步学生及共产党的影响,思想很快倾向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即开始做秘密地下工作,战斗在敌人心脏做策反、瓦解敌军的工作,猎取敌人的核心秘密,1947年被武昌公安局逮捕,最后关押在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次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现其事迹在雨花台烈士展览馆展出。

徐楚光接受指示后离开根据地先到武汉找到地下党员金龙章。当时金在伪军内任职,金帮助徐办理了一张去南京的通行证,并将他介绍给南京洪帮头子朱亚雄,以便掩护身份,做地下工作。1944年6月徐通过汪伪陆军部部长叶逢的胞弟少将科长叶晃的介绍,进入陆军部第六科任上校科长,与此同时,徐还在汪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挂了一个上校参赞武官的名,徐利用担任这些职务的有利条件,广交朋友

友,结拜兄弟,暗中收集敌伪情报。

徐认为,依靠朱亚雄,凭借其势力,可以获取更多的敌伪情报,徐就着重与朱亚雄及家人拉好关系,在一风雨交加之夕,徐借口回不了家与朱同睡,夜深人静时,徐先开始拉家常,然后结合当时形势,从思想上诱导朱积极抗日。

经过数小时的争取工作,徐发现朱尚有民族自尊心 and 正义感,便告之其真实身分,动员朱参加抗日工作。朱在徐的教育和启发下,表示愿意参加抗日工作,并举行了封建的盟誓仪式。此后,朱亚雄广收地下党员入帮会,刚从感化院出来的共产党员张冰化名王禹声(南通人),也加入了洪帮。朱、徐、张三人结为兄弟,常在一起研讨抗日工作,徐提议为打破日伪对南京进出人员和物资的严格控制,为掩护共产党员和运输物资的便利希望朱亚雄设法开辟一条交通线,并拿出一部分活动经费,指出了具体工作方向。

朱接受任务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经过数月的奔波和周旋,终于结识了敌伪华中铁道警务课长木村(日本人),当时朱欣喜若狂,及时向徐作了汇报,徐鼓励朱抓紧联系,当即又付给朱一部分经费。然后朱将木村介绍跟徐楚光相识。木村当即表示交通线上最头疼的就是火车道上的盗窃。徐乘机进言,表示洪帮对付盗窃有办法,并且可以派人做护路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磋商筹划,木村终于同意由南京洪帮组织护路队(当时已有爱路区及护路警备队担任护路工作),名为敌伪华中铁道护路总队,任务是保护货物,防止偷窃,维护交通安全,保护南京至芜湖、芜湖至奔牛站一段九百公里的沿线。敌伪华中护路总队(以下简称护路队)分为总队、区队、分队。总队由朱亚雄担任总队长,徐楚光担任主任秘书兼督察长,负责护路总队一切事务,张冰担任情报组长,于镇波担任通译员,何鑫宝担任通讯员,洪侠、萧啸风担任一个时期的挂名督察。后来简信蓉也担任一个短时期的秘书,区队长由范震担任,后来无形取消了,分队共有五个,即下关、龙潭、镇江、丹阳、芜湖,分队也设若干小组,担任各沿线小站的工作。护路总队在每个车站都设有护路队,几个重要的车站护路队,由徐楚光派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打入,并担任负责人。镇江是联系和出入苏北根据地的要道,徐派了一位有民族正义感的镇江青年,洪帮兄弟周士贵负责,由周专门负责掩护进出的苏北根据地的我方人员和物资。

护路总队办公地址设在朱亚雄家,分队设在各站,每个分队内由日军警务课派一个日籍指导员直

接去处理。朱亚雄虽挂名于护路总队总队长,但一心专职大亚山的工作,故护路队的一切事情均由徐楚光代行,办公图章也交给了徐。徐利用这种公开的组织,秘密收集情报,将各分队的情报送来总部,然后交共产党员张冰处理(张冰在解放前夕被敌人秘密杀害),转报八路军司令部秘书处(情报处)及华东军区联络部、新四军军部。另外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发给护路总队六张不贴照片的免费乘车特别通行证,为我党地下交通人员进出南京等城市,提供了极大方便。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护路队就此解散。共产党员徐楚光、张冰先后返回解放区,一段时期徐与朱的关系中断。淮海战役前夕,朱派洪门大亚山兄弟、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周士贵渡江北上与徐楚光、张冰联系,表明愿意继续为党工作。周火速北上在山东找到了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杨帆,又到浦六分区与陈雨田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朱亚雄又特地赶到上海找到金龙章,把与徐楚光联系中断的情形陈述,并要求组织上尽快与徐取得联系,结果第三天组织上派了一位叫王晋的同志在朱的亲戚家秘密会谈,王晋在朱的名片上写了几个字叫朱赶快回南京,并告知有人会拿这种名片来见朱,朱回南京不几日,有位青年拿着名片与朱会晤,并自我介绍叫姚俊,湖南人,两人秘密研究了开展地下工作的步骤。

四、加人民社 左右逢源

1946年春季,苏北解放区张某受上级组织的委派到南京找到朱亚雄,要其到解放区去。同时朱选拔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同去,途中通过的检查站都是朱亚雄以洪帮大亚山堂主的身份混过去的,到了淮阴华东军区联络部,徐楚光任联络部领导下的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其任务是负责南京、沪杭一带地区的情报,策反工作,张冰是第三工作委员会秘书,杨帆部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同生副部长亲自接待,表示欢迎,并对朱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许,当晚设宴款待,宴毕将朱等人安排在一家旅馆住下,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李一氓也常看望朱亚雄,并设宴款待,一次杨帆部长接到谭震林的指示要在淮安会见朱,随后杨帆与朱乘车赴淮安,杨帆向谭震林介绍了朱亚雄是洪帮大亚山有名的人物时,谭连声说好!好!接着谭询问了沦陷区的有关情况,剖析了当时的形势,要求朱亚雄进一步为党工作,午间谭震林热情款待,晚上又受到

粟裕司令员的接见和宴请,又被安排在淮安招待所休息,朱在临行前,杨帆部长亲自布置朱回南京后的任务是:参加民盟组织,掩护共产党员和革命地下工作者的安全。并在华东贸易部门拨出鸡蛋一船运往镇江销售,作为活动经费。朱接受任务后首先到上海霞飞路疗养院找到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当时罗已受到反动派的监视,无法出面帮忙。朱又找到金龙章说明来意。当时金任民社党中央委员,在上海是民盟监察委员。(当时民社党是民盟中的一个组织)随即由金龙章作介绍,填表加入民社党,并谒见了民社党党魁张君勱,金龙章又写信介绍朱到民社党南京市党部找负责人蒋匀田。蒋看过金龙章的信后,甚表欢迎。后来,蒋匀田派人送给朱一张聘书,任命其为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

1947年,民社党在上海愚园路中央党部召开全国民社党党员代表大会,并改选中央常委,朱亚雄出席了会议。后来,民社党决定参加伪国民大会筹备会,朱亚雄又找到蒋匀田要求在伪国大会上安排一个职位。一周以后,蒋匀田派朱亚雄为国民大会秘书,朱拿着蒋匀田的介绍信到国民大会人事室报到,并接受了简派国民大会秘书的委任状,朱虽然是秘书,但整日无事可做,只开过几次会,到月底拿薪水,实际象朱这样挂名的秘书很多,据说还有不识字的秘书。有一次开大会,一位国民党元老在会上大发牢骚,说自己曾追随过孙中山总理,现在有些人搞小团体,不重视我,我不干了,朱亚雄借此机会与这位国民党元老接近。这位元老一气之下将所有的国民大会内幕材料都交给了朱,朱将这些情况转交给地下党。

1947年,朱在南京中央政府门口巧遇军统文强,两人寒暄了一阵,朱告诉文强可能有人要控告他汉奸,因为朱曾掩护过军统,文强说不用怕。答应帮助朱搞到军统证明书,几天后文强带了一个朋友到朱家,此人西装革履、端庄文雅,名叶翔之,浙江人,军统职业,经文强介绍后,两人互致问候,叶当场拍板几天后将证明送来,朱非常感激,在太平路安乐酒家(今江苏饭店)设宴招待。果然不几日叶送来抗战地下工作证明书,上面有毛人凤签名,朱配上镜框悬挂在墙上,叶即提出要朱了解民社党内部斗争的情况。当晚朱到上海找到军界老朋友孙宝刚,孙滔滔不绝地把张君勱卖身投靠、分立民社的行为一股脑地倒了出来,朱喜出望外将所得到的材料报告给叶翔之。

有一次,伪国民大会开会时正在选举,叶到大会

上找到朱,要他帮忙为选副总统效力,恰好民社党准备在上海中央党部召开中常委会议,讨论选举问题,叶又要朱把会议的内幕告诉他,并表示要用多少钱都可以。朱为报答恩情,分文未要,满口答应照办,后因朱不够常委资格,无法了解内情,朱就找到蒋匀田,建议列席会议,并举例国大秘书都可以列席会议的,蒋即向励老(张君勱)请示,居然通过了,于是朱赶到上海愚园路该党部,开会时常委都一致选李宗仁为副总统,但有条件,民社党要有一批人参加伪政府工作,会后朱再次将会议内容出卖给叶翔之,从此朱叶两人结为好友,常在夫子庙吃喝玩乐,来往甚密。

1947年,由杜月笙、杨虎等发起,以尚松坡为会长,军统特务徐亮为总干事的“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在上海成立。总会设在上海愚园路,分会设在各省市。该会的目的是:统一全中国的帮会,由国民党统一领导,作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同时预备大选时,可大量控制选票。当时,“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南京筹备分会主任是青帮头子、老特务赵茂高,会址设在赵茂高公寓(城南琵琶巷内),朱亚雄也加入了该会,并帮助赵茂高等分会。在此期间,徐亮发现朱亚雄有通共行为,多次派爪牙盯梢,甚至赖在朱家不走,终因没有真凭实据,朱又是大名鼎鼎的洪帮头子,未敢轻举妄动。

其实,早在1946年自称为洪门兄弟的罗冠群就到南京找过朱亚雄,以威胁的口气要求交出共产党员张冰的下落,并把军统跟踪张冰的活动情形以及与朱投靠共产党,一同到解放区的活动讲了出来。朱毕竟是在江湖上闯荡过来的,与罗冠群周旋,罗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便狼狈地走了。罗又找到洪侠,逼他说出共产党员徐楚光的下落及活动情况,洪装着不知道,将其妻手上带的金镯取下送给罗冠群才算了结。

发生上述事后,朱亚雄知道军统并未真正掌握他通共的证据,因而并不惊慌。“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不久,因会内发生纠纷,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和民运部为该会归属问题发生矛盾,中统特务又想干预,最终导致不欢而散。

全国解放后,由于朱亚雄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被任命为上海闸北区防疫站主任。在肃反中,因历史问题被捕判刑,刑满释放后回南京,于1979年病故。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文件规定,客观地评价了朱亚雄的一生,因而决定对朱亚雄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

(责任编辑 宁宁)

张际春中原军事生涯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宗伯

●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 高成林

张际春是我党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从20年代参加革命起,到1968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为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奋斗了一生。值此建党70周年之际,特将他在中原作战的一段军事生涯写出来,以示怀念。

张际春1900年12月20日生于湖南宜章一个农民家庭里。1926年光荣的加入了共产党。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张际春参加了朱德、陈毅发动的湘南起义,担任中共宜章县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农民协会秘书长。后随朱、陈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张际春到井冈山后,历任红四军十一师、十三师、三十一师、四十五师和中央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红四军党委秘书长,红一军团、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长征中,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代理政治部主任,协助刘伯承校长工作,并一起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斗争。抗战后,历任陕北河防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和党务委员会书记,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政治委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中,历任晋冀鲁豫军区暨野战军、中原军区暨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张际春在长期担任军队政治领导工作中,坚持我党建军路线和我军优良传统,在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上有许多重要建树,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之一,他在中原的军事生涯,就是光辉的范例。

张际春在中原作战中,参与了历次重大战役的战略决策,并根据整个战略意图,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各项战略任务的完成。

张际春善于不失时机地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1947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刘、邓作了“准备向中原进击”的指示,6月3日,军委命令我野

战军准备突破黄河、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下达后,当日野战军政治部就发出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大纲》,要求全军人人明白政治任务,号召发扬吃苦耐劳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准备实行战略进攻。13日又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认真学习《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和《全力准备大反攻》的社论,以鼓舞部队斗志。14日召开民运工作会议,讨论转入战略进攻后进入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问题。鲁西南战役结束后,8月5日发出《关于目前一个时期政治工作中心的指示》,指出我军可能到蒋管区作战,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总结进入蒋管区作战以来的经验,为向大别山挺进,作好部队思想上、组织上和政策上的准备。这一系列指示,为部队挺进中原打下了思想基础。

此外,他常常深入部队亲自作政治动员工作。例如,当我军突过沙河,矛头指向大别山时,蒋介石察觉了我战略意图,慌忙调军沿平汉路南下,企图先我到汝河南岸布防,南北夹击我军。当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与六纵队进抵汝河时,敌军已先期到达汝河南岸,占领了汝南埠等渡口,在空军配合下截断了我军前进的道路,这时在后面追击我军的敌军仅距五六十里。在这紧急时刻,刘、邓、张、李等首长亲临渡口指挥强渡,张际春亲自到河边作政治动员。在刘伯承提出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号召下,部队英勇冲击,粉碎敌人的堵截,从敌人的防御阵地中杀开一条通道,突过汝河,接着与刘司令员一道先期渡河,指挥先头部队夺占敌桥头堡,掩护大部队继续渡河,终于闯过了这道难关。然后,率领部队急行军抢渡淮河,胜利进抵大别山。

部队进入大别山后,为使部队站稳脚跟和实行战略展开,邓政委于8月31日,为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张际春为及时传达到部队,决定先电报摘发邓的报告摘要,让部队知道精神,然后又主持恢复《军政往来》,在复刊第一期上,又登载了邓的报告全文,以使全军指战员认清

形势,明确任务。

后来,由于部队长途跋涉得不到休整,十分疲惫;加之在新区和新环境下高度分散,又无后方依托,斗争十分艰苦,在部分同志中曾一度出现思想涣散和纪律松弛的现象。刘、邓及时指出,要抓紧进行形势任务和纪律教育。张际春为贯彻这一指示,及时以野战军政治部名义发出《到达大别山以后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文件指出,今后政治工作的中心在于:深入创造解放区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准备,认识我军有条件有信心粉碎敌人的进攻,诱导部队迅速习惯无后方的和现地条件的作战环境和生活环境;严整政治纪律,加强群众工作,号召全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保卫人民解放军在人民中间的荣誉和争取在人民中的良好影响而斗争。”

张际春就是这样及时地以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了部队行军作战和建立根据地任务的完成。

张际春善于从实际出发和有的放矢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在部队开始挺进大别山以后,就催促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陈鹤桥和宣传部长陈裴琴,及进编出了战略进军歌曲。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到处唱起了这样一首歌:“蒋介石正是手忙脚乱,我们又挺进大别山,……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边。”由于这支歌唱到战略进军的点子上去了,曲子又是民歌,便于流行。对于鼓舞部队斗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他根据当时消息闭塞和无法出版报纸的情况,亲自主持编发油印的《政工往来》,并根据当时部队存在的实际问题,连续写了《消除疲劳,准备打仗》、《怎样习惯南方生活》、《怎样播谷子》、《桐子油为什么不能吃》等针对性强、短小精干的文章,为部队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同时,他又及时地把党中央的精神,编印成《时事新闻》,发给部队,作为时事教育的材料。当时一纵队十九旅五十二团过淮河后,担任牵制敌人,掩护大军进军大别山的任务,长期看不到报纸和文件,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恰在这时,他们收到了一期《时事新闻》,上面有新华社发的《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就立即组织大家学习和讨论。结果,消除了不正常情绪,巩固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他又抓住这一事例,写了《时事教育切不可放松》等文章,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设法给部队输送材料,不断地对部队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他为了使部队尽快掌握山地作战,特请黄埔军校毕业的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松青,编出《山地战歌诀》,登在《军政往来》上,供部队学习。

他根据当时有的干部因跃进大别山的胜利而居功叫苦时,他严肃地指出:自然我们在战争中出了很大代价,但所有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都是经过艰苦奋战才取得胜利的,他们有的担子比我们更重。我们应当好好向兄弟部队学习,否则,就会妨碍我们的前进,我们就要落后。

张际春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从不骄傲,极为谦虚。他先人后己,关心同志,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例如,在涉过泥泞无路,浅则及膝、深则及脐、荒无人烟的黄泛区时,刘、邓、张等首长都与战士们一起,徒步前进。当同志们看到他很疲惫劝他坐一段大车时,他都加以谢绝。又如,他每到驻地,常常是与警卫员一起搭门板、铺稻草,打扫环境卫生。在大别山区,村小房少,他常常与部长们挤在一起睡地铺。再如,1948年驻宝丰县柳林村时,有一位部队的同志,到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联系工作在村头遇上了他,来者向他打听组织部的地址,他说农村没有门牌不好找,我带你去吧!事后那位同志才知道他是“四号”(野战军首长代号的排列)首长,不禁愕然地说:“我原以为他是伙、马夫哩!”他平日一心扑在工作上,行动很随便,常常不声不响地到各部门去,了解情况和指示工作,使得警卫员有时“丢了”首长“很恼火”。类似这样的事,一直传为佳话。

中原作战后,张际春参加领导了渡江战役和西南战役。西南解放后,他除担任军区的工作外,又担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长、农村工作部副书记,1954年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他为解放全中国和建设大西南,为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际春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遭到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诬陷他是“黑帮”、“活阎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直至迫害致死,含冤逝世。令人欣慰的是:张际春同志遭受的不白之冤,中共中央已于1979年1月25日予以平反昭雪。

张际春在中原作战和一生的革命业绩,已经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辉史册,受到全国人民的永远怀念。他的革命精神,将激励后继人为实现祖国的四化而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 宁宁)

六朝古都建康

都城位置新探



●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 中村圭尔
笑雨译

编者按：日本中村圭尔先生为本刊撰写的这篇文稿，提出了新鲜独到的见解，现刊介，供研究。

六朝古都建康是以周围8里的宫城和周围20里19步的都城为中心的，宫城和都城的位置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早在《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洪武京城图志》、《金陵古今图考》和《金陵琐志》等书中即已绘图标明其位置。然而却以五十年前朱偁先生在《金陵古迹图考》中提出的观点影响最大。他把鸡鸣寺后的一段故城（俗称台城）作为都城的北界，根据都城南门——宣阳门距离秦淮河上的朱雀航5里的历史记载，认为宣阳门在土街口附近（即今洪武路北端与上乘庵交会处）。尽管他认为确定六朝建康都城的四至比较困难，然而他却勾勒出一幅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都城平面图。据该图所示：北城墙从解放门附近，经鸡鸣寺、北极阁之北，直至鼓楼西边；西城墙从鼓楼西边，经云南路、上海路附近，至五台山南麓；南城墙从五台山南麓往东沿中山东路，过土街口附近至大行宫附近；东城墙从大行宫附近大致沿太平路至解放门附近。

朱偁的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无论是蒋赞初的专著《南京史话》、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城市建设史》，还是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历史名城》、阎崇年主编的《中国历代都城宫苑》、叶晓军编写的《中国都城发展史》等等，其中的“建康都城位置图”皆大同小异，基本上都采用了朱偁的观点。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学者持有异议。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第一本记载南京的私

家专著《建康实录》中有与朱偁的观点相左的史料，多数学者却未予提及。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建康实录》的记载，对建康都城的位置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建康实录》卷二记载，赤乌四年（241年）冬十一月，“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至潮沟。”其注写道：“潮沟亦帝所开，以引江潮，其旧迹在天宝寺后，长寿寺前。东发青溪，西经都古承明、广莫、大夏等三门外，西极都城墙，对今归善寺西南角，南出经阊阖、西明二门，接运渚，在西州之东南流入秦淮。”这里提到的承明、广莫、大夏、阊阖、西明等五门，据《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引《宫苑记》记载，皆为都城之门。因此，这条史料记载的建康都城与潮沟、青溪、运渚三条古水道的位置关系，成为推断都城位置的重要线索。

在此，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建康实录》史料的可信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评介《建康实录》称之“尤加意于古迹”，“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称：“尤加意于古迹，颇为详洽，且书作于唐至德中，去梁陈未远，多见旧文，故所综述，往往为唐以后书所不载。”总之，《建康实录》的史料可信而又珍贵，尤其是关于古迹方面更是如此。

在《建康实录》撰写的时代——唐肃宗至德年间，建康遗迹情况如何呢？《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纪开皇九年”条云：“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可见建康在隋平陈后完全遭毁灭了。然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武德六年”条里记载辅公祐反乱时又写道，辅公祐“修陈故宫室而居之”。说明

唐武德六年(623年),六朝建康的遗迹还残存着。因此,成书于斯时的《建康实录》其关于建康都城的史料是有据可依的。

三

六朝建康都城位置与建康水道位置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潮沟、青溪和运渎的位置。

孙吴时期开凿的这三条水道的位置,在朱偁的《金陵古迹图考》以及郭黎安的论文“试论六朝时期的建业”(《中国古都研究》1985年第1辑)都已明确阐述。据此,运渎从今东南大学西北附近经进香河路、洪武北路西边、新街口的东边,南流至中山南路附近,过羊市桥、宣桥、草桥、红土桥、斗门桥,与内秦淮河交汇。潮沟在东南大学西北附近与运渎相连,沿北京东路,往东流向九华山南,在太平门西南与青溪相接。青溪源于钟山,往南流至小营路东,过竺桥、太平桥,南流至长白街附近,在淮青桥附近汇入秦淮。附带说一下,《建康实录》赤乌四年条原注所记载的从归善寺西南角南出,通过闾阖、西明二门的河,不是潮沟,而 渎的上游。

其次,关于 寺的位置,刘文炽《南朝佛教史》(见《金陵琐志》)引《宫苑记》云:“归善寺在鸡笼山东、上林苑前,晋时所建也。”《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引《宫苑记》说,上林苑在鸡笼山东,归善寺后。由此可以推测,归善寺位于鸡笼山东。

四

基于上述,可知都城北墙的承明、广莫、大夏三门之外有潮沟通过,所以都城北墙位于潮沟南岸,即位于潮沟所在的北京东路一线。北墙的东端在九华山的南麓附近,西端因为正对着归善寺的西南角,而归善寺在鸡笼山东,所以北墙西端在鸡笼山南麓附近。

关于西墙的位置,从归善寺西南角至闾阖、西明门附近有潮沟(实际上是运渎上游)流过,所以,西墙应是在从鸡笼山南麓附近至进香河、洪武北路附近一线。

东墙的位置据《建康实录》卷七咸和五年九月条原注记载,东出东墙清明门是青溪桥巷。而据《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引《宫苑记》的记载,东墙东阳门正对青溪桥巷。因此可以推定东墙是沿青溪而筑的。所以东墙的位置应是从小营路蜿蜒而过太平桥附近至利济巷附近。

南墙在镇淮桥以北五里,即火瓦巷、户部街和十四标附近。正门宣阳门在火瓦巷和户部街的交点

附近。

五

我的观点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是,以我的观点为前提的话,以往难以解决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第一,南京大学北园曾发掘过大型的东晋墓。学者们推定该墓为东晋帝陵之一,并认为南京大学北园附近属东晋西陵范围。据《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元、明、成、哀四帝陵在鸡笼山之阳,因此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根据以往诸家的说法,南京大学北园的西陵就都包在都城之内了。而实际上帝陵是不可能安在都城之内的?所以上述诸家之说与此是矛盾的。如果按我的研究结论,南京大学北园正好在都城西城墙外侧。

第二,《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引《宫苑记》记载,都城北墙广莫门正对乐游苑南门。乐游苑在覆舟山(九华山)南,所以广莫门必定在覆舟山南,这恰与我的观点一致。传统观点认为广莫门在鸡笼山东麓的解放门附近,这与正对乐游苑南门的史料记载互相抵牾。

第三,都城北墙大夏门,据《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引《宫苑记》记载,门北对归善寺,归善寺在鸡笼山东。那就说明鸡笼山是在都城北墙的外侧,大夏门就开在鸡笼山的南麓。

第四,关于宫城的位置,郭黎安在“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试探”(见《中国古都研究》1986年第2辑)一文中对以往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从珍珠河一名的由来来看应是在宫城内部的,所以宫城位置较以往的观点在更东面一些。我赞同这种观点。以往的观点认为,宫城在鸡笼山正南。实际上在更东一些。恰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五,我认为,都城并不象以往所说的那样规整,而是很不规则的。特别是沿青溪而建的东墙,由于青溪九曲回肠,因而是曲折蜿蜒的。关于这个问题,《世说新语》写道:“宣武移镇南州,判街衡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由此可见,丞相王导营建的建康城,街道不是直线,而是曲折的,而街道的曲折又是与城墙的曲折密切相关的。

对此,有人会提出以下的问题:今天鸡笼山的鸡鸣寺是梁同泰寺的故址,据《六朝事迹编类》记载,同

近世南京一怪——汪士铎

● 苏州大学 陆霄鹏

汪士铎(1814年~1889年),原名鏊,字振庵,又字梅村,号梅翁,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清代后期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出身于破落商人家庭,年轻时做过旧衣店和糕饼店的学徒。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举人,但一生都以授徒讲学和充当幕僚为业,始终未任过任何官职,是近世南京名士中一位怪人。

1853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起义军占领南京后,一般的前清臣僚都闻风丧胆逃出城,而汪士铎却留在城中,到太平军营内自荐其才而被聘为太平军军师,给太平军提出了好多治国整军的意见,到1853年底,他认为太平军“无道”,借故出走湖北,得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任,充当其机要幕僚,为胡出谋划策,并与曾国藩、刘坤一等人有很深的交往。汪士铎能游刃于两个敌对阵营内,被时人看作是一大怪。

第二怪,汪士铎平素著述甚多,其中激进的人口思想在当时社会是触目惊心的。他认为,人口在20

—30年增加一倍,而生活资料的增加却要慢得多,并且人口增长过快会带来人民贫困,社会动荡不安和人口质量下降等恶果,主张大量屠杀现有人口,加重多子女赋税,推行溺婴,提倡男女独身,严格控制婚配与晚婚,宣传节育避孕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种思想与近代欧洲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谋而合。这惊人的暗合,在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极少的情況下,怎能不说是—大怪事呢?

第三怪,汪士铎平生常痛骂妇女,认为妇女不仅“愚于男子”,而且是产生人口过剩和祸乱的根源,“女多,故为人多,而生祸乱”,主张生女即溺,对女性甚为鄙视。但奇怪的是,汪士铎在家中很怕他夫人,常受到夫人的凌虐,因不堪忍受而逃出家門,此苦境一直无可拯援。“惧内”形象与激昂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笞妇之悍,终胜以口骂”,这常是同人好友间的戏谑之料。

泰寺在台城之内,因而建有同泰寺的鸡笼山在台城之内,所以都城北墙在鸡笼山的北侧,即称为台城的城墙的位置。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梁大通元年(527年)创建的同泰寺,《建康实录》卷十七原注记载说:“原案《舆地志》,在北掖门外路西,寺南与台隔,抵广莫门内路西,梁武普通中起,是吴之后苑、晋廷尉之地,迁于六门外,以其地为寺。”根据这条记载,同泰寺在都城广莫门内,宫城北掖门外,实际上具体位置仍然不明。

那么,同泰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呢?《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记载法宝寺时说:“法宝寺,亦曰台城院,乃梁同泰寺基之半也,今在行宫北,精锐军寨内。”即梁同泰寺故基的一半建有赵宋法宝寺,而法宝寺在南宋行宫北、精锐军寨内。据《景定建康志》卷五“府城图”,南宋精锐军寨位于府城之内之北。南宋建康府城是杨吴顺义中建设的,其北墙的护城河相当

于珠江路南的水路,这样一来,在梁同泰寺故基上建成的宋法宝寺位置与今鸡鸣寺的位置截然不同。因此,同泰寺的位置在今鸡笼山的位置即鸡笼山是值得怀疑的。

或许又有人提出以下的疑问,鸡笼山是建康要地,战时起重要的堡垒作用,不将鸡笼山包在城内,而于鸡笼山南麓置北墙,从战略、战术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必须想到六朝建康都城城墙直到南齐建元二年(480年)之前的状态,据《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记载:“外六门,设竹篱。”即都城城墙并未设高大的城墙防护设施,只是作为划分宫城地区内外的象征性设施。因此,鸡笼山、石头城就象刘裕筑药园垒的覆舟山一样,在城外是合情合理的,不一定非要包进都城之内不可。如同明代筑的南京城墙,未把紫金山圈进城內,一样可以理解。

上述观点如有不当,敬请专家同仁赐教。

(责任编辑 霁明)

初

访

冯

玉

祥

● 安徽安庆 赵纯继

三十年代,我们曾经在南京拜访过冯玉祥将军,畅谈知识问题。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但这个问题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1936年,我正担任南京《新民报》总编辑。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和报社总经理陈铭德、主笔罗承烈一同乘车赴东郊冯邸,拜访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畅谈了两小时。冯宅是位于幽静的中山陵园区的一所小别墅,这里没有车马的喧闹,小小的客厅里静悄悄的。

一个体格魁梧健壮的人跨了进来,我们对这个人物的印象是:几十年戎马生活的锻炼,他是更强悍了,然而红晕充满他的两颊,并不苍老,态度是那么温和。以有节奏的河北话,娓娓地答复我们的询问;在深邃的识见中,以平易近人的语调述说,不象一般人那样不着边际,而娴熟地利用北方谚语强调他的意见,在形容某一类型人时,有时带点颇为传神的幽默。

冯将军先介绍了他近年每日的生活情况,差不多将全部时间是用在治学上。他每天5时30分起床,起来以后,由一位老先生来讲20分钟世界名人的言行。吃过早餐后走到中山陵墓的山脚下,那里每天有他的旧部鹿鍾麟、孙良诚、石敬亭等4人在牌坊下等,一同走上去走下来,看表是整整半个小时。回头习一个钟头的英文。如果有会,便坐车进城开会。午饭后,如没有朋友来,便午睡一刻。日常功课是:请几位朋友收集中国与西洋的各种杂志上的材料来研究,材料分为四类:国际政治、经济和中国政治、经济等。对于国际的除了研究它的原因和演变,特别注重对于中国的关系。此外,便是军事学习,是由几个外国朋友来讲的。星期日是由一位前清举人讲一点李太白、杜工部的诗,晚上如看书太多,便不容易入睡,否则洗一个温水澡就可以一觉睡7个多钟头。运动,除了每天上山外,宋明轩(哲元)近来送了10匹美国马来,经常骑骑马,或举举石担子。

冯将军谈到“中国往何处去”时,他说:“最要紧的是知识。我们说起来是五千年文明大国,如果仅靠老祖宗留下这玩艺儿中国人只有当亡国奴了。可是,张之洞,他弄清楚了中国的老玩艺儿还不满足,他知

道要强国必须要练兵,练兵必须要器械,要器械必须冶铁,所以他还有点成绩摆在湖北那儿,最怕的是‘一瓶不满,半瓶子晃荡’。比如袁世凯吧,他是少爷出身,所谓袁四儿——四少爷,他会的是巴结人,送礼告密,康、梁的事不是他告密,怎么会闹出那么大的事来。什么书他也没有读过一整套,他哪儿懂得什么政治,还想做皇帝,结果中国可弄糟了。外国人可不同了。朋友从日本回来告诉我,他们元老80岁的也有,90岁的也有,70岁的还算年轻,同天皇听新的军事学家讲世界军事情形。因为这般人一旦有事,还得出来挂帅的。”

冯将军谈到中国人的知识问题,他说:“中国北方乡下人,只知道有财神爷、财神娘、痘娘、二哥、五道神。此外,就是算八字,相面,看风水。我夏天在江西,听说闹了大风灾和火灾。要看看怎么酿成的,到那里一看,才知道他们净知道贪便宜。房子挺高,墙那么一点薄,风一来怎么不倒呢?还有火灾,江西出木头,他们那儿的房子一家挨一家,中间没有风火墙,一烧就是多少家。要有知识,怎么会死伤那么多人呢。有天早上一位欧阳先生带我到一个庙里,大清早已有人在那里跪着敲钟念经,我还当是和尚,再一问这些全是在家的居士。我当时哼哼两声,心里说,可倒了血霉啦,这样还得更糟下去。”

谈到外国人精神,冯将军说:“中国人到了50岁,就阿哼阿哼的直不起腰来。你看人家兴登堡80几岁,还有那么大的精神。当初克鲁包特金80岁了,逃亡在外国,有人去看他,门上人说他出去了,那人说,我只求见他一面,拉拉手,他躺在床上也不要紧,我又不跟他说话,他咳嗽也不要紧,门上人说:他确实打猎去了,你等15分钟吧。过了一会,一个老人扛着几个野味回来了,那人问他是克鲁包特金吗?我还当你躺在床上咳嗽呢!克鲁包特金说:俄国快要革命了,我已经签了名要到最前线去,我的手如果瞄不准,不是去送死吗?我打猎,就是练习瞄准……你看,人家这精神!”

冯将军始终以谦和的态度答复我们的询问。最后他说:“我处处不忘记我是穷小子出身,丘九的哥哥丘七的弟弟。”(责任编辑 惠 兰)

瑰丽多姿的金陵绒花

牧咏南

南京绒花是民间艺术一枝瑰丽多姿的奇葩,在我国绒花工艺中独树一帜,别具特色,深受国内外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赞赏。

由于民间艺术历来不受统治阶级重视,故南京绒花始于何时,不见史籍记载。有人说,扬州绒花在唐武则天时已列为贡品。南京在唐代属扬州,是否可以说南京绒花始于唐代或更早?一无史籍记载,二无文物可证,不足为据。而且皇家冠戴,以珠宝为贵,等级极严,岂能将民间绒花列为贡品。据南京著名绒花老艺人周家凤的启蒙师傅——六代绒花世家吴长泉的《绒花史料》抄本记载,南京绒花生产在明、清

时代已具相当规模,康熙、乾隆年间为极盛时期。据查,此说较为可靠。当时城内三山街至长乐路一带,曾称为“花市大街”,为绒花、绦花、绢花、纸花的集中销售市场。由于绒花谐音“荣华”,寓有吉祥祝福之意,民间“一事三节”(婚嫁喜事、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普遍有用绒花作装饰的习俗,借以祈福辟邪,增添节日喜庆的欢乐气氛。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等地南来北往的客商,经常到南京采购绒花,供应城乡人民需要,盛极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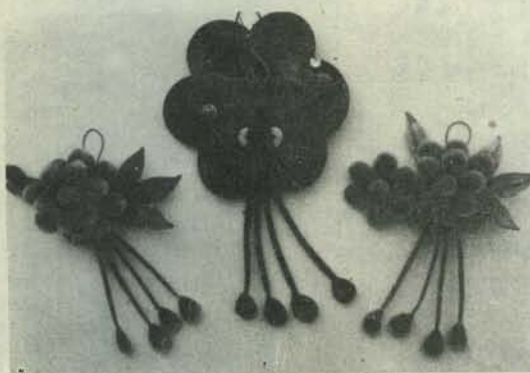
从品种来分,南京传统绒花有鬓头花、帽花、胸花、罩花、戏剧花等几大类,销路最大的是鬓头花。妇女无论老幼,喜庆、节日都要在发髻、发辫或两鬓插上一枝绒花,或用绒花工艺品作为室内装饰,确实显得喜气洋洋,令人赏心悦目。

南京绒花的题材都来自民间喜闻乐见的事物,运用吉利语言、实物谐音和艺术形象相结合的手法,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寄托人们向往美好幸福的愿望。以传统鬓头花“万事如意”为例,就是以万年青、柿子、如意等实物艺术形象组成的,谐“万”、“事”、“如意”的音,寓吉祥祝福的意。传统绒花工艺品“龙凤呈祥”、“龙凤花烛”、“龙凤喜花”、“龙舟”、“凤冠”等,则是运用民间广泛流传的“龙、凤”纹样,经过艺人巧妙构思、精心设计而制成的。其它如“福(佛手)寿(桃)双全(古钱)”、“金玉(鱼)满堂(塘)”、“富贵(牡丹)双余(鱼)”、“四世(荷叶、荷花、莲蓬、藕)同堂(塘)”、“喜(喜鹊)上眉(梅)梢”、“麒麟送子”、“鹤鹿同春”等绒花,也都是运用实物谐音或传统纹样组成的。据我国著名工艺美术大师陈元佛教授生前鉴定,南京传统绒花继承了明代绒花艺术特点。

民间使用绒花作装饰,在题材、寓意和内容方面,是因事、因时、因人而异的。婚嫁喜事用“万年全福”、“榴开见子”、“麒麟送子”、“鹤鹿同春”和“龙、凤”之类的绒花;春节用“连年有余”、“金玉满堂”和各种“如意”之类的绒花;端午节以儿童为主,用“五毒虎”、“老虎头”和龙绳、香包、鸭蛋(或粽子)、彩络之类的绒制品;中秋节用“兔子拜月”、“喜(犀)牛望月”、“四世同堂”之类的绒花。因人而异则是:姑娘戴“单事如意”、“金鱼跳龙门”;嫂娘戴“万事如意”、“百福双全”;老太戴“福寿双全”、“事事如意”;孀妇戴黄或白色的一



凤冠



万事如意胸花

般绒花。戏剧花也因剧中人物的身份而区别。

南京绒花历经沧桑,兴衰起伏变化很大。解放前奄奄一息,艺人多改行另谋生路。周家凤尽管技艺超群,也饱受失业痛苦,身背花笼,手摇铃鼓,走街串巷,靠自做自卖绒花糊口。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间艺术挖掘、整理,作为工艺美术提出“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大力扶持,使南京绒花获得恢复与发展的生机。1955年,在南京市手工业管理局领导下,由19个手工业者组成绒礼花供销生产组,周家凤任组长和绒花设计。1956年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供销生产组发展到62人,成立了艺美绒礼花生产合作社,以生产绒花为主;其次为绢花,原材料由中百公司批发部供应,产品由手工业局供销经理部经销,出现了产销两旺的好势头,当年产值就达11.5万元,盈利1万元(含绢花部分),大大激励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但是,1958年下半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狂热,各行各业大炼钢铁,迫使该社转产氨水,企业陷于困境。1959年下半年,绒花重获新生。惟好景不长,1964年又面临停产的严重困难。接着掀起“文化大革命”,这枝瑰丽多姿的民间艺术奇葩,被视为“四旧”一扫而光,许多可贵的绒花史料、技术资料 and 样品都付之一炬,周家凤被赶出设计室做勤杂工。合作社改名为南京工艺铝制品厂,生产铝制小商品、像章和电容器等。1973年,周恩来总理发出了恢复工艺美术生产的指示,周家凤又回到了设计室。当时面临的困难是传统绒花无销路,唯一的办法只有开拓创新,发展外销。于是周家凤在传统绒花工艺的基础上,设计出许多造型新颖、寓意健康的新品种,使原来专为民间“一事三节”用的鬓头绒花等传统产品,发展为题材广泛的花鸟虫鱼、人



绒鸡

物走兽及各种室内装饰品,以适应人们美化生活的需要。如形神兼备的丹顶鹤,翠羽闪烁的孔雀,聪敏伶俐的猴子,憨厚可爱的熊猫,滑稽可笑的卓别麟,慈祥和蔼的圣诞老人,英姿飒爽的女侠,趣味浓厚的各种卡通,绚丽多彩的奇花异卉,造型优美的花篮盆景,光彩夺目的绒球彩络等。这些新品种,既可作为民间喜庆、节日的室内装饰,又可供外贸出口和旅游者购作纪念品。这就解决了销路困难,使生产出现了喜人的繁荣景象。1980年,更名为南京工艺制花厂,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常直接来厂看样订货。产品远销日本、欧美、海湾、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3年至1989年累计出口创汇713万元,占同期总产值的66%。最好的年景,在城乡设有18个绒花加工点,并增设了一个分厂,绒花生产工人达400余人。1989年,又更名为南京人造花总厂。南京绒花在新的历史时期绽开了更美丽的花朵。

扎花艺人周家凤,今年71岁,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他从事绒花艺术已60个春秋,为继承民间绒花传统工艺,发展南京绒花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经他挖掘、整理的传统绒花有30多个品种,多为全国所罕见。其中,“龙凤呈祥”、“龙凤花烛”、“端午龙舟”等挂件和摆件及各式“凤冠”,构图精巧,色彩典丽、精美绝伦,为民间传统绒花大放光彩。前两件作品,已为江苏省美术馆收藏。他创作设计的新品种达300多个,大部分获得外贸订货。色彩运用,他以大红、粉红为主,以中绿为辅,以黄和铜金点缀,对比强烈,明快和谐,浓艳而不俗,民间味道浓郁,地方个性突出。造型以中、小绒条为主,粗中有细,匀称协调,柔和饱满。并以夸张变形的手法,塑造简练生动的形象,表现活泼玲珑、趣味浓厚的神态。然而,苍

中统特务是

怎样监视中共代表团的

● 一发

解放初期,笔者询问了当时正在关押受审的中统特务刘俊三。在他交代的众多事件中,有一件是关于如何监视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时光已越过了四十多年,现披露出来,从一个侧面也许会给人们以某些启示。

据刘俊三的交代:他是安徽涡阳人。以其父与冯玉祥有私交在冯玉祥身边做事,并任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办公室主任,接着又首任三十三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副官。1943年8月,在重庆大溪沟67号加入洪门,拜头目张树声为“恩拜兄”(意为山主)。因为张树声当时在重庆地位显赫,被奉为“无冕之王”,是清洪帮的头目,位在黄金荣、杜月笙之上。由于有了这层关系,他即被人刮目相看。1945年4月4日,改任中国午报社社长。1946年由戴天强介绍加入中统。在南京期间,主要从事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

1946年5月,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要到南京,上峰要他带领人员到梅园新村附近监视周恩来、董必武的行动,并通知警察局临时拨配刑警队红色警备吉普车2辆供他使用,但实际上根本不适应,后又由解世昌(刑警总队人员)向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陆运司汽车大队借来道奇汽车2部,发给自行车12辆,每天从晨6时到夜11时,轮流值班跟踪监视,刑警队除内勤人员不参加值班外,120余

名外勤人员全参加,分三班昼夜守候。第一班由社团股长赵厚恩负责派遣;第二班由南区分队长杨雄负责派遣;第三班由李子民负责派遣,队长朱光熙为总负责人,副队长曾林、队副胡觐如为副负责人。各班跟踪发现的情况,由吴鼎编写,报送警察局。

除上述人员跟踪外,在中共代表团驻地,还有几方面人员日夜监视,而且都配有车辆。为了区别,伪宪兵司令部派出的是粉红色吉普车;军统是派的草绿色军用吉普车;中统又派了小黑色包车(内载一批特务守候)。还穿插了一些做小贩、擦皮鞋的特工,见机捣乱,侮辱民主人士,发现周恩来办公处的交通骑自行车出来买东西时,特务便骑自行车尾随;看到有公务员出来送文件时,只要车子一放手,特工就随即窃骑溜走。有一次董必武乘汽车准备找邵力子及于右任去,两名彪形大汉的特工打开董必武的车门硬挤进去说:“奉命保护!”即座一车辆同行监视。有时看见周总理的那辆墨绿色汽车停在那里,特务分子迅即用刀或铁锥刺破,有时甚至偷去汽油箱盖,拔去螺丝钉,使汽车不能行驶。后来,当周恩来离开南京,特务分子就进一步严密监听梅园新村17号的房内活动,检查办公用品、文件,来往进步人士也遭到严格检查和盘问。人们来到这里似乎到处都有眼睛监视,令你毛骨悚然。(责任编辑 霁明)

松、翠柏、白鹤、绒鸡、盆景等作品,则运用传统技法而强调实物原貌,以增强作品的生活气息。如满盛朵朵绒花的花篮,花枝招展,艳丽多姿,又缀以蜂采蜜、蝶恋花,融自然于艺术之中,生趣盎然。各色生丝小绒鸡,是在蛋形的绒条上装配上嘴、眼、翅膀、脚爪即成,看来并不希奇,但经他用镊子一拨弄,一只活泼传神的小绒鸡,跃然眼前。就是这种小绒鸡,外商订货总是上万打,在国际市场上已享有盛名,成为经久不衰的名牌产品。他为庆祝建国30周年而创作的“松龄鹤寿图”挂屏(长188厘米×高105厘米),运用国画传统题材与绒花工艺程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以一株苍劲古松喻祖国万年长青,以30只丹顶鹤喻建国30周年。这件大型绒花作品,既有国画的

艺术特色,又有浮雕的艺术效果,使过去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绒花成为厅堂高悬的艺术装饰品,为民间绒花工艺开辟了新路子,谱写了新篇章。他的绒花作品,在南京多次展出,还先后在北京、广州、日本名古屋、意大利佛罗伦萨展出,国内外观众赞不绝口。他不仅为南京绒花工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继承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发展民间艺术,进行内外文化交流,发展外向型经济,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因此,他荣获南京市“十佳”科技工作者、南京市建设精神文明标兵,江苏省授予“荣誉证书”、国家轻工业部授予的优秀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员奖状。

(责任编辑 霁明)



消费者投诉纪实

●
叶舟

千百年来,人们购买商品,总希望称心如意,价廉物美。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变化,在对价格可以承受的基础上,人们更看重物美。现代紧张的生活节奏,已容不得大家“货买三家不吃亏”,消费者往往看到喜欢的就买。于是,商店便如雨后春笋,据南京市鼓楼区工商管理部门同志介绍,仅该区就有略具规模的商店1000余家。在当今的消费经济大潮中,我们的商家是在遵循“买卖不成情义在,这回不买下回来”的遗训,着眼于整个社会物质文明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还是赚钱第一,只为短期捞一把,置消费者利益于不顾呢?

让我们来看看近期消费者的投诉吧:“我家买了一条合肥一家电子元件厂生产的电热毯,一切按说明书去做,不料却将毛毯、被子烧了几个大洞,要求厂方赔偿损失……”市中医院成浩医生说。“我们是家住大桥下面的铁路职工,前些天在山西路鞋帽商店买了一双皮鞋,几天就脱胶,向店主交涉多次,只说给修理,可是粘了又脱,要求退货……”。“我才在附近的个体摊上买了一只鸭子,回家发现有异味,要求调换,店主不认账……”。一位教师气愤地找到消费者协会。

在给消费者协会的投诉信中,反映的问题可谓无所不包:皮茄克、运动鞋、高档衣服、电冰箱、彩电、各类食品、乘车、吃饭……上至三四千元下至几元、十几元。有些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封封信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气愤至极。正如一位消费者协会的负责同志所说,部分商品质量有问题当然不能全怪商店,然而商店却应当而且可以协商处理好的。实际上,大量的消费者对购买商品的意见以及要求调换、退货已在柜台上得到解决,反映到协会来的往往是商店不认账,态度生硬,以致矛盾激化了。

“我是诚心诚意来买东西的,不是来买气受的。”许多顾客都这样说。一位顾客在山西路鞋帽商店替儿子买了一双福建某地产的运动鞋,穿了两天鞋面就多处开裂。那位顾客说,本来十几元钱也就算了,自己又住在东郊,那天恰逢“打击伪劣产品宣传月”,又正好再去山西路,便去店里询问,店里一位负责业务的男子一会说领导不在,一会又让顾客将发票、包装找来,左盘右问总想让顾客无法证明是在该店买的鞋。这位顾客来气了,硬要寻根问底,并不怕周折,往返数次,终于找到该店经理,谁知经理竟开口说:“鞋已穿了两天要收折旧费,15元只能退10元。”顾客不得已找到消费者协会,一鉴定,纯属伪劣商品,是用做人革包的皮做的鞋面,偷工减料,商店方面是

图利润大而进了货。

南京玉器厂一位周女士在投诉中说：“元月2号我在湖南路苏源时装店花168元买了一件毛线大衣，回家后因天太冷先没穿，过了几天天暖时拿出来一看，毛衣上有两个大洞。我就和姐姐到店里去换，同营业员怎么商量也不行。她们叫我找店里一个男孩，说他是负责人。可他只顾自己烫衣服，不理睬我。我只好把他衣服拿到一边叫他解决问题，他却凶狠地说我抢东西，并动手打我……”

这本是不该也可以不发生的事情。

更多的是推诿、拖延，使得顾客跑断腿、胀满气。省委办公厅的小潘同志今年初，在中山北路中国华侨旅游侨汇服务总公司江苏分公司买了一双福建产的与西德名牌同名的“飘马”高帮运动鞋，花了116元，仅穿10天，鞋面就开裂。他找到店负责人，那人说：“要退是不可能的，要么你把鞋放在我们公司，我们再去与厂家联系，大概要等几个月。”小潘说，我花了钱买鞋就是现在要穿，让我等几个月不是开玩笑吗？他找到消费者协会投诉，出面处理很快退了货。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重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宣传活动，以及省市消费者协会的积极努力，应当说消费者权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一些厂家、商店也开始有所重视。据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今年第一季度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分析看，总受理投诉件已由去年同期的430件下降到358件，其内容也有了变化：

一是家用电器类商品投诉大幅度下降。去年一季度有203件，今年同期则减少到105件，几近下降一半。其中电冰箱、电视机更由去年的91件和47件分别下降为34件和27件，下降幅度达60%和57%。其原因是电冰箱、电视机等大件家电多为名优产品占领市场，质量较好，“三包”又较落实，质量低劣的杂牌家电商品已难有立足之地。

二是日用百货类投诉上升。今年一季度的日用百货类产品投诉却增多且跃居投诉率的首位，达133件。其中最多的还是对鞋类的投诉，有69件。对皮茄克的投诉也达24起。消费者花了三五百元买的皮茄克往往不是严重掉色，就是多处破裂。有位姓股的顾客年初在一大商店花390元买的皮茄克穿了几次就多处掉色。小李在大厂镇某商场以410.80元买的一件彩色羊皮茄克，穿了三四次就发现多处开裂。可消费者遇到此情，要想退换，却往往很难办成，有的甚至跑了多次，花了时间、精力和路费钱不讲，还受了很多气。

不过，目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已有明显增强，一些过去想不到投诉的问题现在也晓得找消费者协会了。今年春节前夕，7425厂一位姓曹的女职工为孩子在金川交电商店买了“映山红”等烟花，可当她的女儿和表哥们按照“映山红”烟花的说明：手臂伸直、点燃引信后，烟火前端只冒出几点火星，下端却喷出一团烈火。孩子们欲扔不及，火射向手臂，立刻引起真空棉衣、羊毛衫、棉毛衫等衣物起火，并造成右臂灼伤。经送铁道医学院急诊后，诊断为“右手臂10×7cmⅡ°—Ⅲ°灼伤”，后注射破伤风和药用10余天治疗方才好转。曹女士经区消费者协会与金川商店交涉，商店先行赔偿，再与厂家联系，此事由双方同意赔偿曹女士医药费、营养补助、衣物损失200元而获解决。

在鼓楼区消费者协会，笔者还看到一位叫马梅的女士写来的感谢信。原来她曾在一家陶瓷店花194元买了一只110厘米大的搪瓷浴缸。可浴缸砌好后，仅用了两三次就发现表面冒气泡，气泡一破，露出了薄漆下的涂料，后来气泡越来越多，出现点点锈斑。“从买到砌好，共花去300多元。用吧，看着浴缸上的斑斑锈痕，心里着实不是滋味，还担心涂料是否对人体有害。不用吧，家里9旬老人洗澡怎么办？真可说是一进卫生间就来气，看到浴缸就发愁。可与商店交涉，店里却不认账。正当我们万般无奈之际，恰逢‘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我们抱着向协会试试看的心情，没想到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现在，每当我看到家里新换上的南京工业搪瓷公司光洁平整的浴缸就由衷地感谢消费者协会的同志们……”马梅女士充满感情地说。

是的，消费者协会同志们的工作确实令人钦佩，鼓楼区“消协”的张会长骑着车子奔来奔去，不厌其烦地帮助素不相识的消费者解决他们十分不快的“买气受”问题。老张的这种差事是“得罪人”的，哪家商店的头儿他不熟，谁能不讲个交情？可是老张毫不含糊，他说：“消费者的利益是第一位，如果那个经理因为我们处理了他们店的商品而忌恨我，那让他告好了，他最终会明白，这样做是为了你那个店有长久的信誉。”他告诉记者，对一些商店的“重合同，守信用，讲信誉”的评选要长期进行，发现不合格的，要立即撤掉。张会长说，现在还有不少群众对投诉的范围不够了解，我告诉大家，消费者协会受理投诉的范围主要有4方面。即：1.消费者对购买的生活消费品的质量、安全、卫生、价格、计量和销售方式等方面的投诉；2.消费者对服务质量、收费等方面的投诉；3.消

聚珍书局始末

徐 苏

金陵素称图书之府，刻书事业兴旺发达。明有南监版，较北监为精工。清有金陵书局、聚珍书局，所刊经史声誉竟在武英殿版之上。然岁月淹流，书局资料多已不彰。尤其是江宁聚珍书局，知者甚少。

据《续纂江宁府志》记载，清同治年间，江宁有二大书局。一是曾国藩创办的金陵书局，一是李鸿章创办的聚珍书局。聚珍书局建于同治六年（1867），曾得到皇帝的批准，“谕旨以道员一人掌之”。书局在管理上仿效金陵书局，实行提调管理制度，“主局事者为江苏题补道临川桂嵩庆”。其经费来源出自本省闲款。

在刻印方面，聚珍书局采用砌字本排印。字体清秀悦目，字迹印刷清晰，尤其是砌字本《三国志》在局本中享有盛誉，推为佳品。

聚珍书局立局后，曾用砌字本排印过《两汉刊误补遗》、《史姓韵编》、《棠阴比事》、《同官录》等书，还采用雕版刊印过《李氏音韵》、《宋名臣言行录》、《历代纪元编》、《历代地理韵编》、《皇朝一统舆图》、《呻吟语》、《五种遗规》、《学仕遗规补》、《皇朝舆地韵编》、《历代

地理沿革图》、《古文词略》、《唐诗近体》、《浪语集》、《杨忠愍公遗书》、《李氏史学五种合刻》、《曾文正公奏疏文钞合刊》诸书。初步统计先后刊书 25 种，713 卷。

聚珍书局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同治十年（1871）七月，江南盐巡道孙衣言以江宁士子寒畯者多难于得书为由，请于总督曾文正公调取金陵等官书局刻书藏于惜阴书院，以供当地士子借阅。亦曾从聚珍书局抽调了《李氏音鉴》等 10 余种书籍入藏，受到了广大寒畯之士的欢迎，促进了江宁书院的发展。

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征先生曾对聚珍书局刻书作过专门研究，将其所刻史书与金陵书局所刻史书相提并论。在《南监史谈》中称云：“同治中官书局复刊《十四史》，聚珍书局复排印《三国志》，则刻史之久且多，其亦白门之一特色矣”。评价是很高的。

在民国时期的有关著作中，论及金陵刻书事，除必提金陵书局刻书外，亦对“鸿章又别开聚珍书局，流布群籍”之事给予高度评价。

因此，目前流行的清同治时江苏官书局仅有金陵、苏州、淮南三处之说欠妥，应该加上江宁聚珍书局。虽然该局在光绪五年（1879）裁撤，是江苏裁并最早的一个书局。但作为一个历史上存在了 13 年之久，一个采用砌字本排印，有自己的刻书特色和影响的书局，不应该随时光的流失而无闻，应该恢复其在江苏书局史中的地位。

（责任编辑 惠 兰）



费者对文化生活方面的投诉；4. 农民对购买自用的化肥、农药、种子、地膜等生产资料的质量、价格、计量方面的投诉等。

他还提醒大家购买商品时要注意的问题。强调购买有固定包装的商品时，要注意标志，切忌购买无生产厂名、厂址只有拼音字母的东西，购买耐用家电商品要索取发票、“三包”凭证，当面通电试机。购买预交货款的商品要特别慎重，不要盲目购买邮售商品。不要购买标签内容不全、无保质期的食品等。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常可见一些消费者忧心忡忡抱着希望而来，不久又满面笑容，连声道谢而去。老张似

乎也在其中感受到深深的欣慰。

我们还欣喜地看到，不仅在南京，在祖国各地，消费者投诉均得到十分重视。全国各地都成立了消费者协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消费者权益。可以预见，随着消费者监督意识的增强，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商品质量在竞争中的作用，伪劣商品一定会在市场上日趋减少，目标远大的商业企业也终究会明了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关键，信誉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我们期望消费者的投诉越来越少，消费者对产品的赞誉与建议增多起来，以无愧于我们南京文明古城的今日新貌。

（责任编辑 宁 宁）

汪伪警卫三师

起义前后

● 范长琛

1940年汪伪中央政府建立后,汪精卫深深知道要使政权得以巩固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机构和嫡系的“中央”军事武装力量。因此也就办起了一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汪自任校长,由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在保卫南京时担任71军87师260旅被俘的旅长刘启雄担任中将教育长,为他经办策划伪军校的一切事宜。刘启雄通过伪军委会与日方的交涉,从日军的战俘营中,把黄埔军校各期的被俘军官要出来,安排在伪军校里担任教学与训练的工作,所选择的人员均经刘启雄考核过分别担任校部要员、各科教官、学员队各级队职官。1942年便建立了一所军官培养基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伪军校一经组建就绪,即在平、津、宁、沪、汉、穗招收失学失业并具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经过两年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毕业后分别派在汪伪首都警卫第一、三新成立的两个师和业已成立而改编的第二师里,担任连、排级军官。

新成立的警卫第一师驻于战前黄埔路中央军校内;警卫第三师陈孝强部分驻于光华门外旧工兵学校、中山门外旧全运体育场,通济门外七里街;警卫第二师秦汉卿部驻防安徽全椒一带。一、三两师在编练组训中,二师担负驻防任务。

1944年初春的一个夜晚,驻通济门三师八团有两个年轻军官,出城回营房,已逾日军规定的通行时间,年轻军官认为通济门是自己部队防区,在自己防区内岂能无权行动,双方争论不休,日军哨长以占领者姿态对他俩进行拳打脚踢并加以辱骂,最后才撵出城门让他们回营房。他俩受了一场有关民族尊严的侮辱,越想越气,便带了士兵前来冲砸日军哨所,后来日军出动一个中队包围了师部及所属部队,勒令交出“肇事”的军官,师长陈孝强不在师部,师值星官被迫只好交人。第二天伪军校毕业军官聚集师部要陈师长表态,陈孝强一面劝阻年轻人不要闹事,以免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一面竭力呼吁,请伪军事委员会以外交方式要回那两个年轻军官。经过伪上层的努力,两个青年军官虽然给放了回来,但已给日本军方打得遍体鳞伤,送34标伪中央医院

(今八一医院所在地)诊治。而陈孝强师长却无法推卸“失职”之错,终致罢官卸职。(陈孝强随即给调入参赞武官公署,挂个中将参赞武官名额。不久,他就潜离南京复回重庆,胜利后陈仪主持台湾省政时,他曾任台湾省警保处首任中将处长。)

在此事前,伪军事委员会里,有一个人正密切注视着伪府的一切动态,他是中共党员,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五期步兵科毕业的徐楚光同志,长期从事敌军策反及联络工作,他奉命打入伪军事委员会从事搜集敌伪军事情报工作,他的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参赞武官公署上校咨议。

他在工作首先结识了陈孝强,大家谈起来都是黄埔军校出身,陈孝强是二期学长,中条山一役被俘归顺“和运”投汪的,徐楚光自称在渝方失意才投向老师汪兆铭先生的。两人性情相投,徐就成了二条巷蕉园陈府座上常客。当徐谈到在“无咨可议”的情况下,实在有些无聊时,陈当即表示将为他请命,签请军委会派他到三师担任参谋长,由于出了“通济门”事件,所议只好暂时搁浅。

徐楚光在和陈孝强结识以前,先已交结了设在四条巷李家祠堂内伪军委会政训班当上校总队副的赵鸿学,以及因建立汪伪军校而撤销了的伪陆军教导总队队长职务的钟剑魂,徐认为他俩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作风正派,不赌不嫖,在伪府群贵中还不失为难能可取的上层军人。因此常在一起小酌、弈棋,有时也有意无意地议论起政局,发现他们尚有追求光明的意识,经常启发他们的民族自尊感和思想觉悟。

当钟剑魂担任警卫第三师少将师长后,他首先驱车至34标伪“中央医院”去看望那两个被日军打伤住院治疗的年轻军官,钟剑魂对他俩亲切问候慰勉备至,不但使年轻人觉得心情温暖,同室病友夸赞不止。钟剑魂湖南人。云南讲武学堂出身,曾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后加入红军,任营长,在攻打长沙时被俘并被编入国民党军队,抗日战争时期又被编入伪军。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此外,徐楚光见他平日除对全师官兵严格要求他们军事训练和遵守军纪以外,在生活上他

极关心士兵们的疾苦,警卫第三师在他掌握下,军队素质日益改观,可以说是汪精卫御林军中一支装备精锐、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从1945年开始,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力量已日趋途穷路末之势,徐楚光根据华中局“集中力量瓦解敌伪军队”的指示,便着手进行对汪伪警卫三师的策反工作。

一个星期天,赵、徐在钟府闲叙,话题转到警卫第三师七、八两团离开南京担任京畿防卫问题时,钟突然向赵鸿学问道:“鸿学!听说你在政训班给学员上课时,你曾经讲过新四军的好话,为此,你还给关过感化院,是吗?”

这时赵鸿学已在警卫三师担任政训处上校处长,他回答说:“是的,我所讲的不仅是好话,而且全是真话。”

钟又说:“那末,你在李明扬部任职时,有没有结识过他们一些什么人呢?”

赵答:“我认识他们不少人,奉李司令之命,我还跟陈毅军长有过接触。”

钟再问:“我师七、八两团将移驻江宁县境内和句容县境内,你能不能够设法问问他们,在这两个团的防地内可不可以互不相扰各行其事呢?”

在一旁静听他俩谈话的徐楚光插话说:“最近我听说他们有支队伍要经过淳化镇一带向茅山方面开去,如果巧遇,是不是可以从这里开一个头呢?”

钟答应立即通知王仁纲,没有师部的命令,不得随便发生攻防战斗(王仁纲是七团团长一笔者注。)

果然,一天夜晚驻守淳化镇的七团和新四军虽然交上了火,但时间不长,也未以攻防相峙,人员更无伤亡。

自此,徐楚光对钟剑魂便坦诚相告,钟师长也转变了他想投蒋的初衷,并表示决心倾向中国共产党,经过数次密商,他们准备以警卫第三师为基础,建立

一支地下军,在日军宣告投降的时候,配合新四军光复南京城。

八月初的一天临下班前,钟剑魂要赵鸿学用他的车子将徐楚光接到钟家商议要事。当徐楚光到达钟家后,钟剑魂就说:“上午我在军委会开会,散会后听到一个可靠的消息,根据目前形势,军委会为应变起见,对一部分人事有所更动,在下次会上将讨论我的职务调动问题,对此,我们应有个未雨绸缪的打算才行。”

赵鸿学快人快语说:“我们不如抢在前面,把部队拉出南京城,到江北投新四军去!”

徐楚光接着说:先让我急电向上级请示,候复电再作决定,在此期间还望师座从速做好应急准备。

上级回电要他们火速行动,以免贻误良机。钟剑魂随即向驻守南京外圈的七、八两团发出如下电令:顷奉军委会令,为巩固首都京畿之安全,我师有扫荡六合地区共军之目的,希接电后立即由驻地开赴六合东郊丁沟集结待命,勿稍延误,务各凛遵,切切此令!

电文发出后,他亲率师部及直属部队,由城外绕道开赴六合,汇合六合城外的第九团,骗过守城日军,说是奉命扫荡东郊一带共军,顺利渡江。第七团、第八团两团过江时,只七团一个营过了江,其他被敌人发现,受阻于江南,八月十三日钟剑魂率领汪伪首都警卫第三师三千余人,携带轻重武器、弹药粮秣、通讯设备开进了苏北六合解放区,当地政府军民在钟家集举行了一个空前的欢迎大会。

部队起义后,备受华中局领导同志的表扬,不久,部队给改编为独立第一军,由钟剑魂任军长、刘贯一任政委、徐楚光为副政委兼参谋长、赵鸿学为第一师师长,钟剑魂、赵鸿学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钟剑魂及其所属官兵,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解放大道,奔向了光明前程。(责任编辑 惠兰)

(上接第33页)

政权,其乐如何。如其被人宰割,呻吟于强权之下,其苦痛又若何。诺那深信吾五族无分裂之理,深信吾国家必能独立自由,深信我政府必能抵御强敌。爱奉忱悃,望我满蒙贤达,本佛教大无畏之精神立志拥护中央,共济时艰。若有长策至计,亦望各抒谏论,以冀邦国,曷胜追望,谨电奉闻。

蒙藏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西康诺那呼图克图于南京”

这封电报,发表在六十年前,代表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信心,也表达了诺那那个在大是大非面前正气凛然的气魄。

4、诺那是西藏人,为什么又称为西康的呼图克

图?做为西康宣慰使,是否率兵与红军作战?

民国初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将四川西部改土归流的一部分地区,与西藏东部的昌都等地,合并成立西康省。诺那庙的领区在昌都西,也随同划归西康。所以称为西康呼图克图。诺那自1918年被达赖俘获,十余年没有回去,原来所领藏兵,早已星散。四川的军队正与诺那闹磨擦。所以宣慰使是一个不带兵的空头文官。并没有与红军作战的力量。红军也没有虐待诺那致死,或是暗中谋害诺那的必要。恰是有一批极右分子,执行了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有意捏造事实,挑拨藏族和诺那信徒与红军的感情,编造了许多谣言,纯属虚构,不足为信。

(责任编辑 宁宁)

对诺那的几点补充说明

● 赵家璧

史志今年第四期,登载了李源同志《玄武湖畔的喇嘛庙和诺那塔及诺那人》一文。有些同志向我询问一些有关诺那呼图克图的问题。仅就个人所知,作一些补充介绍。

一、诺那呼图克图位号的来源及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诺那呼图克图的位号,开始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此之前,元明两朝都封为诺们罕(元代封为大法王的称谓,稍次于呼图克图)。康熙为了平息假达赖之乱,驱逐攻陷拉萨的厄鲁特蒙古叛军。自康熙五十七年出师,到五十九年收复拉萨。在大军入藏时,诺那庙的两位法王,拥护进军,因此,改封为呼图克图。(凡得此封号的,均可呼毕勒罕。这是蒙古语。即化身转生之意。有此名位的,身死之后,能够不昧本性,世世转生。仍能接替其前生职位。俗称活佛。)当时,只有大呼图克图和二呼图克图。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进兵后藏,劫掠扎什伦布大批财物及人畜。乾隆帝陆续派兵进藏协助抵御。并调两广总督福康安总领大军督队赴援。直入廓境七百余里。廓尔喀请降,每五年进贡一次,永为藩属不变。事后论功行赏。诺那庙的僧官桑吉依吉。协助福康安讨伐有功。被封为三呼图克图。玄武湖的诺那呼图克图,就是桑吉依吉的七世转生活佛。(见熊禹诒撰诺那呼图克图略历,藏二档馆)。

由于达赖和班禅都是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士的弟子,在西藏处于政教领导地位。诺那一系是红教莲花生大士的弟子,在西藏处于协助地位。在政治方面受驻藏大臣的管理,在宗教上受达赖、班禅的制约。诺那庙的两次受封都是由于中央政权(当时为清政府)的厚爱。所以对维护统一拥戴中央政权的向心力特强。从七世诺那佛的一生来看,也是始终以维护祖国统一为目的,历尽艰辛,奋斗了一生。

二、李文中所提到的“白马冈之役与波密之役”是怎么回事?

这是诺那呼图克图率领藏兵与分裂主义者直接或间接战斗的两次战争。

在白马冈地方有座宏都波章山,上有莲花生大士的道场,红教信徒当作圣地,都要去朝拜。1901年诺那带了一个弟弟去朝圣。那个地方杂居着野番,其中有些野番信奉黑教,是莲花生大士一千余年以前,

自印度到西藏弘扬红教时,灭掉的黑教后裔。野番将诺那的弟弟杀死,诺那一人逃回类务齐的诺那寺,留下二呼图克图留守,与大呼图克图率领藏兵去问罪,战争进行了三年。野番大败,占领了上白马冈等地。野番请出了幕后支持者,英国的传教士,从中调解。将上白马冈一带归红教所有,往来朝圣从此不再过问。此即白马冈之役。

1908年达赖派兵侵入川东昌都地区,四川总督赵尔丰派兵阻止。波密地方是川兵进藏的必由之路。达赖的军队与波密地方的军队连成一气阻止川军。形势十分危急。诺那与大呼图克图应拥护清朝政府的人请求,出兵协助川军,将达赖的军队驱逐出境。从此诺那与达赖关系破裂,形成水火。

三、李文中说诺那曾打电报给溥仪“请勿为异族利用”此事原委如下: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我国陆军,不久席卷东北三省,并扬言将进攻华北。举国震惊,纷纷请战。但也有少数官僚政客、失意军阀,企图利用日本势力,不惜卖国之耻,再次登台逐利。在这种情况下,诺那毅然通电,呼吁平津满蒙的王公喇嘛,不要为敌人利用,不要分裂祖国,表现了藏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的一片热诚。现将通电原文抄录如下。

“天津前清逊帝暨各王公;北平、奉、吉、黑各王公,各盟旗长;各扎萨克;各活佛、喇嘛钧鉴:

自日本强占东省,我五族人士,悲愤填膺,全国人民,枕戈待旦。不意倭以迫于公理,不能即逐狼吞,乃欲傀儡我华胄,假复辟独立之名,实行被侵吞满蒙之策。窃念吾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不特历史甚深,安危素共,即千百年来,与汉族血统亦久有关系,而彼此之佛教信仰,尤足以维系吾各族垂危之人心,于永久不歇。前清皇室,应顺潮流,取消帝制,其革命精神,当推先进。逊帝少年英俊,学识宏通,各王公多国家柱石。际此外患迫切,甚望团结一致,共挽危艰。外侮频陵,即是内政革新之日。我五族人士,均有维持之责,即均有参与政权之利。换言之,即吾五族优秀之士,均有享受中央政权,并策进国家安定发达之任务。年来外忧内患,形禁势格,若努力底定之,则大好疆域,锦绣河山,吾五族子孙,得自由居处,自由行使(下接第32页)

范鸿仙 与 南京光复



方晓

武昌起义的炮声,震撼了祖国大地,辛亥革命的烈火燃遍了全国,各地纷纷举起了起义的旗帜。

此时的南京城又是一番什么情况呢?清军驻有四大兵系:清江南提督张勋率领的江防军、江宁将军铁良所统的旗营、两江总督张人骏统领的巡防军、徐绍桢率领的新军第九镇把守着南京,光复南京,硬拼是不行的。

同盟会驻上海机关部开始策划,响应武汉起义的问题,宋教仁对范鸿仙说:“目前形势武汉最重要,我即去,你负责南京,可速约柏文蔚南下(时柏在东北),共商光复南京之事。”范即一日三电,催柏南下。不几日,柏即来沪。此时黄兴也由香港赶到上海,由其妻徐宗汉到《民立报》约宋教仁、范鸿仙相见。经商定由范鸿仙、柏文蔚亲往南京策动新军反正,黄兴、宋教仁去武汉。

当时上海、湘、陕、赣、晋、滇、黔、浙、皖、苏各省都先后光复,光复南京迫在眉睫。两江总督张人骏又叫嚣要决一死战,就在此紧要关头,范鸿仙亲自到达南京。他分析了形势,新军官兵过去多受赵声等人宣传反清的影响,思想基础较好。加之张勋、铁良之流歧视新军,百般刁难,他们怀疑新军军心不稳,将新军调至秣陵关防守。将大量武器弹药发给他们嫡系部队,而发给新军每人只三粒子弹。徐绍桢屡次请求增发弹药,均未获准。新军群情愤慨,反清思想进一步激发。范鸿仙根据这一有利时机,与徐绍桢推心置腹的相谈。范曰:“满清无道,百姓分崩,今义师奋起,海内响应,此天亡之时。将军明德英才,总兹戒重,苟动枪鼓,扶义征伐,孰敢不从?以此诛锄胡虏,匡济华夏,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分析形势,指出前进方

向。范鸿仙这一番分析,徐绍桢听了刻骨铭心,消除了犹豫不决的心态,毅然答允,率新军起义。但是当时新军有枪无弹,为了筹措枪支、弹药,范鸿仙立即返沪,与陈英士、于右任等人抓紧筹措大批枪支弹药,交由柏文蔚运往南京。但是徐绍桢在弹药尚未运到之时,因起义机密泄露,被迫提早发动起义,在进攻雨花台时,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新军终因子弹缺乏受到清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败退投奔镇江林述庆。

根据当时客观形势,孤军作战,势难获胜。范鸿仙又与陈英士、于右任等策划,组织浙江、上海义军为江浙革命联军赴镇助战,军威大振。公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范鸿仙、于右任、史久光等为顾问,徐绍桢新败之余,得范鸿仙等革命党人知遇力助,乃感激用命率部反攻,屡战屡胜。于1911年12月2日,革命联军攻克南京,张勋逃走。范鸿仙、于右任、宋教仁、黄兴、章炳麟等皆感兴奋,联名给联军拍发贺电。

联军入城以后,林述庆自以功高,进驻两江总督衙署,自称都督,遍贴布告,引起各友军严重不满,共推徐绍桢为都督,与林对抗,大有水火不容之势,准备炮轰衙署。上海机关总部获悉后,立即派出宋教仁、范鸿仙到南京向各方面调解。由宋教仁主持会议,大家认为林述庆、徐绍桢任江苏都督皆不合适。根据当时客观情况,仍由程德全担任比较妥当,宋教仁、范鸿仙、柏文蔚为传达公推程德全为都督,旋即赴林述庆处,讲清道理,请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林即交出都督印,徐绍桢被推为南京卫戍司令。一场即将爆发的“内讧”才得平息。迎来了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为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4月3日国府明令中指出:“先烈范鸿仙,性行忠烈纯,才略优迈,辛亥光复时,纠合义师,力克金陵,厥功甚伟,讨袁之役,转战皖沪间,屡濒危殆,百折不回。乃大志未偿,被狙殒命。追怀遗烈,轸悼弥深,亟应特予表彰,以阐潜德。范鸿仙着追赠陆军上将,用示国家崇报忠烈之至意,此令。”并于1936年将范鸿仙国葬于中山陵园区内。“文革”中墓被毁,1973年国务院指示江苏省给予修复。

范鸿仙,名光启,安徽合肥人。主办《民呼》、《民吁》、《民立》三报。年仅32岁即被袁世凯派人谋杀于上海。他的革命的一生,为国立功勋,为民树楷模。这里简述了他在南京光复革命中有关的事迹,作为对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纪念。

(责任编辑 淑玉)

朱德过宁属前后

朱德自1909年由四川赴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8月在讲武堂毕业后,就一直留在滇军中工作。

1921年2月,唐继尧挑起事端,发动滇军打川军,不得人心,群起反对,被赶出昆明,逃往蒙自。朱德出任云南警察厅厅长。

1922年3月,唐卷土重来,直捣昆明。20日,当昆明即将被攻陷的时候,金汉鼎(铸九)、朱德(玉阶)、唐淮源(沸川)、谭兆福(佑斋)、刘云峰(晓岚)等人,带着机枪连和警卫连,冲出西关,直奔楚雄,打算经镇南(今南华县)到大理进缅甸。刚行至广通,获悉滇军驻楚雄司令华封歌已叛变国民革命军,倒向唐继尧,拒绝他们入境。他们只好绕道镇南,转经姚安、大姚、永仁,日夜兼程走了五天五夜,历尽艰辛,才到达金沙江边的陶家渡过江。当晚住今四川攀枝花市大水井伍祥祯(曾任北洋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家。次日由伍之弟带路并送往盐边县棉花地(今攀枝花市同德街),找到在滇西北专门打富济贫的雷云飞,雷将他们接到乌拉(今攀枝花市务本乡)家中住下,朱德等人将所剩的60名卫兵及长枪60支,短枪8支,大黑马1匹,全都交雷云飞收留存放。雷派叔伯兄雷星如(四川德昌人)带6名贴身精干人员送朱德等人渡过了雅砻江,溯安宁河而上,直奔今四川米易县垭口乡。此时已是阳春三月,安宁河峡谷两岸早已披满绿装,报春的攀枝花开得火红,好象对朱德一行笑脸相迎送。脱离了追捕险境的朱德,一路谈笑风生,更使他高兴的是,垭口有他讲武堂的先后同学扶世权,多年不见,今天就要相见谈心了。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朱德一行到了垭口,受到扶世权全家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垭口歇息了三日,畅叙离别情意,谈革命与人生。此时正值扶世权家新居落成。临行前,朱德亲自书写对联一副,送给扶的父亲,提款是焕章老伯新居志喜,落款是朱德敬贺,其联曰:

子瞻却喜文与可 鲁直深知李伯时

又送给扶德造二十响短枪1支,大花马1匹。朱德走后,枪和马被会理军阀苏海澄勒逼抢去。对联保存到解放初,以后则下落不明。

后扶世权受朱德之邀,前往成都谋事。任江油县典狱官,数年后返乡任团总,抗战胜利前辞职赋闲家居,1951年病死狱中。

朱德一行离开垭口,经挂榜、乐跃、麻栗到马道,翻上瑶上,西昌城在望,雷星如护送任务完成,就此驻足。护送半月朝夕相处,行程数百里感情逐增,在朱德乐观主义的影响下,雷对朱非常敬重,依依惜别,互道珍重,朱德当即摘下佩戴的一支手枪送给雷星如,雷深表谢意而不受,谓枪乃朱德防身之物,只要枪穗作纪念,朱德将枪穗取下送给雷。并嘱其代为寻找在渡金沙江时失散的刘晓岚,雷允诺告别。后经雷云飞多方打听,刘被一彝族伪营长所掳在押,雷以四千银元赎出,辗转护送回成都。1926年,雷云飞被川边军驻两盐(即今四川盐源、盐边两县)的团长蒋汝珍诱骗杀害。

解放后雷星如曾给朱德写信。朱德曾回信,经人民政府层层下达,护送属实,请当地政府照顾。以后雷星如被选为德昌县人民代表,1955年病故。

朱德一行到西昌后,找到川边军驻西昌的旅长孙养斋,由孙派人护送经富林到乐山,5月中旬抵南溪。

这就是朱德由滇返川第一次过宁属。第二次当然是长征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宁 宁)

四十年来

外国首脑

郑永喜

索马雷(巴布亚新几内亚)

1976年10月11日至17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迈克尔·托马斯·索马雷应邀访问我国,访华期间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决定自12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索马雷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独立后首位访华的巴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36年4月,毕业于索格里师范学院,曾任教员、记者、议员和联盟党议会领袖等职。

博卡萨(中非)

1976年11月15日至22日,中非共和国总统、中非革命委员会主席萨拉赫·阿丁·艾哈迈德·博卡萨应邀访问我国。中非共和国于1960年8月13日独立,1964年9月29日与我国建交(1966年1月6日中断,1976年8月20日恢复)。博卡萨是首位来华访问的中非共和国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21年2月。1966年1月宣布接管达科政府后任总统、总理兼国防、司法部长,1972年3月任终身总统和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终身主席,1976年9月政府改为革命委员会,出任主席。

哈姆迪(阿拉伯也门)

1976年12月20日至26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哈姆迪中校应邀访问我国。哈姆迪出生于1943年,毕业于萨那军事学院,1967年起先后任内政部副部长、总后备部队司令、副总理、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等职。1974年6月发起“纠偏运动”,接管埃里亚尼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指挥委员会,任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齐亚(孟加拉国)

1977年1月2日至6日,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军法官制首席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少将应邀首次访问我国。孟加拉国于1975年10月4日

与我国建交。齐亚是孟加拉国成立后首位来华访问的孟领导人,他出生于1936年,毕业于巴基斯坦卡库尔军事学院。1969年后在第二、第八东孟加拉团任职,1971年3月,穆·拉赫曼宣布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他以“孟加拉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孟加拉国独立。孟独立后他任陆军参谋长,1976年11月接管赛义姆总统担任的首席执行官职务。

阿瑟·钟(圭亚那)

1977年4月18日至5月6日,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雷蒙德·阿瑟·钟应邀访问我国,这是中圭1972年建交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圭国家元首。阿瑟·钟出生于1918年1月,就学于伦敦中殿律师学院。回国后开设律师事务所,1953年后任法官等职。1970年2月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成立时被选为首任总统。

戈马(刚果)

1977年6月16日至21日,刚果军事委员会第二副主席、政府总理路易·西尔万·戈马应邀访问我国。他出生于1941年6月,在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去法国昂热工程兵学校深造。1964年回国后先后任连长、工程兵副司令、国家人民军参谋长和总参谋长。1975年12月任总理兼计委主席,1977年3月任党的军事委员会第二副主席、政府总理兼计划部长。

铁托(南斯拉夫)

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应邀访问我国。铁托是来华访问的第一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出生于1892年5月,1920年9月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7年任南共总书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并创建了人民

访华录

蒋永才

军。1943年11月当选为南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即临时政府)主席,1945年任联邦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1952年11月南共“六大”将南共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任总书记,1953年起任联邦共和国总统。1966年任南共联盟主席(1974年开始任期无限),1974年任南终身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人之一。

孔切(尼日尔)

1977年9月18日至23日,尼日尔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应邀首次访华。尼日尔独立于1960年8月3日,1974年7月20日与我国建交。孔切是首位来华访问的尼日尔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31年,就学于塞内加尔圣路易士兵子弟学校,曾在法国弗雷儒斯军官学校和巴黎参谋学校进修,后转入尼日尔军队,1967年起先后任尼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1974年4月宣布接管迪奥里政权,成立尼最高军事委员会并任主席、国家元首兼经济发展部长。

马西埃(赤道几内亚)

1977年9月20日至27日,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马西埃·恩圭马·比约戈·涅格·恩东应邀访问我国。赤道几内亚于1970年10月15日与我国建交。他出生于1924年,1964年赤道几内亚自治政府成立,任副总理兼公共工程部长,1968年10月赤道几内亚独立后就任首任总统兼国防部长,1972年7月为全国统一劳动党终身主席和共和国终身总统。

波尔布特(柬埔寨)

1977年9月28日至10月4日,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应邀率柬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波尔布特出生于1928年5月,1949年留学法国,1953年回国参加了柬埔寨共产党(原名高棉共产党)的建党活动,1960年9月在柬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常委,之后任过党中

央副书记,代理书记,1963年在柬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70年至1975年人民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战场军事指挥部主席,1976年4月在柬全国解放后举行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政府总理。

巴尔(法国)

1978年1月19日至24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理雷蒙·巴尔应邀访问我国。巴尔出生于1924年4月,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巴黎大学法学院和经济学院。1959年起参加政府工作,曾任法驻欧洲经济共同体首席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法外贸部长等职。1976年8月出任政府总理。

江萨(泰国)

1978年3月29日至4月4日,泰王国总理江萨·差玛南应邀访问我国。他出生于1917年12月,毕业于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泰国武装部队参谋学院和国防学院等军事院校,获哲学、法学博士学位,1940年起先后在军队、军事学院、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处任职。1971年11月任泰“革命团”成员,1973年晋升为上将,1974年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1977年10月任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同年11月任泰总理兼内政部长。1978年2月起任泰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

纳赛尔(民主也门)

1978年4月24日至28日,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应邀访问我国。纳赛尔是两国1968年1月建交后首位访华的民主也门政府首脑。他出生于1939年,1963年参加“民阵”,从事武装斗争。1967年南也门独立后任省长、部长等职,1971年8月出任政府总理、总统委员会委员兼国防部长。

勒内(塞舌尔)

1978年4月29日至5月4日,塞舌尔共和国

总统弗朗斯·阿尔贝·勒内应邀访问我国。塞舌尔于1976年6月30日与我国建交。他出生于1935年11月,先后在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学。1964年创建塞人民联合党(现人民进步阵线)并任主席。1976年6月塞独立时出任总理兼土地整治部长,1977年6月宣布接管政权出任总统兼解放军总司令等职。

哈比亚利马纳(卢旺达)

1978年6月8日至14日,卢旺达共和国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少将应邀首次访问我国。卢旺达于1971年11月12日与我国建交。他出生于1937年3月,先后在金沙萨大学学医、基加利军官学校受训。1963年任国民警卫队参谋长,1973年6月获少将军衔,7月接管卡伊班达政权,宣布成立和平和全国统一委员会任主席,8月出任第二共和国总统兼国防部长。

马拉(斐济)

1978年6月11日至16日,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应邀首次访问我国。斐济于1975年11月5日与我国建交。他出生于1920年5月,就学于新西兰大学附属奥塔戈学院、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1967年任斐济首席部长,1970年10月斐济独立后任总理。

卡洛斯(西班牙)

1978年6月16日至21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索菲娅应邀访问我国。西班牙于1973年3月9日与我国建交。卡洛斯国王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西班牙国家元首。他出生于1938年1月,1947年被选为西班牙未来的国王。1955年起先后在军事学院、海军学校、航空研究院受训,获陆、海、空三军上尉衔,1960年又入马德里大学,大学毕业后开始从政实践,1975年11月佛朗奇病逝后登基,任国王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托尔伯特(利比里亚)

1978年6月19日至29日,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威廉·理查德·托尔伯特应邀访问我国。利比里亚于1847年7月独立,1977年2月17日与我国建交(1989年10月9日多伊政府宣布与台湾当局重新“建交”后,10日我国宣布中止与利的外交关系)。

索科伊内(坦桑尼亚)

1978年9月12日至15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理爱德华·莫林格·索科伊内应邀访华。索科伊内出生于1938年,1965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1972年2月任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1977年2月出任坦桑尼亚政府总理。

马卢姆(乍得)

1978年9月20日至27日,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恩加库图·贝恩迪将军应邀访问我国。乍得于1972年11月28日与我国建交。他出生于1932年9月,1949年从刚果布拉柴维尔军官子弟学校毕业后到法国海军训练中心受训。1960年乍得独立后,他回国参加军队建设,1971年12月任国民军参谋长,1972年任武装部队总司令。1975年4月托姆巴巴耶政权被推翻后,他出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后兼任临时政府总理。1978年8月乍得组成民族团结政府,出任总统。

洛佩斯·波蒂略(墨西哥)

1978年10月24日至30日,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应邀访问我国,访华期间北京大学授予洛佩斯·波蒂略以名誉教授的称号。洛佩斯·波蒂略是墨西哥国家学说理论家,他出生于1920年6月,就学于国立自治大学,留学智利。1976年12月就任墨总统。

托恩(卢森堡)

1979年1月23日至29日,卢森堡大公国政府首相兼外交、国民经济大臣加斯东·托恩应邀访问我国。卢森堡于1972年11月16日与我国建交。托恩出生于1928年9月,就学于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洛桑大学和巴黎大学,曾任卢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和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主席。1969年起任外交和贸易大臣,1974年6月出任卢首相。

巴加扎(布隆迪)

1979年3月17日至20日,布隆迪共和国总统让一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应邀访问我国。布隆迪于1963年12月21日与我国建交(1965年1月29日中断,1971年10月13日复交)。他出生于1946年8月,就学于布鲁塞尔军官学校和皇家军事学院。1971年9月回国,先后任军校教官、总参后勤部长、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参谋长。1976年11月宣布接管米孔贝罗政权,成立最高革命委员会,任主席和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奥恩(马来西亚)

1979年5月2日至9日,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应邀访问我国。奥恩出生于1922年2月,就学于柔佛新山英文学院,1940年入伍,数年后随英军返回马来亚,退伍后在行政部门任职,五十年



77年9月 邓颖超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

代初去英国林肯律师学院深造,回国后当过律师。六十年代后期与连襟拉扎克合作。1970年9月起任拉扎克内阁的教育部长、副总理兼贸易和工业部长。1976年1月在拉扎克总理病逝后继任马政府总理。

吴貌貌卡(缅甸)

1979年7月9日至13日,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吴貌貌卡应邀访问我国。吴貌貌卡出生于1920年6月,就学于仰光大学,参加过抗日起义,创建过军火工厂。1963年起先后任国防部工业处长,工业部副部长,工业、矿业兼劳工部长等职。1977

年3月任总理。

普雷马达萨(斯里兰卡)

1979年8月13日至20日,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应邀访问我国。他出生于1924年6月,就学于洛伦兹学院和科伦坡约瑟夫学院。任过反对党议会党团领袖和统一国民党副领袖,1978年2月任总理兼地方政府、住房和建筑部长。(之四)

(责任编辑 霁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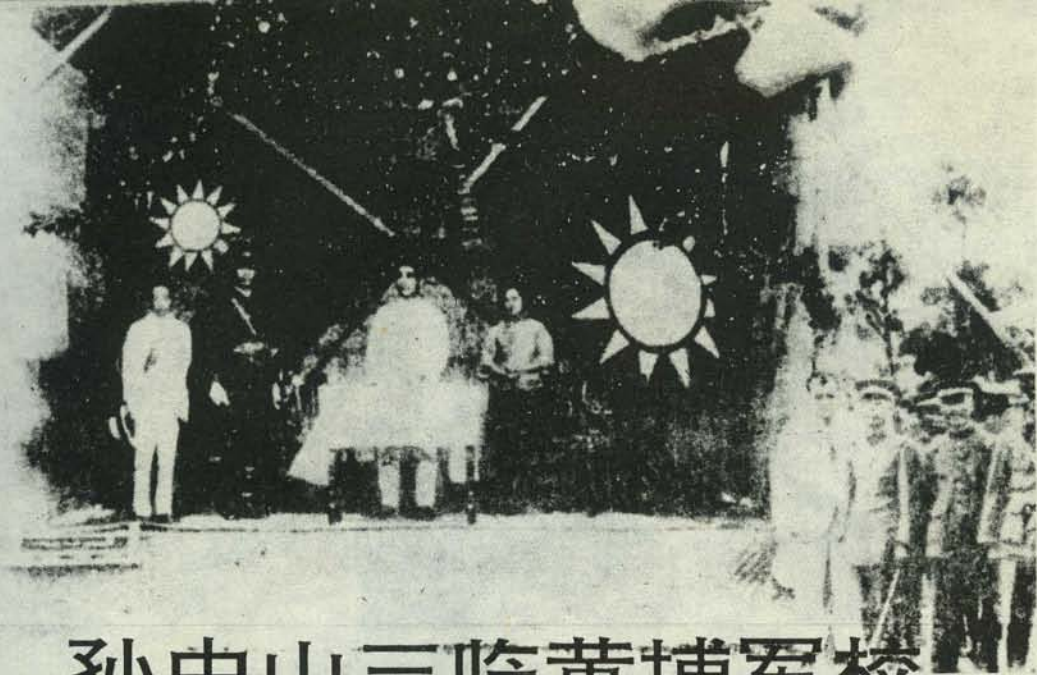
戴季陶窖藏

典籍之谜

在国民党元老中,戴季陶可说是个特殊的人物。他位尊权重,与蒋介石也算得上是“出科弟兄”。1927—1931年期间,他担任考试院院长时。(史志编者按:1928年8月蒋介石宣布实施“五院制”,考试院实际成立时间为1930年,戴于此时任院长),职高衙冷,闲来无事,忽发奇想——要为后人留下一个“秘藏”。考试院院址在南京清凉山麓(史志编者按:院址不在清凉山,而在距此七里之外的鸡鸣山下今市政府大院,当时戴的府邸在清凉山麓。)他命人在山麓

掘了一个极深的地窖,象南宋遗民郑思肖埋藏《铁心史》那样,将一批典籍也用铁匣子密封起来,深埋在窖中,并且宣布,非到一千年后不得开掘。此事至今已过去了六十个寒暑。当时报纸上虽有报道,但只是些简短的消息;至于他究竟于何时埋藏于何地?那密封的铁匣子里面究竟藏的是些什么珍稀的典籍文物?外界全然不知。事隔一个甲子,戴氏本人早已作古,尚记得此事的存世之人也已不多了,在我却一直萦系于心头,今日特将它公诸于众,以了却我多年的心夙。也寄希望于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人文研究单位,或因此有所记载,以期千年之后,后人得以按图索骥,将这批文物发掘出来,让那时的人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这位先人,为他们埋藏下什么典籍,也可为史家留下一段佳话。

(转自《上海滩》周劭作)



孙中山三临黄埔军校

● 冷春煦

中外闻名的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师生在东征、北伐、抗日中的战功已经载入中国革命史册。今天回忆黄埔历史，是希望唤起大家振兴中华民族的共识，献身改革，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黄埔军校是1924年成立的。那一年中，孙中山曾先后三次到黄埔军校讲话。

第一次是1924年6月16日，那一天，是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孙中山乘专用汽艇“大南洋号”，从广州珠江对岸大本营到黄埔军校。汽艇一直驶到军校门口码头，470名黄埔学生，大家穿着新发的草鞋，排队在军校门口，欢迎孙中山先生。

上午8时，孙中山和孙夫人走在前面，后面随行人员有胡汉民、吴敬恒、林森、谭延闿、张继、邵元冲、孙科、许崇智、李福林等文武官员。进入校门，孙中山和孙夫人等由蒋校长、廖党代表陪同进校总理室休息。

上午9时，孙中山在军校大礼堂开学典礼仪式上，将黄埔校印亲授与蒋介石，接着对黄埔学生讲话。他说：“中国革命有了13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名号，没有民国的事实，说明了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开办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500个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

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甚么人物做标准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

“……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里头就是视死如归。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以后，能够革命成功，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欢迎为革命而死。”……孙中山在一个多小时讲话中，反复讲述“死”的革命哲学，使全体黄埔学生受到极大的鼓舞，很深的教育。

讲话结束后，孙中山还亲书写“亲爱精诚”四个字，作为黄埔军校的校训。

上午11时30分，胡汉民宣读孙中山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一篇短短48个字的训词是孙中山在“大南洋号”汽艇中，指示高级文官拟定的，由胡汉民用全碑隶体书写并宣读。以后黄埔军校特为翻印，全校张贴，军校学生个个都能背诵。

那次开学典礼上还没有国歌，只是奏国乐，唱黄埔校歌。歌词全文是：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军人，奋斗牺牲；再接再厉，继续先烈精神！同学同道，以学以教；生死与共，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下午三时，在军校操场上举行阅兵式，孙中山先



孙中山和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
在庆祝大会上

生亲临阅兵。坐在阅兵台上的还有宋庆龄、廖仲恺、蒋介石，台下分站着蒋先云、李之龙、冷欣等，他们是队伍前进的标兵。（见照片）阅兵指挥官是教练部主任何应钦。

第二次是同年8月31日。黄埔学生在军校门口排队迎接孙中山到军校视察。孙中山身穿米色翻领学生服（中山装），面容严肃，走进校门后，即进入校总理休息室和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等人商谈扣留商团私运的武器处理问题。

广州市商团是1913年建立的。这支由帝国主义买办豢养的雇佣军，广州群众称他们是纸老虎。商团团长是由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兼任。他们受陈炯明和英帝国主义煽惑，阴谋用武力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反动商团准备扩充武装力量。他们向香港德商顺金隆洋行购买各种枪9840支，子弹337.42万发，于8月8日由悬挂挪威旗之丹麦商船“哈佛号”货轮偷运入境，被长洲要塞司令部“江固号”军舰在白鹅潭水面发现扣留。8月10日“哈佛号”货轮被监押到黄埔军校码头，没收了枪支弹药。

8月12日，商团2000多名团丁包围了孙中山大元帅府，要求孙中山说明没收武器的理由。孙中山回答说：武器是非法运进广州的，政府理应没收。会谈破裂后，商团宣布罢市。罢市由佛山开始蔓延到全省，商团军还沿街散发反革命传单，1924年10月10日，商团军竟在广州屠杀游行示威群众，还张贴威胁孙中山下野的布告，用武力胁迫商人罢市，准备和英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广州政府，情况危急。孙中山便以到黄埔军校视察为名，商量解决办法。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决心镇压商团叛乱，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委员会，亲自担任会长。10月14、15日，动员了黄埔学生的一部分革命军队，在广州革命工农的支援和工团军的参战下，经过数小时激战，终于击溃了反动的商团军。

第三次是同年11月3日。孙中山应冯玉祥将军邀请决意北上，准备由广州到香港，转日本神户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在去北京前，他亲临黄埔军校

告别。这一次，孙中山面色沉重，也有点憔悴。他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广东大学的学生，大礼堂中，文武合流，各坐一边，共同听孙中山的告别辞。

孙先生说：“诸君

今天在这里听讲的，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黄埔学校合影有文学生，也有武学生。我今天到黄埔军校来讲话，是向黄埔的学生辞别，辞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到北京去。……北京也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造成一个革命的基础……我为答北方同志的欢迎起见，决定去北京。”

“……你们黄埔的武学生，都是从各省不远几百里、或几千里而来，到这个革命学校来求学，对于革命，都是有很大希望，很大抱负的；广东大学的文学生，今天也是不远几十里到黄埔军校来听革命的道理，研究革命的方法，对于革命，也当然是很希望成功的。大家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个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革命，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只有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成功。”

“我今天到此地讲话，就是要大家把自己的聪明才力，都贡献到党内来革命，来为理想奋斗，革命便可以成功！中国便可以富强。”

孙中山讲话后，又到对岸鱼珠炮台，看一部分学生为军事演习做的工事。孙先生看了很满意，他对站在周围的黄埔师生刘尧宸、金佛庄、陈廉、贺衷寒说：“我这次去北京，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去奋斗，我今年已59岁了，看到你们黄埔师生的革命精神，相信你们一定能继续我留下来的革命事业，一定可以继承我的未竟之志。这次北上，不论成败，决不回来，革命大任交黄埔军校同志负之！”这是这位伟大斗士在不到两个月时间中，第二次讲到自己身后的问题。另一次是在50天前。那是9月13日在广东韶关看黄埔军校学生演习后，对护卫他的蒋先云、曾扩情等人讲的。这一定是他已经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后的预言。可惜的是他没有看出蒋介石是个革命投机者，也没有预测到蒋介石等人后来背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责任编辑 淑玉）

（总355）• 41 •



始创时的晓庄师范和冯玉祥

● 邵仲香

1928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北郊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晓师)。

创办之初,陶先生找到我,说要办一所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为选校址与我磋商,开始,我愿献出自己在南京东北郊迈皋桥乡经营的黑墨营农场,由于范围太小,又离公路甚远,交通不便,最后我们终于选定了南京北郊余儿岗西崂山脚下地名小庄的一片无主荒地,余儿岗是宁燕公路上的一个小站,南距和平门约八、九里,北离燕子矶四、五里。小庄是傍崂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此处地势平坦宽阔,前有荒芜的水田一片,可供学生进行各种农耕实习,后靠崂山,虽名为山,实是一个小山丘,因山坡平缓,便于开垦,植树建园。清晨站在崂山顶上,面向东方看去,一轮旭日东升,华光四照,景色十分诱人,陶先生便据此把“小庄”更名为“晓庄”。

晓师筹建之初仅招收了12名学生,他们刚到校时,住在崂山脚下帐篷里,上顶青天、下踏荒地。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晓师终于在1928年3月1日正式在露天广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社会各界对陶先生创办这所面向农村的乡村师范学校都很支持,在开学典礼上,由陶先生主持会议,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也来致了祝词。当时,我受聘为晓师的农事指导员。会上,我向众人宣布:愿意去掉自己名片上农学士的台衔,和大家一起做学生。

开学之后,我们边教边学边干。师生动手共同创建校园。先在崂山下选了一块最平坦的开阔地盖了一座“犁宫”。所谓“犁宫”,实际上是我们用土坯作墙、茅草作顶垒起来的既经济而又耐用的大草棚。它占地少说有100平方米,高约两丈,中间是尖尖的草顶,远看倒也十分壮观。在这里进行全校性集会,共商学校大事,晓师的精神和宗旨最初就是从这座“犁宫”中传扬出去的。在“犁宫”前面,有一片广场,每天师生们在此操练,也常与四乡农民在此开会联谊。“犁宫”的左边有一高岗,岗下有一片桃园,名为“桃花村”,女生宿舍以及相继设立的“联村自卫团”总部就在这边。再下面还有食堂、“安徽”馆、“浙江”馆以及后面要提到的“冯村”。“犁宫”右边建有农业馆,陶先生的宿舍就建在附近,名为“柳村”。这里有山有水,有桃有柳,还有宫有馆,真可谓得天时、地利、人

和兼备的一个好场所。之后又发展扩建了晓庄中心小学和晓庄中心幼儿园。陶先生的乡村教育之理想已得到初步的实现。

就在晓师的创办初期,发生了一个较严重的问题。当时燕子矶一带,暗藏着一帮兵痞流氓土匪,他们霸山为王,敲诈勒索,农民不堪其苦。陶先生为替民除害,召集四乡众邻在燕子矶小学开会,研究除匪问题。会一开头,大家对匪扰的惧怕心理还是较重的。一个到会代表说:“昨日我们收到一封土匪的信,要我们送去三千元,如不送去,他们要来镇上抢劫。”有人只好主张凑足钱数给土匪送去,陶说:“这不是办法,何不起来与他们干?”大家说:“我们本来有枪支自卫,但军队撤退时把枪支都收缴走了,现在赤手空拳,哪能和他们干?”散会后,陶先生约我一道骑自行车进城,在路上,陶先生忽然想起自己与冯玉祥是老朋友,冯玉祥当时在南京政府任军政部长。次日,他去找冯玉祥谈及此事,冯玉祥当即一口答应帮忙,并随手写了张便条。陶先生因学校事务繁忙,便把弄枪的事托付与我。我拿了冯玉祥的字条,找到城北大桥修械所的陆科长。他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修好的旧枪,农民需要,我们可以提供。只收成本费,每支60元,附子弹300发,还可以包送到你处。”我立即回到燕子矶镇上,把此好消息告诉给农民。顿时,就有16家农户愿出钱买枪,我收齐了钱款,买到16支步枪及弹药,又把枪械运到燕子矶发到农民手中。此时,我为办成这件好事感到十分痛快,特意花了6元钱买了个照相机,为持枪的农民拍照办理枪照。

陶先生认为此事办得很对,他又到四乡宣传自卫防匪的好处,并组织晓师学生与四乡农民共同成立了联村自卫团。其作用主要是保卫村舍学校,也兼管地方防火、筑路、救灾等公益事宜。陶先生也给学校弄到了一批枪械,他领头建立的联村自卫团总部就设在桃花村附近的小山岗上。我也被指定为该团团员,也发得一支步枪。事隔不久,我们在通往学校的路上拾到一封写给陶校长的信,原来是土匪写来的恐吓信。信中除把陶校长大骂一顿而外,最后还写道:“你办你的学校,不该干涉我们的事。我们是筹集路费回老家,你得给我们送来2万元,一个不能少,

苜蓿园 与红花地

● 陆永贵

出南京城中山门向东，逾护城河便是苜蓿园。据史料记载，明朝时，此处曾种植苜蓿，俗称“红花草”，因而得名。

苜蓿，是种一年或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复叶，具三小叶，花紫色，为上好的牧草和绿肥兼用作物。

据《白下琐言》记述：“明初牧马皆在外郭门以内，如麒麟门至观音门一带地方。有黄马群、青马群、红马群、白马群。朝阳门（今中山门）外东二十里有马房山为枣骝群，又有马巷口皆其所也。今附郭民田纳银无米，其地租有黑白草、黑白苜蓿诸名目，盖沿前代之旧也。”由此可见，苜蓿园主要用来牧马。

而在城内，今太平路中段，南起三十四标，北至文昌巷处的红花地和城外东南的红花村，在明朝时皆曾种有大片红花。因此，得名“红花地”。后因重名，一遂改红花村。这在明代志书《正德·江宁县志》中有“红花大场，红花小场俱在光泽乡”的记载。

红花，属菊科。是一年生的直立草本。叶广披针形，边缘有针刺，先端锐尖。夏季开花，头状花序顶生，全部为管状花，桔红色。果实可榨油，花可作染料，亦可入药。

此二处所种之红花主要用作丝染。

《建康古今记》对苜蓿园、红花地是这样记载的：“红花地在城北供丝染，苜蓿园在城东以牧马。”

随着历史的变迁，这里曾土地荒芜，杂草丛生，后渐辟菜地。现在是拔地而起的住宅楼，成为居民区，以及工厂、院校驻地。

（责任编辑 霁明）

如若不送来，我们将于某月某日和你较量一下，杀你个鸡犬不留！”陶校长看了信之后，说：“我倒欢迎他们来办一次土匪教育，好让他们回去办平民教育，这是他们的好机会。”到了土匪约定的日子，大家心里不免有些惧怕。陶校长事先把此事告诉了冯玉祥，冯说：“要大家放心，到时候自会派人来帮忙。”到了土匪约定的日子，冯只派了一个人来，此人腰插一把盒子枪，他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大家安心睡觉，莫管外面的响声。”说完他便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这一晚，外面一点响声也没听到，土匪终于没敢露面。以后听说来的是位神枪手，对付这一股土匪，实不在话下。这件事之后，我们更加干得起劲，每日加紧训练，常备不懈。冯玉祥不仅支援了我们枪支弹药，还十分关心我们的联村自卫团。他亲自来晓庄多次，给了我们精神上莫大的支持。记得冯第一次来晓庄时，回为事先已有通知，住在农民家里的学生又把这消息透给了农民，消息一传开，大家都知道军政部长要来晓庄。那天，四乡农民连同老弱妇孺来了不少。有些人站在余儿岗大道两旁，以便早点目睹这位军政部长的风采。过去一般大人物出巡，总要先出动大批警卫人员禁街，这天等了许久也不见有警卫来禁街。只见大路上走来两个男子，前面一位长得很魁伟，头戴一顶大草帽，身着便服，后面跟着一个普通打扮的人，只是肩上背着一个照相机。陶校长见到这两个人，老远就迎了上去，并告诉大家，这位戴草帽的

就是冯玉祥部长。晓庄师生在犁宫前开了欢迎会，会场四周挤满了看热闹的四乡农民。陶校长致过欢迎词以后便请冯部长讲话。冯玉祥慢慢站起身，说联村自卫团是大伙自己的组织，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土匪就怕我们。我们要放大胆子做事。农民们都听懂了他的话，不住地点头称是，他最后说：“有句名言‘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现在不真是把宣统皇帝拉下马了吗，还把他赶出了紫禁城！”说完，大家哈哈大笑。开完会，我们集合全体联村自卫团员请冯部长指示，他为我们操演了许多军事动作和使用枪械的方法。我立即用我那架照相机在现场拍了许多照片，冯拿起了我的相机问：“花了多少钱买的？”我说花了6元钱。他又问：“能照得好么？”我把上次为燕子矶农民拍的照片拿给他看，他指着身边背着照相机的卫士说：“这是300元的照相机，不也就是照相么，可惜我们就是不懂。”

冯玉祥之后又来过几次晓庄，并派人来训练自卫团员。他对晓师印象很好，还爱上了这里的大自然风光。就自己花钱在晓庄旁边造了一间房屋，说到了星期天，有暇就来此休息。我们特把此处叫“冯村”。以后，冯去了山东，“冯村”的房屋也就捐给了晓师。在“冯村”边上还有一口水井，也是冯玉祥出资请人掏的，因为听说晓庄的水质好，故打井造福于民，这口水井也就称为“冯井”。

（责任编辑 惠 兰）

老报人、著名的章回小说家张恨水是安徽潜山人，久居北京。在编报之余，他一生所写小说有数十部之多，其代表作《啼笑姻缘》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三十年代初，张恨水曾在南京丹凤街居住，我有幸和他相识，在交往中颇多趣闻轶事，偶一忆及，记之聊作谈资。

当时张恨水在南京闹市区新街口附近的中山南路，租了一幢楼房，与好友张友鸾合办了一张报纸，取名《南京人报》。为了“报首”与众不同，在《南京人报》四字周围，加上椭圆形外框，内有南京地图纹样，由我细心设计，他俩分别担任社长和经理，并各兼编《南华经》、《聚宝盆》两版副刊，每天还撰写两部长篇连载小说，十分紧张。该报虽系4开小型报纸，由于消息灵通，言论公正、编排新颖，尤其是副刊内容丰富多采，可读性强，因此在当时众多的报纸中独树一帜，发行量在同类报纸中名列前茅。

有一次，正值英王乔治六世举行加冕礼，各国都派使者前往祝贺，伦敦冠盖云集，成为当时全球瞩目的盛事。张恨水为此根据唐人诗中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句，在副刊上征对上联，也要限于唐诗。很久无人应对，乃降低要求，不限朝代，但仍以古人的成句为限。应征者虽很踊跃，但无一可以当选，最后只得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六宫粉黛无颜色”勉强选用。

在一个夜晚，张恨水所编的副刊已将拼版，尚差10余行字，为了填补空白，他急中生智，随手写了一首打油诗补了上去，诗曰：“楼上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时钟两点刚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终于解除燃眉之急。

当时的南京，工商业很不景气，许多店铺为了打开销路，常以大减价，大拍卖，奉送赠品等来招徕顾客。有某报在出版时竟也以“本报赠送《欢喜冤家》启事”的大字广告，连续在该报刊载多日，大意谓：“本报当创刊之初，为优待长期订户起见，凡订本报全年者，赠张恨水著《欢喜冤家》一部……续订半年者，再赠《六朝烟水》一部”云云。后来该报销售量果然大

张恨水

金陵轶事

● 刘元



增，说明张的小说，在当时深受各层次的读者欢迎。某报此举，同时也使张恨水所办的《南京人报》得益非浅。

张恨水平日没有什么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即对电影、歌舞也不大感兴趣，唯对京剧极为喜爱。不但爱听、爱看，还能唱上几段。虽然他是一副略带嘶哑的“左嗓子”，唱出来并不动听，但他不顾这些，还喜欢敞开嗓门大声地唱。这是除自我欣赏之外，主要是藉此松弛脑筋，消除疲劳，是他的养生之道。张恨水懂得的戏很多，可平时最爱唱的是：“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衙前来了我宋江……”《乌龙院》中的这段“四平

调”，而且百唱不厌。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送画稿到报社，刚走近编辑室门口，“大老爷……”一段道地的“麒派”唱腔，又一次传到耳边。宽阔的额头上梳着平整的分头，身穿白纺绸中式褂裤，手摇折纸扇的张恨水，边唱边迈着八字步，一步三摇显得十分潇洒，极像一位唱做熟练的“科班”演员。见到我时，突然停住了唱，改用京戏的道白：“惨绿少年，你来了！哈哈哈！”这一来引起满室的笑声。原来这天我穿的是一套墨绿色西服，又系上一条绿色的领带。

十代古都、六朝金粉的南京，三十年代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抗战前夕，依然是灯红酒绿，笙歌达旦。正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当时有不少茶社兼营京戏清唱馆。有天韵楼、飞龙阁、鸿运楼、天香阁等不下十余家之多，歌女中色艺俱佳者颇不乏人。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王熙春就是其中之一。

张恨水一有闲暇就去夫子庙清唱馆听戏，这固然与他酷爱京戏有关，更多的是为撰写小说寻觅素材。在他所写的小说中，以歌女、艺人为题材的很多，如《满江红》小说中的主人公桃枝，就是以歌女为原型的。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栩栩如生之感，这和他常与艺人们交往，熟悉她们的生活有关。

当时一些有名的歌女，往往拜社会名流、文人墨



● 韶 华

1911年(宣统三年)的江苏“光复”,人们往往讲江苏巡抚衙门檐口被砸掉几片瓦檐,而没有注意到许多地方新制了标志“辛亥革命”的瓦檐。江苏偏东的吴江县卢墟镇,当时在街面新屋上,就使用了这种特制的“五色旗”并标有“民国”纪元的瓦檐。而在苏北淮阴,这时也出现了这种瓦檐(前为淮阴卫生学校用屋)。说明这“河山再造,光复大义”的革命,在民间确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正如孙中山在后来高兴地看到而慨叹所说,“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建国方略》)。

五色旗和星旗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旗帜,《中华民国》的铜元(直径4.3厘米)的图案也有

这种图案。五色,代表我国各个民族;星,代表诸省起义联军。卢墟瓦檐(上弦宽15厘米、下弦宽13厘米、纵6.2厘米)的可贵之处,其上还有模印阳文“民国”两字,其下,又有“N、A”,疑即英文新纪元两字的缩写。另又有边文“HAI□”、“FON□”(不知是否海丰之音译)。图中的长寿,表示地久天长共和永固。致于创建“民国”的思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就明确了,此即“第二条”所谓:“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制订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了。

(责任编辑 霁 明)

更 正

本刊今年第三、第四期因校对疏忽和电脑误录,造成多处讹误:

一、第3期第9页右栏第20行:“仅往四个昼夜”,往应为住。第27页左栏第17行:“侦辑”应为侦缉。第28页右栏倒第4行:“叛徒”应叛徒。

二、第3期第34页第12行:“平各大学”,应为北平各大学;以下多处:“司徒”,应为司徒;第35页左栏第4行:“美兵之民”,多之民二字;第9行:“中国军刑法”,多军字;第16行:“恐吓迫”,应为恐吓迫害;第23行:“类似此事件”,多此字;第29行:“想表关切”,应为深表关切;右栏第7行:“格来持”,应为格来特;第17行“东长街”,应为东长安街;倒第2行:“影院对面边”,多边字;第36页左栏第8行:“被美”,应为被美兵。

三、同期第42页右栏倒第4行:“酷史传”,应为酷吏传。第71页左栏倒第12行:“政治”,应为政治。第82页右栏倒第14行:“恒温”,应为恒温。第99页右栏倒第14行:“桥夫营”,应为轿夫营。

四、今年第4期第10页左栏第一行:“右”,应为古;第14行:“7月”,应为7日;第11页右栏第17行:“原望”,应为愿望。

五、第4期第22页照片说明:“驻军办事处”,应

为驻京办事处。第40页左栏第11、12行:“乾隆帝对多铎与阿济格、多尔衮为同母兄弟。”应删去。倒数第7行“正黄旗”应为“正白旗”。右栏第1行“生擒”应为“生擒”。第4行“两白旗”应为两黄旗,第41页左栏第18行“侍郎”应为侍郎。倒数第3行“山乐”应为山东。右栏第10行“矛头”应为矛头。

第43页左栏第4行“第二开”应为“第二天”。第8行“因”字应删去。第20行“挟弘光、太后”应为“挟弘光太后”。倒数第19行“赵之龙”前应加“忻诚伯”。

第44页左栏第10行“灵壁侯家”应为“灵壁侯汤国祚府”。第13行“室座”应为“宝座”。倒第12行“舒门”应为“衙门”。

第45页右栏第4行“服侍”应为“服侍”。第7行“华毅”应为“华毅”。第8行“各叫”应为“名叫”。

该文文头作战示意图漏印编者:赵思高同志。在此除更正外,特向作者、读者致歉致谢。本刊已与电脑照排部商定,一是加强对有关人员的培训,提高素质,增强责任感;二是本编辑部从第五期起已聘请了专业校对人员,以切实减少讹误。

《南京史志》编辑部

汪精卫做寿生悲

● 远 秋

1942年5月12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清晨,一溜黑色的小轿车驶向中山陵,不禁引起南京市民的惶惑不解,今天既不是总理(孙中山)诞辰、逝世、奉安纪念日,又不是重大节日,也没有开什么重要会议,这是些什么人呢?车子停稳以后,走下来的是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还有陈璧君及其子女、副官、侍卫等人。原来今天是汪精卫六十(虚岁)寿辰,特来祭灵。

汪精卫今天没有穿西装,而是一套他很少穿的藏青色的中山装,他木然地站在灵前,低垂着头,早已失去当年的风采。民国初年,人称有三大美男子,汪精卫居于榜首(其他二人是顾维钧和梅兰芳),现已两鬓染霜,加上昨天才从“满洲国”访问归来,还带着旅途的风尘,更显得苍老。本来祭灵要读总理遗嘱,然后鞠躬默哀,今天没有读遗嘱,只是默默地站着。突然两颗泪珠,从汪精卫的脸上无声的落下,不知他想起了什么?

——也许是感叹人生吧!自己年满花甲,百病缠身,恐不久于人世。看看身旁的陈璧君,也年过半百,麻黄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虽然“雌风”犹在,但早已风韵无存。大儿子文婴,将达而立之年,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是没有指望了。小儿子文悌,十八九岁正当年,在中央军校学习,但看来也不象个带兵之人。——也许是哀诉儿皇帝难当吧!影佐祯昭就象一个太上皇,处处箝制,事事干预,自己只能“影喜亦喜,影忧亦忧”。日本人不断地要粮、要款、要物、要夫,一时不周,堂堂国府主席竟遭斥责。

……

汪精卫站着不动,众人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陈璧君用手拉了一下他的衣襟,他才清醒过来,说了声:“回去吧”。一溜汽车回到了颐和路官邸。

官邸已被装扮一新,门前张灯结彩,十分气派。拜寿之人正络绎前来,早来的有陈璧君的义妹陈舜贞和褚民谊夫妇、陈公博和李丽庄夫妇、周佛海和杨

淑慧夫妇、曾仲鸣的遗孀方君璧,还有一直在身边工作的陈璧君的侄子陈国瑞、陈国强、外甥张思麟、侄孙汪翔辉等等。在大厅坐定之后,依次给汪精卫拜寿,免去了叩头跪拜,只是行三鞠躬礼。略事休息,即去宁远楼赴宴。

宁远楼是当年南京伪政府酬宾之所,今天布置的更加富丽堂皇,大厅之内灯火通明,中间悬一幅两米高的“寿”字,两旁红烛高烧。汪精卫来时,伪廷的大小官员和一些国家驻南京的“使节”,早已恭候多时,汪精卫一到,大家肃立致敬。席面排定之后,总司仪陈春圃宣布仪式开始,先向“主席”敬寿酒,并请“主席”训话。

汪精卫缓缓站起,用轻柔的声音说道:“鄙人生日,承蒙诸位光临,不胜感谢。自国府还都以来,和平运动取得很大胜利。从‘中日条约’签订、‘中日满三国共同宣言’,到东亚联盟成立,明确了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四大纲领,中日更加亲善。去年十二月爆发了大东亚圣战,更是捷报频传,最近菲律宾群岛及缅甸底定,珊瑚海战,复得伟大成果。中国现在还很弱,没有力量直接参加大东亚战争,但我们也责任重大。中国和日本从前是兄弟,现在更是患难中的兄弟,不惟安危荣辱相关,并且存亡相共。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支持东亚战争,彻底扫除英美势力。东亚前途是光明的。”大家热烈鼓掌。

觥筹交错的宴会之后,开始跳舞,几位高级官员陪同汪精卫另觅一室闲话。有人问起访问满洲之事,却勾起了汪精卫的满腹牢骚。他说:“满洲确是以礼相待,最讨厌的是新闻记者,什么问题都敢提出。有一个记者问我:‘为什么以前主张抗战,现在主张和平?’我说:‘从前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所以主张抵抗。现在知道日本并不想灭亡中国,而是主张东亚共荣,所以主张和平。’还有一个记者问我:‘为什么以前反对满洲国,现在又来访问满洲国?’我说:‘以前没有弄懂总理的大亚洲主义,不知东亚是一家,只知爱国。现在知道中日满三国本一家兄弟,不但要各爱

其国,而且要互爱其邻,共爱东亚’。”

褚民谊立即附合着说:“回答的好。我在日本当大使,就听日本人讲,他们的基本国策是‘八弦一字’,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之间,当然要和乎。”

陈璧君气呼呼地说:“还是我过去说的对,东三省本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是满洲贵族进关时带来的嫁妆,现在人家收回去,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陈春圃跑来报告,随从室送来各国元首的贺电,汪精卫很感兴趣地问:“是谁拍来的?”陈答:“有大日本帝国首相东条英机、德国元首希特勒、意大利国王兼阿比西尼亚皇帝爱麦虞限陛下、意大利总理莫索里尼、满洲国皇帝溥仪……的。”汪精卫立即命令,“回电致谢”。陈当下拟定电文:“承贺生辰,至深感纫,敬致挚诚谢忱。汪兆铭、5月12日。”汪精卫说:“好,立即拍发。”

闲话之后,又去大厅参观贺礼。四壁挂满了寿幛,上写“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等一类贺词,有一幅写的更妙,竟把“和平反共建国”六字纲领写上,汪精卫见后恬然一笑。此外,广东省省长陈耀祖(陈璧君之弟)送来一个大花篮,鲜花朵朵,香气四溢,这些花在南京不易得到,是派人乘飞机专程送来的。江苏省政府送来的是郑板桥墨竹真迹,浙江省政府送来的是一大银杯,上海金融界送来的是一金盾。其他古玩珠宝,琳琅满目。最讨汪精卫喜欢的有两件:一是内

政部长陈群送来的新版《双照楼诗词稿》,此书是汪精卫的诗词集,原为张江裁所编,汪氏写了序言,这次印刷精美,陈群特带来几十本送人(陈群拍马有术,次年,被任命为江苏省长兼保安司令)。另一件是日本天皇请名画家给汪氏画的一幅油画肖像,画上的汪氏,神采奕奕,而又毕恭毕敬。

正在浏览之际,只见南京市警察署长苏成德,手捧一尊汪精卫的石膏像走了过来,这是专门请人制作的,大家一见,十分开心。不料苏氏献媚心情过切,酒后手软,只听哗啦一声,竟失手将石膏像跌碎。真好象晴天霹雳,满座为之失惊,吓得苏某脸色煞白,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汪精卫一见也失声痛哭,惊呼:“完了!完了!我的一切都完了,身败名裂了!”大家急忙把他扶入另室,极力相劝。一场兴高采烈的寿宴,被扰的不欢而散。汪精卫临走之前,命令将所有礼品送文物保管委员会,自己不愿再看。七月间,伪府曾公开展出,可见礼品的丰盛。

晚上,汪精卫苦苦不能入睡,在房内踱来踱去,搔首沉思。自己已经跳入火坑,别无出路,傀儡戏还要继续演下去。夜半,竟得诗一首: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责任编辑 惠 兰)

《江苏地区期刊与方志综录》出版

鉴于编史修志和有关科研工作的需要,江苏省志办编写的《江苏地区期刊与方志综录》已出版发行。书中收录了江苏和上海两地自1840年至1949年期间出版的自然与社会等各科的中文期刊4950多种(其中江苏省出版的1630多种,上海市出版的3320多种);收录江苏和上海两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代编纂并还保存的各类地方志970多种(其中江苏省编纂的800多种,上海市编纂的160多种)。这比《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多收录近280种。

该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98.4万字,分上下两册,软精装。订价为15.75元。

订购书款请寄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咨询服务部,地址:南京市青岛路1号。邮码:210008。开户行:南京工商银行大方巷分理处。帐号:1944—18589。

(戴国林)



东晋史学家谢沈的六面铜印

● 安徽马鞍山 李光斗

1984年10月24日,马鞍山市临长江处的马鞍山东麓400余米处,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三座古墓,经清理文物考证为东晋中期墓葬。三墓虽早年被盗,出土文物不多,但其中三号墓,却清理出一枚极为珍贵的六面铜印。印为“凸”字形。全印通高3.2厘米,鼻高2厘米,印高2厘米正方,鼻孔圆直径0.3厘米。经过清除印面泥土,六面印文清晰明显。鼻顶、印四方和底部,均为阴刻篆书。鼻顶“白记”;印底“谢沈”;四方分别为“臣沈”、“谢沈白事”、“谢沈白牋”、“谢文仲”。与此印同墓出土的还有两件书案文物,一只三脚陶砚(残缺两脚)、一只青瓷盏。

谢沈在《晋书》上有其专志。经过考证,这枚罕见的六面铜印、陶砚、青瓷盏,与先前在东晋朝廷任史官的谢沈相吻合,因而可断定,墓主就是死在东晋都城金陵(南京)、葬在邻近处马鞍山前的史学家、《晋书》主要作者的谢沈。

《晋书》前言,记载有谢沈曾撰写此史书的事实。谢沈专志介绍“谢沈,字行思,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市)人也。曾祖斐,吴豫章太守。父秀吴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学多识,明练经史。”谢沈出身于官宦之家,由于他学识渊博,在他青年时代的东晋王朝,就已知名于世,不少地方官吏都欲聘他任仕,甚至奠基东晋王朝,辅佐元帝、明帝、成帝,执政三朝的镇西将军庾亮和镇北将军蔡谟,都曾慕名相聘,但谢沈志在钻研经史,以所著书史传世,故而一概谢绝,乃“闲居养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坟籍。”

谢沈生长在两晋的动乱年代。八王之乱,外族纷纷入侵,西晋亡后,在南方建立的东晋王朝,仍是外患未停,内乱续起。元帝司马睿在金陵建立东晋朝廷仅六年(322年),镇守武昌的大将军王敦起兵作乱,攻入金陵。事隔五年的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又出现冠军将军历阳内史苏峻和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联军反晋,次年攻陷金陵。由于连续战乱,到了公元343年,晋康帝司马岳即位,东晋王朝已是“朝议七庙迭毁。乃以太学博士征”谢沈入朝任仕,作为一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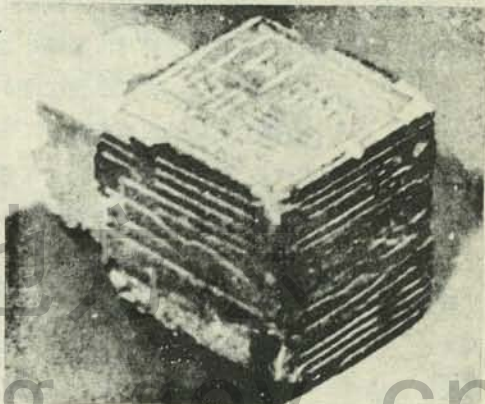
钻研史学的谢沈,眼看当时朝廷所保存的许多珍贵史料毁于战火,甚是惋惜,便决意应召,离家赴金陵任掌古今史事诗问及书籍典守职务的太学博士的官职,后曾迁任尚书度支部。为了让谢沈能专意撰写本朝档案史书,后委他任掌编纂国史的著作郎。从此谢沈便发挥他的史学文才,集中精力整理撰写两晋志《晋书》。当撰写到三十余卷后,由于劳累过度,病死任上,年52岁。

出土的六面铜印,当是谢沈任著作郎,撰写当朝史志《晋书》时所用之印。都有一个“白”字,说明是表白著文的专用印章。底印“谢沈”,乃执印人的姓名。“臣沈”,臣奉君,含意更为专事书写奏章之用。唯一方印名“谢文仲”,其意未寻出考证。“文仲”非谢沈之字号,仅能推测为谢沈的别号,亦或“仲”含“仲裁”之意。还有另一解译“仲”属第二(孟仲季),是否为谢沈以君臣之辈,用第二者的称呼。

六面铜印的出土,不但明确了谢沈这位东晋时期史学家、《晋书》作者的埋葬地址,而铜印亦为研究我国金石篆刻的珍贵历史文物。

(现此印完整地保存在安徽马鞍山市文管所内)。

(责任编辑 淑玉)



谢沈的六面铜印

1992 年全国地方志刊物联合征订启事

刊 名	发行范围	刊期	发行地址	全年订价	邮政编码
中国地方志	公开	双月	北京日坛路 6 号历史研究所发行组	7.80 元	100020
四川地方志	内部	双月	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 15 号省政府办公大楼	7.20 元	610017
广西地方志	公开	双月	广西南宁市康乐路 1 号广西通志馆	9.00 元	530022
海南史志	内部	季刊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6.00 元	570004
新疆地方志	内部	季刊	乌鲁木齐市东风路 8 号	6.00 元	830002
黑龙江史志	公开	双月	哈尔滨市鞍山街 14 号	10 元	150001
羊城今古	内部	双月	广州市越华路 118 号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9.6 元	510030
山东史志丛刊	公开	双月	山东省济南市泉城路 317 号	9.00 元	250011
南京史志	国内外	双月	南京市市政府大院南京史志发行部	7.20 元	210008
兵团史志通讯	内部	季刊	乌鲁木齐市光明路 15 号	4.80 元	830002
宁夏史志研究	内部	双月	银川市新市区宁夏社会科学院	7.20 元	750021
江苏地方志	公开	季刊	南京市青岛路 1 号	6.00 元	210008
内蒙古地方志	内部	季刊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政府大院	6.00 元	010050
浙江方志	内部	双月	杭州市省政府大院	6.00 元	310025
上海修志向导	内部	双月	上海市建国西路 445 号	7.20 元	200031
广东史志	公开	季刊	广州市东风中路省政府大院	7.20 元	510031
方志研究	国内外	双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甲 121-1 号	10.80 元	130022
武汉志通讯	内部	双月	武汉市汉口车站路 2 号	6.00 元	430014
湖南地方志	内部	双月	长沙市德雅村湖南省社科院内	9.60 元	410003
方志天地	内部	双月	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四段一号辽宁省志办	7.20 元	110032
陕西地方志通讯	内部	双月	西安市陕西省政府大楼	6.00 元	710004
福建史志	公开	双月	福州市梅峰井边亭	8.70 元	350003
志苑	国内外	季刊	合肥市长江路 5 号安徽省志办发行科	6.00 元	230001
天津史志	内部	双月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28 号	4.00 元	300050
史志文萃	国内外	双月	武汉市武昌保集安湖北大学《史志文萃》编辑部	11.4 元	430062
贵州方志	内部	季刊	贵阳市延安中路 11 号	8.00 元	550001
湖北方志	公开	双月	武汉市武昌何家堤	8.40 元	430071
河北地方志	内部	月刊	石家庄市自强路 52 号	14.40 元	050051
江西方志	内部	双月	南昌市江西省政府大院	9.00 元	330046
甘肃史志通讯	内部	双月	兰州市安乐村 108 号	3.00 元	730046
山西地方志	公开	双月	太原市东辑虎营三号	6.00 元	030009
河南史志	内部	双月	郑州市红旗路东段 25 号	5.10 元	450003
云南方志	内部	双月	昆明市气象路 45 号	6.00 元	650032



华罗庚的启蒙老师 ——韩可吾先生

在南京市青龙山林场七里岗梨园北端，宁土公路南侧，有一座修建不久的墓。每年仲春，梨花如雪，簇拥墓碑；清明时节，常有人来此扫墓。这就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启蒙老师韩可吾先生长眠之处。

韩大受(1889年——1971年)，字可吾，江苏省金坛县人，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教授、教育家，也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启蒙老师。

1982年10月2日，华罗庚教授给《电视文学》编辑部的信中写到：金坛中学的创立者是我敬爱的韩大受老师，他把毕生精力、所有财产都贡献给了这个学校。他为办学卖掉了他仅有的几十亩田，他淡泊清贫，冬天连棉衣都不肯穿。他在政治上也是进步的，对我党地下工作取同情态度。他在我们家乡，不仅在他的学生中，就是在一般群众中声誉也是好的。

韩可吾先生，早在青年时代就接触民主思想，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十分钦佩，暗中借阅《民报》、《复报》、《革命军》等进步书刊，并以“汉魂”为笔名，在一些秘密刊物上发表反清文章。1919年他曾去北京大学旁听俄文，开始阅读马列主义，有时去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些活动，以后他花很大精力着手编写《列宁年谱》。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我国东北三省，他在金坛中学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抵制日货，请东北流亡学生来校作报告，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等活动。1947年在我党领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当时他正在上海法学院任教，非常同情进步学生，对他们进行掩护，积极设法营救和带头捐款慰问被捕的学生，他却为此而被解聘。解放后，他又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认

识，他一再说：“要重新改造自己，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

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下，怀着“教育救国”之志，于1912年用自己积蓄的薪金，在本县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小学，使女子能就地读书，以打开金坛闭塞的风气。1922年又变卖自己的二十多亩田产，创办了第一所中学——金坛县立初级中学。为家乡许多无力外出求学的贫困子弟，创造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条件。这两件为家乡子孙后代办的好事，至今仍为全县人民所称颂。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倡导下，师生共同开辟了农场与操场，学生课余种菜，春秋两季养蚕，他还编写了“实用养蚕法”、“夏秋养蚕法”两本讲义，给学生边讲解边指导实践，以培养学生参加劳动的兴趣和习惯。有一次在指导学生捉老蚕上簇，不慎从楼上跌下致伤右臂，但仍坚持工作，师生无不被感动。

解放后，他虽在南京工作，却常惦记着县中，总想为学校再尽点力。第一次回到县中时，就把藏在地下多年的一批珍贵资料——抗战前县中历届毕业证书存根(共30本)，挖出来送给学校，其中，第一届的一本中，就有华罗庚的一张初中毕业证书存根。1959年夏，又回到金坛，实现他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他不顾年迈，冒着酷暑，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把保存的图书杂志全部进行清点整理，从中选出两套完整的杂志约六百本赠送给学校，其中一套《东方杂志》，是抗战前就发行的一本很有影响的综合性刊物，相当珍贵。据说国内一些大图书馆都不全，而韩老所赠的一部，从创刊到结束，一本不缺，十分难得。

韩老的一生，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一生。他

《西洲曲》之“西洲”在金陵

魏芝波 袁亮

南朝乐府代表作《西洲曲》，以其“续续相生，连跢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古诗源》语）的优美抒情传诵至今，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然而，“西洲”的归属地问题，几经探查，仍无定论。

前人对此问题，观点分歧。有人根据唐温庭筠《西洲曲》中“西洲风色好，遥见武昌楼”句，推断“西洲”在武昌附近；也有人根据本辞“采莲南塘秋”句，认为“西洲”与“南塘”近在咫尺，又根据《唐书·地理志》：“钟陵……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开南塘斗门以节江水，开陂以溉田”的记载，及耿伟《春日洪州即事》，“钟陵春日好，春水满南塘”句，进一步以为南塘在钟陵附近，即今江西南昌市，《西洲曲》即产生于此。当然，它们都因缺乏说服力，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所以，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西洲”时持谨慎态度，说：“其地不详”。北大《文学史》亦说“不详”。

前人对此问题，虽然观点分歧，却也有个共同点，就是《西洲曲》必产于江南，属南朝作品。这是十分正确的，本诗首句“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便是有力的佐证，它为我们进一步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笔者认为，《西洲曲》所述是南朝之都建康（金

陵）事，“西洲”之地不是“不详”，而是非常“显然”，它就是金陵地。

金陵本有“西洲”地。《古今图书集成》卷六四四云：“西洲城，在古扬州城。汉扬州治曲阿，晋永嘉中迁于建康，并立州城，即此。太元末，会稽王道子领扬州于东府，故号此为西洲城，西接冶城，东临运渚，今朝天宫西洲桥是。”臧励和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亦说：“（西洲城）在江苏江宁县（今南京）西，晋扬州刺史治所。”原来，金陵“西洲”即是东晋时期扬州刺史治所，蒋赞初《南京史话》说得更明白，“东晋后期，在大族谢安的主持下，（对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在冶城的西面增筑了一座西洲城，作为扬州刺史治所。”胡三省《通鉴·注》对此亦有论述：“扬州治所，在台城西，故谓之西洲。”金陵“西洲”的得名即由此而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进一步考证说：“今武卫桥，即古西洲桥”。可见，金陵有“西洲”是肯定的了。

以上诸材料都说明金陵“西洲”乃东晋时的扬州刺史治所，是当时都城建康的一个大所在，这恰与《西洲曲》产生时间相符。况且，在这里曾发生过两个著名典故。一个是记载在《晋书》里又被后人王慰庭

自奉节俭，无烟酒嗜好。在县中学当校长时，经常穿一套退了色的灰布中山装或一件旧长袍，脚穿一双旧皮鞋，在学校各处巡视检查，冰天雪地，虽冻得面孔发紫，也不肯穿棉衣，以磨练自己的意志。韩老在校用餐，总是早上喝粥，中晚两餐一菜一汤。他的办公室和宿舍陈设简单，同事们建议他改善一下，他却安之若素，认为生活艰苦些，对人也是一种锻炼。解放前，他是一位学者、教授，任过校长、局长；解放后，又在一些单位管钱管物，他都能做到一尘不染，廉洁奉公。晚年在农场的住处也很简单，室内除了一张旧三屉桌，一把靠背椅和一张单人床外，就是堆放在床上、床下的书籍报刊。韩老逝世后，仅留下几件用过多年的被子、蚊帐、面盆与两只装满书籍和一些旧衣服的破箱子。在一只箱子内，还有一叠他长期看

病自己付款而未向公家报销的700元钱的发票。正如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朱润生先生赞誉的那样：“韩老毁家兴学，振兴教育，一生清廉，两袖清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教育事业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特别是1983年电视剧《华罗庚》在全国播出后，唤起了人们对华罗庚的启蒙老师韩可吾先生的怀念。当年亲自为韩老安排工作的原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钊同志，怀着对这位老教育家的崇敬心情，出面与青龙山林场领导联系，立碑建墓。1988年4月，在为韩可吾先生重新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作为著名的无党派爱国人士、教育家韩可吾先生，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责任编辑 宁宁）

收入《汉语典故词典》里的“洒泪西洲”的故事,《晋书·谢安传》说,东晋的羊昙(谢安外甥)很受政治家谢安器重。太元十年,谢安还都(建康),舆病入西洲门,安薨后,羊昙深哀之,行不由西洲路。尝大醉于石头(南京石头城),不觉至西洲,以鞭叩门,吟曹植“生存华屋处,露落归山丘”诗句,恸哭而去。所以,宋刘克庄《沁园春·送孙季藩吊方漕西归》词就有“平生客,独羊昙一个,洒泪西洲”的句子。

另一则是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篇》的记载:“王文度在西洲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座。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著弊絮中,触地挂碍’”。王文度,即是东晋名士,与谢安齐名被称为“王谢”之“王”的王坦之。《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乃刘宋王室,距东晋未远,所述当为可靠,所以说,东晋时京都建康确有“西洲”地。且《世说新语》与《西洲曲》几属同时之作,金陵“西洲”于时又有如此大的名声,在当时产生吟咏此地的《西洲曲》不是顺理成章之举吗?有的学者据温庭筠《西洲曲》,说“‘西洲’在武昌附近”,那么前诗“艇子摇两桨,摧过石头城”,又作如何解释呢?事实已很明显,该诗的立脚点即是金陵。

我们认为《西洲曲》之“西洲”,即是金陵“西洲”,还有下面的依据。

前人对“西洲”归属地问题的讨论,虽无定论,然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对后人的进一步考证有莫大的启迪。“‘西洲’与‘南塘’近在咫尺”,虽然据此而得出“西洲”在南昌之“南塘”附近是不可信的,而其立意为我们的考证引发了思路。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出门采江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日暮时分,尚可出门往南塘采莲,分明西洲离南塘不远,仅需“两桨桥头渡”,可见两地距离之近,因此说“‘西洲’与‘南塘’近在咫尺”是可信的,而金陵的南塘与西洲的确近在咫尺,这恰恰说明诗中的西洲即金陵之西洲也。

不妨再看看古代诗文中对金陵的西洲与南塘两者是如何记述的?其一,金陵、南塘,与西洲同时记载于《世说新语》,又与西洲同时闻名于东晋时期。刘义

庆《世说新语·政事篇》说:“谢公时兵厮遭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安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谢安部属在京都追捕亡者,亡者大多逃至南塘的船舫中,谢安为京都名声,不许尽捕。谢安乃东晋太傅,东晋京都在建康,则金陵有“南塘”无疑。谢安既筑了金陵“西洲”,又为京都名声计,而不许尽捕逃至“南塘”之亡者,说明金陵同时有“西洲”与“南塘”则明矣。

其二,认为金陵“南塘”即是《西洲曲》之“南塘”,古已有之。清人吴兆宜注《玉台新咏》堪称权威,他在注《西洲曲》“南塘”时,即引了《世说新语》的记载,《世说新语·任诞篇》说:“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修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东晋车骑将军祖逖,在过江之初,曾使健儿夜劫“南塘”。很明显,吴兆宜认为此“南塘”即是《西洲曲》之“南塘”的,此事当然发生在祖逖“过江”(时由北方移居京都建康统称“过江”)后的金陵之“南塘”。《晋书·祖逖传》亦记载了这件事:“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此复南塘一出不?’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解救之。”此说“扬土、南塘”,即东晋扬州刺史治所金陵之南塘是清楚不过的了。而这南塘在城西莫愁湖之南,即今地名“南湖”是也,而这“西洲”与“南塘”确实只需“两桨桥头渡”。

综上所述,在《西洲曲》产生之时,金陵确有“西洲”与“南塘”,两处当时都是京都建康的好去处。由此可以认定,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写的是金陵景物。

(责任编辑 霁 明)



dfz.nanjing.gov.cn

程廷祚



凌昕

月为之作书几幅，令其鬻售以为生计。江宁织造曹寅曾想将他罗致门下，为其所拒，又请人转托他代伪作董其昌墨迹，表示愿意承担他的生活费用，他则严词峻绝，说：“吾生平不解作伪！”程京蓐著有《野处堂遗稿》，袁枚为其作跋，说他的文章“其理淳，其言正”。康熙五十四年(1715)71岁时卒。

程京蓐近60岁时方娶妻，生有二子，长即廷祚，次名嗣章。廷祚初名默，字启生，号绵庄，晚号青溪居士。当他出生之际，家道已经衰落，生活极为困窘。其父京蓐有时不得不“书屏幅”以“易薪米”即卖字为生，但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却不放松，“凡十三经，二十二史，(离)骚、(文)选、诸子百家之书”，均令二子研读。程廷祚自幼聪颖过人，14岁时(一说15岁)即能写出一千余言的《古松赋》，受到洪嘉植的赏识，劝他专攻经学，并且对人赞扬他说：“是子必为儒宗。”从此，廷祚“遂肆力诸经，毅然以圣贤为归，不依门户，而能通汉宋之症”。乃弟嗣章则“以经让先生，而专攻史学”，与廷祚“白发扶持，熏熏熙熙，各以一家言为顷簏之欢。”程廷祚生平著述甚丰，除诗文集以外，据《清史稿》本传记载有《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尚书通议》三十卷，《青溪诗说》三十卷，《春秋识小录》三卷，《礼说》二卷，《鲁说》二卷等。

程廷祚自幼“不妄语言”，其父执来访问，则“进鸡黍，侍立左右，如弟子职”，极为尽礼。为人“性端静，迂缓其衣冠，传先王语，人见之如临高山，气为之肃”。袁枚还记叙了时人对他的看法：

丙辰秋，召试者同领月俸于户部，同乡程鄞渠指一人笑曰：“此吾家娘子秀才也。”……以其闲静修洁，故号“程娘子”。

——《随园诗话》卷五。

程廷祚虽然有“程娘子”外号，然而为人却秉承乃父刚正不阿之风，所谓“好正襟危坐论古今忠孝大节”。这从他对待功名态度中可以看出。

胤禛帝在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初八日“上谕”中曾提出要举行博学鸿词科试，说“惟博学鸿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润色鸿业，膺著作之盛，备顾问之选”，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二十七日再行“降旨”催办。但不久胤禛死去，弘历继位，于同年十一月初十日“再为申谕”，要求各地督抚“悉心延访，速行保荐”，于次年即乾隆元年(1736)方才举行。安徽巡抚王宏书荐程廷祚赴京应试。适逢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张廷玉为扩大一己势力，不遗余力地网罗人才，令人转告程廷祚：“主我，翰林可得也。”程廷祚不愿投靠权贵门下获得功名，乃上书给张廷玉说：“某闻之：上交不谄，下交不谀，先圣之明训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交际之通义也。……今某于阁下，分则非属吏也，以为‘贵贵’，则非士之所守；若云‘尊贤’，则贤者又未可以呼而见也。”不卑不亢，正色予

与陶湘齐名的程廷祚，在当时之所以被人目之为“南陶北程”是因为陶湘住在城南库司坊，而程廷祚则住在城北如意桥。金兆燕有《欲晤程绵庄先生不得，作此奉柬》一诗，云：“君家住城北，我来客城南。……思君梦逐秦淮水，一夜先过如意桥。”原注有“先生里名”字样(《棕亭诗钞》卷七)。袁枚也说程廷祚的宅舍在“白门之如意桥”，与他的随园“相邻”。

其实，程廷祚后来的声名大大超过陶湘。他在学术上的建树，也是陶湘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程廷祚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卒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长于陶湘十余岁，卒时年77，其时，陶湘尚未中举。

程廷祚先世原为安徽新安(今歙县)人，从他的曾祖程虞卿起即迁居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祖父程莘乐，字任之，原为明朝生员，入清之后未曾出仕，而去浙江经营盐业，从此饶有财富，莘乐虽为盐商，但敬重斯文，曾经组织崇文社，以文会友，还倡建紫阳书院，崇祀朱熹。父亲程京蓐生于顺治二年(1645)，为人鲠直，敢于面斥人过。嗜于览读，擅于作文，尤工书法。友朋中有贫困无以为生的人，他则每



青花萧何追韩信图梅瓶

一件鲜为人知的国宝

● 葛玲玲

南京市博物馆藏青花萧何追韩信图梅瓶，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元代晚期青花瓷器，解放初期从明代黔宁王沐英墓中被盗出土，后流散到社会上，现为南京市博物馆征集收藏。

沐英是明太祖朱元璋养子。他少年投军，久经战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战功卓著。明王朝建立后，沐英镇守云南，封西平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去世，被追封为黔宁王，归葬于今南京市江宁县东善桥观音山（又名水阁将军山）。

关于梅瓶，《饮流斋说瓷》是这样描述的：“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梅瓶的烧制年代始于宋，到了元代，它的整个造型趋于丰满浑厚，给人以稳重之感。这件梅瓶为元代后期梅瓶的标准造型，通高44.1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瓶口小，平沿，颈细而短，丰肩，肩以下收敛明显。整个器型秀丽挺拔，亭亭玉立。装饰纹样可分六组：瓶口外壁饰杂宝，肩上部饰缠枝西番莲，腹下部饰一圈

以回绝（《上宫保某公书》），如此，张廷玉无异碰了钉子，程廷祚自然被刷落。

程廷祚铨羽回到南京时，年已45岁。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朝廷诏举经明行修之士，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又举荐他去京应试。自上次离京之后，廷祚老而弥坚，十余年来，穷而守志，一心著述，而声名更著，为他到处揄扬者颇不乏人，但由于他一向曾议程朱、非难制义，并不为猎取名功而迎合统治者的意旨，因而嫉恨厌恶他的人也为数不少。在此次应试中，自然难以中选，而“复报罢，归时年六十有一矣”。对此，程廷祚十分愤懑，南归之际给相国陈世倌上书，认为康熙朝举行的鸿博考试，被荐者七十余人，而录用者五十余人；乾隆元年举行的鸿博考试，被荐者二百余人，而录用者才十余人。至于此次经学考试，被荐者仅四十人，而录用者仅两人。乾隆朝两

次考试合共录用者甚少，对这种不正常现象，廷祚大声疾呼地予以斥责，说：“是历年愈久，而人才愈不逮往日。国体所关，曾未有大于是者乎？”认为相国陈世倌对此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说他在“朝端不闻一言之建白”，如此“能令天下释然于其故乎？”（《南归上海宁陈相国书》）。自然，他的意见是不会得到陈世倌为代表的统治者所重视的。此后，终其一生，他未曾出仕。

程廷祚出生之际，生活已经相当贫困，早年常赖其弟南耕为大僚作幕，“所得脯脩”与其“共之”。而至晚年，乃弟南耕已“老且聋，不能远游，食指益繁，用是竭蹶”。在这种困窘的境遇中，他却“处之泊如”，不摇尾侯门，不折节权贵，功名不苟得，富贵不苟取，诚为难得之学人。（责任编辑 宁宁）

卷草纹,胫中部饰一圈变体莲,近底部变体莲内绘缠枝花卉垂珠纹,器腹主体纹饰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历史故事,以松、竹、梅、芭蕉、山石等为背景。韩信原为楚霸王项羽的部下,未受重用,投靠汉王刘邦,又遭冷落,怨怒之下,弃官逃离。萧何月下追韩信,向汉王保荐,刘邦拜韩信挂帅将兵,终于打败项羽,赢得胜利。画面上,萧何快马扬鞭,心急如焚;韩信踌躇岸边,进退两难;老艄公对待渡人的神情疑惑不解。整个画面人物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妙笔传神。这组杰出的绘画艺术品,很可能是出自名画家的手笔,由匠人描绘到瓶上的。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属青花瓷,所谓青花瓷器,是指运用氧化钴等矿物原料配成绘画原料,在事先做好的瓷坯上绘出图案纹样,然后再罩上白釉,入窑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它的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不褪脱,这些优点是任何釉上或釉下彩瓷器所无法匹敌的。所以,它一经出世,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起来。几百年来,它一直是我国明清两代瓷器生产的主流。

目前的考古研究表明:在唐代,我国已经烧制成功早期青花瓷器。到了元代,由于制瓷工匠掌握了钴的呈色原理,青花瓷器正式烧制成功并日臻成熟。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器,更是异彩焕发。我馆收藏的沐英墓出土的青花梅瓶为景德镇窑产品。此瓶造型端庄、稳重,胎质洁白细腻。通体装饰图案,层次较多,但多而不乱,画面主次分明,浑然一体。而且梅瓶上以人物画作装饰的也极为罕见。由于使用进口苏泥勃青料,含锰量低而含铁量较高,发色苍翠,明艳浑厚,底色白里泛青,与青花互为映衬,相得益彰。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水平的青花代表作,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争睹芳容。

多年来,前来我馆观赏、研究这件青花梅瓶的领导和专家学者络绎不绝。1986年12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谢辰生来馆看了梅瓶,大赞:“太精美了!为确保梅瓶安全,你们以后最好再也不要拿出来了”。“再也不要拿出来”,当然很易做到,但由此可见文物局领导的爱宝之心。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先生、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等,都曾来馆鉴赏梅瓶,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一批又一批来自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以及来自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研究中国古陶瓷的专家学者,都以能看到这件稀世珍宝而感到莫大快慰。一位美国博士研究生,

为研究青花瓷器,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我国,只要求观赏这件梅瓶,当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满足要求时,这位博士生急得都要哭了。后经请示领导部门同意,他才破涕为笑,并一再表示:这一趟来中国收获太大了!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当时英国驻中国大使艾惕思先生曾数到金陵观赏这件梅瓶。由于艾氏没搞清楚梅瓶的收藏单位,竟两下南京而未能如愿,直到他打听到梅瓶确切的收藏地点,第三次来南京时才终于看到了它。笔者有幸参加了那次接待。艾惕思先生一眼看到梅瓶,就惊叹不已,连连竖起大拇指说:太好了!你们博物馆只要有这一件梅瓶,其它都可以不要了。尽管他可能说得过于夸张了些,但从某种意义却说明这件青花梅瓶确实是元代青花的绝品佳作。他还说,他到中国来当大使之余,以研究元代青花瓷器为最。他到过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国内许多博物馆,象这样的梅瓶只有三件,另两件已流传到国外,而且尺寸都比这件小,釉色、纹饰也不及这件精美。然后他竟爱不释手地抱着梅瓶整整研究了一天。回国后,艾氏出版了厚厚的一本书,专题介绍这件青花梅瓶。

关于这件青花梅瓶的时代问题,一直有着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是元代,有的认为是明初。我们认为,虽然此瓶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墓,但晚期墓葬随葬一朝代物品的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一个王朝的更迭并不能立即改变某种特定的工艺品制作,就是到了明初,也完全可能承袭元代的工艺制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此瓶口外壁复莲内的杂宝纹和通体六组花纹的构图,都属元代风格;肩上部两边下翻的葫芦形叶,又与北京鼓楼大街元代窖藏出土的青花凤头壶相近(参见《考古》1972年1期);而主体纹饰“萧何月下追韩信”是西汉初年的历史故事,曾见于元曲的一个剧目,为这一时期人们所喜闻乐见。

此外,元代青花瓷中多以古代历史故事为题材,如国内外收藏的“明妃出塞图”、“周亚夫屯军细柳营图”、“三顾茅庐图”等元代青花瓷器,就是最好的旁证。因此,将这件青花梅瓶定为元代晚期较妥。

沐英墓出土的这件青花梅瓶,无论从造型、釉色、纹饰来看,都是元代青花瓷器中一件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因此,国内外研究瓷器的专家们一致公认它为我国国宝。它确实体现了我国古代制瓷工匠的高度创造性和卓越的艺术水平,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制瓷工艺、绘画艺术及青花瓷器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责任编辑 海 鸣)

左宗棠在南京 的 治水活动

● 张其立



左宗棠画像（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左宗棠画像（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左宗棠(1812—1885)是清代同治、光绪两朝的封疆大吏和枢府大臣。光绪七年(1881)九月,由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并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改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商务大臣。

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后,以为“两江时务之要,无过海防、盐务两端,而水利尤为攸关,三吴之富强贫寡悉视乎此则,亦言海防者所必及也。”光绪八年(1882)春,设水利局,这年他已71岁,身体多病,但在《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摺》中犹称:“此次莅任江南,惭无报称,惟农田水利一事躬亲相度。”

左宗棠在南京的治水活动共有四起:朱家山河、赤山湖、通济门与金川门、带子洲与江宁镇。现分述

如下:

一、朱家山河。这是在浦口地区为滁河开凿一条通向长江的分洪道工程。上起滁河张家堡,经板桥,穿朱家山,至浦镇东门折向南门,出老江口入江。全长约18公里。左宗棠称开河原因为:“安徽之滁州、来安、全椒一州两县众山环绕,山水三面下注,兼受定远、合肥之水至三汊河汇流,绕六合二百余里而达于江。当山水陡发之时,河流纤缓不能骤泄,致滁州、来安、全椒、江浦、六合五属圩田悉遭水患。”就今天的认识而言,发源于安徽肥东县的滁河,各支流河道的比降比干流陡,特别是中游的清流河、来安河的比降更陡。一遇大雨,这两条支河的洪水只需12小时就能到达干河,水位一天陡涨三米,而干流弯曲狭窄,比降平缓,下游又受江潮顶托,排泄不畅,极易造成洪涝灾害。从明代成化十年(1474)起,就议论开凿朱家山河以为旱引潦泄,历经明清两代多次议论或开凿,但都以利害得失、权势之争、工费艰巨,尤其是朱家山中段石根坚硬,“惟凿之力两穷”而屡议屡辍。

左宗棠于光绪九年(1883)兴办朱家山河,历时两年,终于改变过去的“迄用无成”局面而胜利完工。在这项工程中,左宗棠运用了三个有力措施:一是以重臣身份奏准朝廷动用“盐票项下”积款,支付用银十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两的巨额经费。二是利用当年用兵新疆的经验解决石工问题,委派旧部王德榜督率熟手勇丁在朱家山用火药轰石,“以棉花火药凿管通山,层层轰揭”,“药信一燃,石块四揭,声势之险,无异战阵,竟能将该处石脊一律开通。”三是在河工中先后投入十一个营的防军力量,后来“又准每营各加募勇夫百数十名,照民夫发给工值,帮同工作。”

朱家山河开成后,对滁河流域中、下游的旱引潦泄起到一定作用。但就今日情势而言,朱家山河的分洪能力只有100秒立米左右,远不能解决滁河的洪水出路。所以在1971年新辟了驷马山河分洪道,泄洪能力为500秒立米。1990年建成马汊河分洪道,泄洪能力为1018秒立米。这种规模是古人难以企及的。

二、赤山湖。位于秦淮河东源句容河的上游,为三国孙吴赤乌年间所筑,用以拦蓄“九河来水”,为秦淮河缓冲源自茅山的洪峰,并“灌田号称万顷”。由于水土流失,湖底淤垫,加之周边围垦,赤山湖到唐时周长为120里,宋末元初缩为80里,明代仅60里,清末缩为40里。赤山湖因容积缩小,难以宣泄,每当洪水暴发,下游以断面不足,溃决圩堤,上游则以水流不畅,造成潦灾。光绪八年(1882)十月,左宗棠调拨防军5000人兴工,历时一年四个月,疏浚赤山湖道士坝至陈家边新旧河道,“计长二十里有余,均一律挑浚深通,圩堤加高培宽,捶筑坚固,沿埂栽

种桑秧以护堤而兴利,其下游之三汊河业经开浚,再行接挑秦淮河道,以畅其流。又修建陈家边闸及陈家村木桥各一座。整个赤山湖工程共计用银两 28400 余两。

自清末迄今,经过百余年的社会发展变化,到 1980 年,赤山湖湖面已基本全部利用,仅剩下河道水面 5.47 平方公里(约 8200 亩)。句容河水改为直入秦淮河。对秦淮河流域治理的原则定为:上游丘陵山区以蓄为主,扩建水库,洪水年滞洪,干旱年蓄水灌溉;中游疏浚河网,整修圩堤,增加河网行洪能力;下游扩大排水出路,结合引江。据此,南京市于 1980 年 6 月建成全长 18 公里的秦淮新河,行洪流量 800 秒立米,使流域行洪能力提高约两倍。这种流域性的治理规模,也是古人难以企及的。

三、通济门与金川门。秦淮河自南向北流至通济门外与护城河汇合,并分流入城。内秦淮河在清代日益淤塞,康熙十一年(1672)以水患将东水关闭塞,11 个水门仅留 1 孔入水,内秦淮河因水量不足淤积日甚。嘉庆九年(1804)与二十二年(1817)曾两次整治,增加城内河道水量,但遇大水则又泛滥成灾。道光十一年(1831)又将东水关闭塞,致使“城内尽成死水”。金川门是金川河的入江孔道。明初,漕船可从长江经金川河驶入城内三牌楼附近的大市桥、狮子桥,再用粮拨小船通大、小锦衣仓及平仓。明都北迁后,放松管理,水量因受城墙约束减少,河道日渐淤垫,以致

失去航运功能。左宗棠以为:“通济门内外桥闸为秦淮附郭正流,金川门内外河道为港汊入江去路,均为详考地势,择要建闸、建桥,乃得收纳诸水导引清流,陆居、舟居咸受其益。”光绪九年(1883),左宗棠调拨防军两个营承办,共挑土方十六万八千余方,两门内外河道、桥闸各工共用银 83560 余两,居四起工程费用中第二。如今,1969 年已在通济门以下建成秦淮河武定门红旗抽水站,可双向抽水 46 秒立米,补给秦淮河流域灌溉水源及抽排涝水和城市污水。金川门则于 1958 年建成泵站,以后一再增建,排涝能力已达 10 秒立米。

四、带子洲与江宁镇。带子洲在长江南京段下游,位于龙潭镇东北花园乡江中。成洲于明代天启年间,因洲呈长条形,故名带子,现已讹为太子洲。清代,该洲与南岸陆地相连成为边滩。江宁镇在长江南京段的上游,是江宁河注入长江的河口所在。江宁河灌溉陆郎、江宁两乡约七万亩农田。左宗棠以为:“带子洲沿江之圩堤、江宁镇濒江之闸坝,均大半冲塌残缺”,于光绪十年(1884)三月兴工,共挑土方十五万七千余方。桥梁、沟道、圩堤、闸坝各工共用银 76780 余两。

左宗棠于光绪十年(1884)三月离开南京,次年九月病逝福州。

(责任编辑 惠 兰)

(上接第 59) 李波(十二中)、李国青(十二中)、过景玮(十二中)、王铁凡(南京航空学院)、王莉莉(西石坝街)、顾鹰(金陵中学)、刘颖(十二中)、谢琨(十二中)、刘传知(永丰化工厂)、蒋晖(有机化工厂)、冯伟(市委办公厅)、孟义佳(无线电元件厂)、聂礼贵(南京医药总公司)、马骏逸(金陵中学)、陈辉(江苏省建筑设计院)、姚俊(雨花台中学)、蒋晓燕(五十四中)、刘璇(十二中)、卢其尧(南京大学)、余慧(上新河中学)、谢富彤(雨花台中学)、邱伟茹(上新

河中学)、谢超(金陵中学)、汪晓晨(上新河中学)、王路(金陵中学)、谢玲(上新河中学)、赵兵(上新河中学)、陈洁(六十六中)、刘梅华(烷基苯厂子弟学校)、金日华(金陵中学)、乔凡芸(金陵中学)、周才金(玄武区防疫站)、曹颢武(南通县余西镇)

纪念奖:(200 名)名单从略。

组织奖:李松韵、董克信、苏永英、马明山、潘启超、袁晓红、蒋作初、钱美华、周林福、卜秀华、蔡虎因、林建飞、周荣海、张文全、杨镇陵、刘鼎炎、李景景 (竞赛办)

万人参加国情教育知识竞赛

隆重举行颁奖大会

由南京七单位联合举办的“热爱南京 振兴中华”知识竞赛，到9月底圆满结束。这次报名参赛的有一万余人，除个人参赛者外，还有以班级、车间、科室、团支部集体参加的。其中以大中学校师生为主体，还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文化、新闻、党史、方志、文博、图书、档案、商业、旅游、金融、交通、邮电、科技、医务工作者，宗教界人士，以及城市居民、个体劳动者和待业青年，年龄最大的75岁，最小的仅11岁，参赛方面之广、人数之多足历届少见的。

经过评委们认真讨论，考虑到这次参赛人数增多，决定增加获奖名额。经细致评审，现已评出团

体奖14名，个人一、二、三等奖共48名，纪念奖200名，组织奖17名，并于10月19日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发奖大会。参加发奖的有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琬、市委秘书长郑凤翔、市政府副秘书长吴迪祺、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王光根、市文化局长查双禄、市级机关管理局局长樊道中、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王能伟、姚文烈、市教育局副局长毛秋生、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李炳均、市医药总公司原副书记于有先、金陵制药厂厂长江中银等。查双禄同志代表主办单位讲了话，获团体奖和个人奖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热爱南京 振兴中华”

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团体奖：

一等奖：(1名)

金陵中学

二等奖：(3名)

南航附中

南京十二中

南京六十六中

三等奖：(10名)

南京五中

南京宁海中学

南京上新河中学

南京马群中学

华东工大总校附中

南京中山中学

南京迈皋桥中学

南京十四中

南京燕子矶中学

南京紫金山中学

个人奖：

一等奖：(5名)

沈含波 (南航附中)

杨纪青 (白下区象房村粮站)

王滨滨 (南京洪武商场)

顾苏宁 (南京市博物馆)

马刚 (南京市鼓楼医院)

二等奖：(10名)

蒋海宁 (南京烷基苯厂子弟学

校)

孙国强 (市级机关管理局)

胡明华 (南京中医学院)

张正英 (南京洗涤剂厂)

黄斯海 (南京十二中)

王树根 (金陵石化炼油厂)

杨涛 (金陵中学)

张伟 (东南大学)

王珏 (烷基苯厂子弟学校)

唐明 (总参南京干休所)

三等奖：(33名)

(下转第58页)

(总411)·59·

六合 文庙



● 朱振堂

古城新貌(六合孔庙) 朱振堂摄影

南京郊县六合的现代建筑群中,有座修葺一新、三层飞檐、六角攒顶式的魁星亭,座落在孔庙大成殿的东南方,亭顶为天蓝瓷质。原亭早毁于“洪杨之乱”,现亭是清同治年间重建的。近年南京市政府又拨款重新修整的。

孔庙俗称“文庙”、“夫子庙”。现在孔庙古建筑群是南京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相传,六合一带是古战场,又是南京的江北门户,东邻古城扬州,文人墨客不敢在六合久居,一般都是南下金陵,东奔扬州,故六合从未出过状元。后人不甘示弱,建造一座魁星亭在文庙内,意为文曲星高照,六合人夺魁。

据县志记载,六合的文庙始建于尊孔极盛的唐朝咸通年间(公元860年),后因战争频繁和原址低洼,先后易址搬迁六次,重建七次。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攻克六合城,孔庙再次毁于兵火。现存孔庙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建的,距今120年。是迄今苏北地区保护较为完整的一座孔庙。

孔庙中心建筑是大成殿。大成殿由24根直径约40厘米、高达10米的油漆朱红色的木柱支撑。朝南一顺开9扇下雕花上方格的木质大门。大成殿地基当时高于其他建筑,屋面飞檐龙脊、斗拱,皆为木质结构,整个建筑显得雄伟壮观,十分气派。当时殿内供有“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两侧供有颜子、曾子、孟子等牌位,再两侧供有朱熹等12位先贤的牌位。殿内有“万世师表”、“与天地参”等六块大匾高悬四壁。

大成殿前是露台,三面皆围以雕花石栏,并有台阶,台阶两旁皆有石鼓相对。沿露台向南拾级而下,有长24米、宽8米的云路。路面皆以整块青石刻有二龙遨游潜祥云图案。云路两侧是东、西庑,

内供有几十个先贤的牌位,其中部分是孔子的得意门生。

云路向南直达戟门。戟门有3开大门,高7、8米,木质大门上皆有突出的圆形木质装饰、中门两侧安放了一对白色的雕有石狮盘球图案的石鼓子,东、西两侧各有一对青石雕花图案的石鼓子。戟门的天花板上南北两边皆画有39只栩栩如生、展翅欲飞的白底蓝色的天鹅。戟门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内供有200多位官吏牌位。再两侧是文武官厅,是专供祭孔时达官贵人休息的地方。

沿戟门拾级而下,南有“棖星门坊”、“天开文运坊”和泮池。泮池是清同治年间购置民地建造的,池内壁皆砌有石墙保护,池面建有半月形石栏,护石栏至今尚存,泮池四面环以宫墙,东有“德参天地坊”、西有“道冠古今坊”,两坊外侧各立有“文武百官到此下马”的石牌。现坊、牌皆毁,但宫墙保护尚十分完好。学宫朝南门墙上有三道门,东、西两旁门朝北的门头上至今尚留存砖刻隶书“圣域”、“贤关”二字,每字约40厘米见方。

大成殿后有崇圣殿,之后有明伦堂。凡是因“忠”、“孝”、“节”、“义”等而去世的先人牌位皆供在明伦堂内,以激励后人。该堂之东为“学馆”,是专供学生讲学、考试的地方。

祭孔仪式每年在孔庙举行两次,都在夜间进行。孔庙门前张灯结彩,案上大香大烛,进行唱诗、奏乐等活动。祭孔场面十分隆重热烈。

如今,孔庙成了名副其实的“学宫”。六合县实验小学就设在孔庙内,每年都要为中学培养输送数百名优秀学生,深受人们的欢迎。

(责任编辑 淑玉)

也谈江南贡院的最后一次乡试

● 张铁宝

《南京史志》1991年1.2合期第37页,刊登了吕华清同志撰写的《江南贡院的最后一次乡试》文章。该文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南京贡院举行的最后一次乡试,“破天荒地没用八股文”,而“代之策论”,“二场有策论四道”。其实,作者对清末南京贡院最后乡试的情况及所列四道试题,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兹将清代科举的有关知识及江南贡院最后两次乡试的情况简述如下。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始于隋朝,至明清两朝更为完善。科举一般分为县试、府(或州、厅)试、乡试(省试)、会试和殿试五种,尤以后三种最为重要。乡试、会试和殿试的第一名,分别称作解元、会元和状元。凡乡试录取者称举人,并取得次年进京参加礼部会试的资格。乡试一般每隔三年在各省城举行一次,考期一般在阴历八月,分三场。临考之时,由各省最高行政长官巡抚亲临考场监督,以示公正和防止舞弊。考题主要摘自《四书》、《五经》里的文句,应试文章的文体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依据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四书集注》等书,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

所谓“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是儒学的经典著作。八股文又称“时文”或“制义”,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说破题目要义;“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阐明;“起讲”乃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起股”至“束股”才是文章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段中,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八股,故叫“八股文”,或称“八比”。如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后,随即上奏清廷,在南京举行乡试。这次乡试的试题为:“叶公问政”二章;“有餘不敢”二句;“汤执中立”一节;赋得“桂树冬荣”得“风”字。这种形式呆板的文体,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时有了变化。是科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废除八股文而改试策论。头场为“史事时务论”,二场为“策问”,三场为“经

义”。试题也由原来的四道改为五道。

二十八年江南乡试的题目是:

《汉文帝减租除税而物力充羨,汉武帝算舟车、榷盐铁、置均输而国用不足论》;

《唐杨缵疏停明经进士,令州县举考廉论》;

《宋神宗置太学三舍,厥后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请起李纲,即出自太学论》;

《元初遣速下台拔都等西征,其兵力之盛直至斡(俄)罗斯以西论》;

《明以尚宝少卿徐贞明领垦田,使督治京畿水田论》。

由此可见,清末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并非实行于光绪二十九年,在其前一年就已实施了。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宣布推行学校教育,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这实际上废除了沿续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所以说,光绪二十九年举行的乡试,是清代最后一次乡试。

最后一次江南乡试,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在南京夫子庙贡院举行的。主考官是清内阁学士杨佩璋,副主考官是外务部左丞绍昌。杨氏字筱村,河南长葛人,光绪三年进士。绍氏字任庭,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十五年进士。这次乡试的试题为五题,并非吕同志所说的四题,而且题目也不是该文所说,这五题是:

《汉武帝时征民有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论》;

《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论》;

《谢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论》;

《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论》;

《明太祖诏商税毋定额论》。

是科解元为陈康祖,江苏靖江人。

顺便说一下,清初设立江南省,辖地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一分为二,东为江苏省,西为安徽省,分别设官治理,但是乡试却未分开,仍按江南省旧例在南京举行。不过,监临则由江苏和安徽巡抚轮流担任。

(责任编辑 霁 明)

首创于南朝的启蒙读物

周兴嗣妙著《千字文》

● 朱 明

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尤为重视识字。在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主要的幼学启蒙读物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昔时贤文》、《龙文鞭影》等。其中南朝梁武帝时期在南京刊行问世的《千字文》被公认为世界教育史上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

《千字文》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是南朝的著名御用文人、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敕编写的。周兴嗣,字思纂,祖籍陈郡项县(今河南项城县东北),汉太子太傅周堪后代。高祖周凝,官至晋征西府参军、宜都太守。周兴嗣世居姑孰(今安徽当涂),家境小康,幼年时代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13岁时,他只身来到京师建康(今南京),游学十余载。在这期间,博览群籍,通观古今,走师访友,赋诗诵词,以其文采飞扬,“才学迈世”而名噪一时。世族官僚竞相纳之为门生,与之谈论文史。不久,周兴嗣出任桂阳郡丞,投入太守王峻的麾下。

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代齐。周兴嗣奏《休平赋》以颂扬武帝。其文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平仄押韵,宛若天成。梁武帝读后颇为赞赏,立即把他召到身边作为侍臣。从此,周兴嗣出入宫廷内外,风花雪月,曲水流觞。梁武帝爱好文学,熟谙重用文人可以安邦治国,长治久安,他身边网罗了一大批文人墨客,每逢重大事件和活动,这些文人就填词作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大多数文人因泥古不化,措词常流于空泛和庸俗。唯独周兴嗣的赋词清新隽永,别具一格,因而赢得梁武帝的青睐和信任。周兴嗣先后奉命为梁武帝起草过《光宅寺碑文》、《铜表铭》、《楞塘碣》、《北伐檄》等重要文告,无一不是石破天惊之作,常令梁武帝赞叹不已。

梁武帝一生戎马倥偬,无暇读书。他很希望自己的兄弟子侄能在太平环境中多读些书,最好是能够成为饱学之士,经纶满腹。为此,他甚至自己亲自登台授课。由于当时尚没有一本合适的启蒙读物,而时下流行的一些典籍,如《尚书》、《春秋》、《左传》、《诗经》、《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对于初学者来说程度太深,使人望而却步。梁武帝感到有必要编出一本象样的启蒙读物。起初,他令一个名叫殷铁石的文学侍从,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飘若游龙,矫若惊蛇”的手迹中拓下一千个各不相同的字,每纸一字。然后

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可是鸡零狗杂,杂乱无章,不便记忆,收效甚微。梁武帝寻思:若是将这一千个字编缀成一篇文章,岂不妙哉!于是,他召来自己最信赖的文学侍从、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陈述了自己的想法,随即命令周兴嗣将这一千个字编写一篇互不重复而又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

周兴嗣接受任务后,回到家中,闭上房门,将王羲之的这一千个字的拓片摊在桌上、床上乃至地下,逐字揣摩,反复吟读。入夜,万籁俱寂,透过方格窗纸,但见周兴嗣屋内灯光摇曳,人影浮动。就这样,他苦思冥想了一整夜,直到晨曦微露,金鸡报晓时,方才恍然大悟。他乐不可支,边吟边书,终将这一千个字联缀成一篇内涵丰富的四言韵书。这就是后来长期流传于世的《千字文》。《千字文》较宋代编写的《三字经》和《百家姓》,成书时间要早四到六百年。它与《三字经》、《百家姓》配套成龙,简称为“三、百、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启蒙教育的入门教材。明代学者吕坤在谈到启蒙教育时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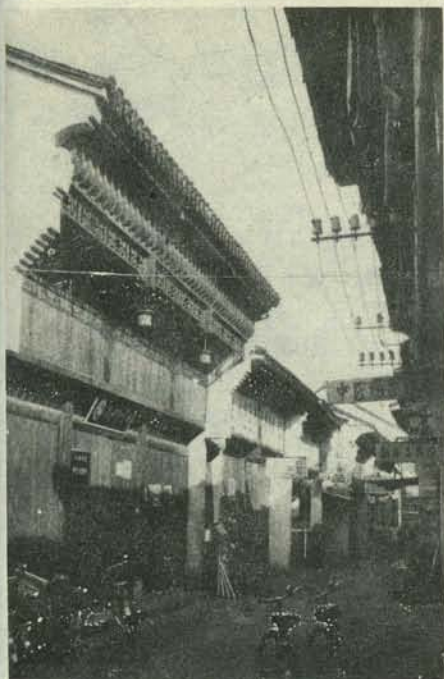
周兴嗣因一夜用脑过度,鬓毛都变白了。

《千字文》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以“谓语助者,焉哉乎也”结尾。全文共250句,每四字一句,互不重复,句句押韵,前后贯通,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农业、园艺、饮食起居、修身养性以及封建纲常礼教等各个方面。它的第一位读者梁武帝读后,拍案叫绝。连忙叫宦官送去刻印,刊诸于世,作为初学者的识字课本。

周兴嗣因出色地编写出《千字文》一书,解决了梁武帝的燃眉之急,深得梁武帝的欢心。梁武帝对他优渥有加,赏以金银玉帛,并且将他擢升为给事中,佐撰国史。周兴嗣不负所望,先后撰写出《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书,直到普通二年(512年)去世。

时过境迁,斗转星移,如今中小学校里都有系统的科学的教材了,沿用千年之久的《千字文》已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然而,周兴嗣在1400年前就能编出这样一本通俗的启蒙读物,并且为世人所乐于接受,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责任编辑 霁 明)



高淳县淳溪古镇 的 建筑艺术



高淳古镇 陈后铎摄

●陈翼雄

高淳古镇 陈后铎摄

淳溪古镇一条街,历史悠久,小有名气,现被南京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东街吴家祠堂还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古镇原属溧水一乡镇,明弘治四年(1491年)置高淳县后为县署所在地。古镇紧靠固城湖边,滨临官溪河岸,这里冈陵起伏,有桥有渡,水路舟楫可达大江,陆路商贾可行皖南,东西横亘一街,长约一里之间,南北城楼相望,约为一箭之距。东西南北四方,早在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就建有七座城楼,东为宾阳,西为留晖,北为拱极、通贤,南为安澜、襟湖。东北依冈阜筑土为垣,西南凭官溪河为濠。以街为中心,北高南低,背阴向阳,北有官署武库,南有栈房仓库,东有祠堂戏楼,西有坛庙寺院。这里作为集市,趋吉避凶,聚气不耗散,既可防备庇身,又利于经济交往。后来,随着集镇经济发展,客帮外籍人涌入古镇后,便形成人烟繁华,商贾云集的小集镇。来自各地客帮有:“太平帮、古埭帮、泾县帮、徽州帮、金陵帮、泰州帮、金斗(桐城)帮。这些客帮进入古镇,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同乡会馆,垄断某些行业,为招徕客商,建造店堂,把各自家乡建筑风格带入古镇,从而使淳溪古镇各种建筑百姿纷呈,不拘一格。古镇建筑艺术和特色有如下几点:

一、店门营造艺术

古镇店门营造大体归为三类。

(一)大门堂店门。按《宅经》宅大门小、取实避虚原则,大门堂店门建造,以店为中心,外侧围以高厚墙垣,门前是一堵高约二层的封火墙,正中开两扇大门,外形与苏州园林入园处相似,不设门楣,门框上方或左右各嵌铭石一方,为避免冲破,常将门框墙向

另一侧倾砌,以作出向。左右两侧开窗,用砖雕砌造叠涩檐。因门窗窄小,店堂光线不足,因而进入大门,便建有楼阁式天井一座。天井既是采光日照通风口,又是顾客购物活动点。沿天井傍,设有曲尺柜台,柜台顶端,挂两块青龙牌,一青龙牌上方设有木雕玄坛龕,龕内供奉骑虎执鞭赵公元帅像。除天井外,整个敞厅设有藻井,藻井朴实,少有图案。这类封闭型建筑,一般都被殷实富商如“东阳”、“馥和祥”、“有政康”商家采用。这类建筑,大都几层天井,几层隔墙,几层仓容,几层大门,墙垣完整,并灶皆全,门前高大墙垣,可阻止火灾蔓延,门窗小而坚实,启闭方便,便于保障安全,而且有进路有出路,前门与后街贯道一体。

(二)牌坊式店门。明清时期,淳溪古镇建有拦街三牌坊。牌坊旧址,一在关岳庙门处,一在徐家巷口,一在安澜门处。关岳庙门处和徐家巷口牌坊毁于太平天国年间,安澜门处牌坊毁于50年代。由于古镇曾有三牌坊建造,所以一些商家仿牌坊式样建造店门。牌坊式店门为四立柱落地,正中两柱为主,处于尊位,为店堂正门,两侧倚墙柱与正门柱处于单位,为两侧门,横梁上方支架雕花斗拱,正门悬一额金字招牌,楼上开四扇楼窗,窗棂不嵌玻璃。枋肩支撑屋檐。枋肩上雕有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等消灾祛邪兽物,垛墙突出门面,垛墙则边用砖雕砌造各式鸱尾、龙吻。鸱是佛教中说的摩竭鱼,这种鱼喷浪降雨,可避火压胜。龙吻是雨神,也可避火祛灾。徐家巷口山墙不高,却建有双层龙吻,龙嘴还衔有明珠,小巷口双层龙吻尤为精致。这类建

筑远看好似一座牌坊,店门以朝门闸板启闭,属开放型建筑。

(三)楼阁式店门。这类建筑,门面看似一座戏楼,四根粗壮立柱顶住门梁,梁设梁枋,用整块瓦形木雕横梁托住楼板,形成戏楼台面,中间两柱跨度大,形成戏楼架势,门楼上有台面,稍后装有六扇雕花油漆屏风,屋檐下吊四盏宫灯或明角满堂红。从前“魏长庆”、“仁存堂”药店就是这类门面。这类建筑店门近似戏楼,又不是戏楼,似牌坊又非牌坊。故欣赏这类建筑,令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感。这类建筑也属开放型,大都被资本雄厚客籍商家所采用。原先本籍商家禁忌这类建筑,认为门面开放,嘴大吞不下,难以聚财,其后由于各商家兴衰,鹊巢鸠占,随产业转移,本籍人也占有开放型店门,相反,外籍人入乡随俗,也占有封闭型门面。

除以上三种店门外,尚有独间一开一闭门面的,这些商家大都小本生意,只能以“破甑而为环,斫雕而为朴”来装潢门面。

按《大清律例》规定:民间住宅不许用兽吻,斗拱也不许彩色雕饰。但祠堂庙宇用兽吻、雕饰不在禁例之内。也许是受本地祠堂庙宇建筑影响,这里建筑上僭妄行为比比皆是。

二、古镇建筑艺术特色

古镇建筑,虽然风格各有差异,店门有宽有窄,屋檐有高有低,但就其建筑基本格局而言,却一规同风、均衡对称,各商家一律建造二层楼阁。就连南北通向巷口,也建有巷口楼以作对称。井巷、烧饼巷的巷口楼至今犹在,陈家巷、徐家巷的巷口楼虽被毁坏,但屋顶梁柱依然保存。古镇一条街有通巷十六条,座南朝北五条,座北朝南十一条。这类巷口楼沿巷口扶梯而上。楼上供奉土地神灵,由商家轮班祭祀。巷口楼均是商家捐资兴建,而今巷口石墙上还刻有捐款人名单。全街一律为二层楼,巷口建有巷口楼,这是古镇建筑特色之一。

淳溪古街道,东西长约800米,宽约5米,民国二十三年《高淳县政》记载“路面俱用青石铺成”。1937年各商捐资,全用条石铺砌,中间选用胭脂色枞阳石横向排列,两边用青石纵向摆布、门槛用青石做成踏步台阶,街道漫至官馆巷段,是年日军入侵古镇,壕路工程遂止,其后路面破旧损坏。至1990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拨款重新修整,将原先搬走的枞阳石搬回原处,而今东街至陈家巷段修缮一新。街道整齐美观,色彩搭配和谐,市容古色古香,这是淳溪古镇建筑特色之二。

原先,淳溪古镇商家有布店、黄烟店、杂货店、茶叶店、纸店、药店、漕酱磨坊、铁瓷店等八大行,计三百余店号。由于各商经营项目不一,因而商店内部营造各不相同。漕酱磨坊的后院建有作坊和晒酱墙垣;杂货店附设糕饼房;茶馆注重楼房装潢,登楼均由角屋扶梯而上,沿天井楼廊走入四合院式客厅、雅座;而黄烟店、羽毛扇店、剪花店、金银首饰店却把手工作坊面移至店堂中间,藉以显示资本雄厚,表示现制现卖,货色新鲜,或以制作技巧招徕观众。为防备太湖强盗和皖南山区盗匪入侵,各商家后院营造讲求坚固,山墙高至抬头脱帽,以防盗匪扶篱翻入屋顶。梁椽坚实,椽木间用竹条将其联成一片,后采用钢丝网入网眼,这样即使盗匪登上屋顶,也难以翻入店堂。这种把店面与作坊、钱房融为一体的坚固建筑结构,是古镇建筑特色之三。

淳溪古镇的商家为表现自身文化修养和经营素质,十分讲究招牌店号上的书写和雕塑艺术。招牌分为两类,一为黑底金字,一为金底黑字,一额横竖招牌,约二平方米左右,中间书写两个大字或三个大字。招牌店号如“永庆”、“恒泰”、“裕和隆”、“天兴祥”等字,金底黑字为上乘,用赤色金箔打底,制做隐约可见花纹,上覆油漆黑字,均呈阳文字样。青龙牌书写四字句,标明商家经营性质和家族姓号。如杂货店写“端木遗风”,茶馆写“卢陆停车”,羽毛扇店写“敬呈羽扇”,药店写“济世妙药”,药店还在青龙牌上雕刻李铁拐图像。此外店门前悬挂四块吊牌,吊牌书写名贵商品种类,如药店吊牌上写“参茸桂燕”、“虎鹿仙骨”,杂货店写“两洋海味”、“嘉湖细点”,布店则用上等绸缎做成旗帜,上写“纱罗绉绢”、“绸缎布疋”等字。吊牌正反两面雕刻两种文字。晴天,吊牌挂阳文,阴雨天,吊牌挂阴文。招牌吊牌,字体挺拔俊秀,刀法圆浑。外籍商家一般要请各自家乡第一流名家书写,本籍商家,只有本籍第一流书艺家字体方能登上店门。如邑人施斗南落款写的“永庆”,武进人唐驼落款写的“恒泰”字体,均俊秀飘逸,雄厚凝练。而今东街有政康墙上还残留“有政康号”四字,该字颜体,是胡凤鸣用白茅草扎笔写成的。倘若不加修整,明清字迹便会在古镇上销影匿迹。从前,人们在古镇街上逛街,宛如步入书艺展览走廊。由此可见,把建筑美、雕塑美和书艺秀气、商业气息融为一体,是淳溪古镇建筑特色之四。

对于古镇建筑艺术,因笔者所知有限,只能取其意境情趣,粗略说个大概。

(责任编辑 海 鸣)



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浅谈人物传的文字表述

● 江苏省射阳县志总纂 周其高

人物传是志书的眼睛,要编写出一部合格的人物传,必须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事实要象所传主人公。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过,写文章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这就告诉我们,为名人立传,一定要文如其人。也就是说,你所记述的事实,你所选择的事例,要精当,要象传主。如射阳县海河乡志办在为草野诗人、书法家陈为轩立传中,就有这样精彩的片断:陈为轩 14 岁考中秀才,17 岁奖给优贡生。他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他含悲挥毫,书写了“钟山千古,中山千古;俄国一人,我国一人”的挽联,受到了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的赞颂。1946 年盐阜区普遍进行土地改革,陈为轩不仅带头献出土地,还给怕分田的地主作了“田”字歌:“昔日田为富字底,而今田为累字头,田在心上常思想,田在心中虑不休!……须知田少方为福,只因田多叠叠愁”,田字歌的传播,对地主起了开导和促进作用。短短几笔把这位聪明才子、爱国志士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

二、事例要生动感人。即所举事例要典型生动,促人振奋,催人泪下。有个编辑,在为古代名人司石磐立传时,就有这样一段精彩记述:1644 年 4 月,明崇祯皇帝自缢,清多尔衮摄政。史可法等立福王于南京。史以兵部尚书加大学士督师扬州力图恢复。1845 年,清兵渡淮,史力战而死。高升与魏用进驻盐城,号召忠义战士抗清,司石磐与孙光烈首先举义响应,兴化、如皋、安丰、海安等地相继出义兵,与司、孙联合。很快,他们会合了庙湾、如皋诸地义兵,收复了盐城和兴化,杀伤清兵数百人。后刘泽出降,司石磐与鄧报国也泛海投福州唐王,被海寇马西禄、王大功所缚,献江宁。司、鄧见总督皆挺立不跪,二人争死。鄧说:“彼书生,我劫之书记耳,起义者我也。”石磐大呼曰:“公何言谬,我实首事,公何不丈夫我耶!”讯之者推宦郭承汾,石磐戟手骂之曰:“我一书生,死抗异

族,何中甲秋,宦风宪。今何面目讯我!”系狱六十余日,狂歌痛饮,酣骂不辍,与鄧报国同时被斩于市。临刑时,石磐饮酒赋词:“不觉浮生二九秋,几番欢乐几番愁。而今撒手回原去,山自清兮水自流”(见黄宗羲《弘光实录》,王臣《三忠传》)。传主临危不惧的、沉着机智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笔者没有一句赞美之词,读者赞颂不绝。

三、语言要凝炼精确。志书是传世之作。一句话,能流传千古,也能引起轩然大波;一件事能彪炳史册,也能遗臭万年。因此,对人物传的事实一定要反复核实,多方考证,达到确凿无讹,万无一失,给后人留下信史。如有个编辑,在为南宋宰相陆秀夫立传时,有这样一段记述:“陆秀夫,字君实……德祐元年任礼部侍郎,后升为右丞相。元军南侵,南宋国势垂危,他和刑部尚书夏世林、兵部侍郎吕师孟同使元一年,因和谈未成而返。临安沦陷,他和将领苏刘义等人退至福州,拥赵昰为帝。”这段记述正确与否?我认真查阅了《宋史》卷 451《忠义六》本传,“右丞相”应为“左丞相”;另查同书卷 47《瀛国公本纪》,陆秀夫使元自德祐元年 12 月癸丑(农历 17 日,公元 1276 年 1 月 4 日)至次年正月戊辰(农历初二日,公元 1276 年 1 月 19 日),一共只有 15 天,并非一年。又,陆秀夫使元回来后,临安还并没有“沦陷”,而早在他使元期间,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就已经出逃,他回临安向太皇太后谢氏复命后,星夜兼程,“追(二王)及于道”。可见,“临安沦陷”后他才“退至福州,拥赵昰为帝”,也不能成立。短短 93 字,史实错误竟有三处。

人物的形象要靠自身的言行来树立。古人云:“春秋一字知褒贬”。俗语说:一句话流传千古,一件事彪炳史册。因此,编纂人物传,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真正做到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责任编辑 海 鸣)

程嗣功与《万历应天府志》

● 青岛 王桂云

千百年来,修志乃是尽地方官守土之责,不少地方官吏则认为,如果志书不修,旧者“湮而不传”,新者“秩而不著”,使“载籍缺焉,典章靡考”,便是地方官的失职。地方官做修志活动常常被誉为政绩。明代任过地方官的程嗣功,正是以修志为己任的地方官。自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至万历五年(1577)的近三十年间,独纂两部志书。其所纂志书,以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详略得体而著称。

程嗣功(1525—1588),字汝懋,号午槐,安徽歙县人。生于嘉靖四年(1505),卒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六十三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浙江武康县知县,擢应天府知府,迁南京兵部主事,历广东布政使,官至南京户部侍郎。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成《嘉靖武康县志》八卷,继于万历五年(1577)成《万历应天府志》三十二卷,这两部志书,向称佳作。

程嗣功担任武康县令时年不足三十岁,初任地方官他便把修志为己任。他上任后,便聘邑人骆文盛创修县志。是志继易钢《弘治武康县志》而修,并仿其体例、分纪、表、志、传诸门。卷首程嗣功序。旧志今未存,是志则为现存最早的《武康县志》。程嗣功在志序里,对方志理论有所阐发。称志“以备垂轨,以县迹昭鉴,以述典明法”,具有劝戒、辅治功用,故不可不作。方志要避免“简则失之略,繁则失之诬,义例弗审,文采弗章”之弊;应“详而整,辨而核,匪略匪诬,秩乎有章。……庶几不愧于实录”程嗣功的修志见解可取,《嘉靖武康县志》义例分明,考证精核,叙述明晰,堪称佳构。

继修《武康县志》之二十七年后,程嗣功又创修《万历应天府志》。

府志乃是记述一府范围的志书。府建置出现始于唐代,唐时隶属于道,宋隶属于路,设置渐多;元或

隶属于路;或直辑于中央;明以京畿、应天诸府直隶京师,其余隶属布政司,清因之。总之,府是省以下,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管辖范围与今天地区近似。府的最高长官为知府,府志多由府一级官吏主持修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由朱元璋以集庆路改名。明初建都于此,正统六年(1441)定为南京。应天旧无府志。

明万历五年刊行《万历应天府志》三十二卷,为程嗣功任应天府知府时,聘王一化纂。王一化时任应天府学教授。原刻国内已无藏本,日本内阁文库有存藏,国内仅见中国科学院和南京两图书馆作有胶卷,明万历二十年(1592)补刻本,北京图书馆有藏本,卷六职官增补至万历二十年。按其编次,卷前列万历五年礼部左侍郎、管南京国子祭酒事、江左殷迈序,及凡例应天府境图。卷一至三、为郡纪。卷四沿革表。卷五至七、历官表。卷八至十,封爵表。卷十一至十二、科贡表。卷十三、荐举表。卷十四至三十二,列诏令志、风土志、山川志、建置志、官职志、学校志、田赋志、祠祀志、杂志、共九志。次列宦绩传人物传、勋封传、一行传、列女传、杂传、共六传。此书记载明代典章制度,以及金陵往事颇能与史传相合无谬,纪述尚核实。体例上的突出重点,对沿革、战争叙述较详,灾祥则不作专目。资料取舍亦较合理,是现存较早的一部南京地区方志,国内已无万历五年原刻本。

程嗣功将修志做为地方官的守土之责。他在任知县和知府之处,均有修志之举,曾留下两部志书,实属不易,更可贵的是各有创新,均有独到之处。武康县志是重在详,应天府志尤注在概,各有侧重,为后世修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体例上共为分记、表、志、传者门,可为效仿,但缺图,是其不足之处。强调实录的修志观点,对后进修志颇有启迪!

(责任编辑 海 鸣)

千古英雄传绝唱

文天祥赋诗诀别金陵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年)初名云孙,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岁状元及第,以权直学士院致仕,历任刑部侍郎,知瑞、赣等州。元兵南侵,他屡陈抗元之策,乞斩投降派董宋臣等人,然不为度宗所纳。德祐元年(1275年),他尽以家财为军资,组织勤王兵万人,入卫临安。南宋降,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往元营中谈判,被元丞相伯颜拘留,押至京口时,伺机逃脱,历经艰险至温州,与陆秀夫等人拥立益王赵昰于福州,并募集将士,抗击元军。祥兴元年(1278年),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元将张弘范俘。至崖山,弘范命为书诏降张世杰,文天祥以《过零丁洋》诗与之,末两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元世祖忽必烈得诗,因有“谁家无忠臣”之叹。但转念元初于马上得天下,尚需“以南人治南人”,遂诏谕善待文天祥,^①将其解送大都(今北京),谋以高官厚禄招降之。

文天祥于被俘次年,即祥兴二年(1279年)四月二十二日被押离广州北上。张弘范遣都镇抚石嵩护押。途经江西,转长江水路东下,于六月十二日抵建康,囚于天庆观(今朝天官)。②押送的元兵原计划稍事休整后便立即渡江北上,但当时淮东淮西义士正组织力量,准备趁其渡江上岸时劫救文天祥。押送官兵探得这一消息后,大为惊恐,只得坐等接应援兵,结果一留便是72天。

与文天祥同时被押来建康的,还有他的军幕邓光荐。文天祥的旧仆孙礼等7人,自广州出发时也曾随行,一路上或逃或死或逐,最后仅剩刘荣、张弘毅二人,陪送文天祥、邓光荐至建康。邓光荐(1232—1303年),初名刻,字中甫,号中斋,理宗时举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自南宋惨遭丧乱后,便携其家避难至官岭海,为文天祥所重,参加其抗元军幕。1279年崖山兵败,蹈海未死,为张弘范俘获。文天祥被押往大都,邓刻主动要求陪行。两人虽“年相若,又同里閾,以斯文相好,然平生落落不相及”。③想不到,竟在楚囚中“同患难者数月”。④一路上,他们以诗词唱和,互相勉励。但到建康的第二天,光荐却因患病,不得不与文天祥分开,留天庆观寓住就医。文天祥则被迁禁于城东郊的金陵驿邸,被严密地看守着。

文天祥被羁建康两月余,大部分时间用来为友人邓刻编定诗集。“时余坐金陵驿,无所作为,乃取友人诸诗,笔之于书,与相关者并附焉”。⑤诗集收录了邓刻客海南以来直至建康的诗作,文天祥为诗集

题名《东海集》，取战国义士鲁仲连宁蹈东海，义不帝秦之意，以明他二人义不帝元之志。他在《东海集序》中说：“后之贤者，因诗以见吾二人之志，其心有感慨于斯”。^⑧

孑然一身独处驿馆中，面对楚天空阔，荒城颓壁；想到国破家亡，事业未竟，文天祥内心十分酸楚。他在驿中除为邓剡编定诗集外，还写了十四首诗和三首词。这些诗词后来收在他编定的《指南后录》卷一下（收录自发广州至离开建康前的诗作）中。三首词中，有两首是步王夫人《满江红》韵的。“王夫人”即南宋昭仪王清惠，她先于文天祥三、四年路过建康，随宋恭帝及三宫被掳至燕，在驿中题《满江红》于壁，词末有“若嫦娥肯相容，从圆缺”句，当时中原传诵。文天祥、邓剡到建康，都读到了这首词，文天祥感到：“惜末句少商量”，于是和了一首，又代作了一首。其《代王夫人作》末云：“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表示不愿效王昭仪乞求与嫦娥作伴，逃避人世；更不愿似三宫、皇帝乞哀于元，只因为金瓯已缺，家国沦丧；作者借昭仪口吻，寄寓了自己敢于正视现实、坚贞不屈的高志洁行。第三首《酹江月·和友人》词，则是步苏轼《大江东去》韵的，“友人”即邓剡。文天祥北行，邓以病留建康（后以教张弘范之子，得放还庐陵），作《酹江月·驿中言别》相赠。文天祥的和词，词调激越，慷慨激昂，不下于他的《正气歌》：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

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堪笑一叶飘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向江山回首，青山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江山易改，丹心难灭。文天祥希望友人将来得脱后，能继承他的未竟之志，“方来还是豪杰”。寄语友人，莫忘这残月枝上啼血的杜鹃！

文天祥此次淮水重来，感到这座“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都”的“一片清溪月”，似乎“偏于客有情”，一踏上这片土地，他便写下这首题为《建康》的诗。他在驿邸中怀念病中的诗友，想到自己已抱定为国捐躯的决心，希望邓剡将来能为他作传：“死矣烦公传，北方人是非”（《怀中南》）。他更是崇敬曾抗席骂贼、被金人剖心而死的忠烈之士杨邦义，作《怀忠襄》一首缅怀这位同乡“尚友”。在建康停留的日子里，自入秋后，文天祥一连写了《早秋》、《睡起》、《中

秋》、《送行中斋三首》等十首七律，记录了诗人囚坐金陵驿时的心路历程。“不教收骨瘞江边，驱向胡沙着去鞭。旧夺宫袍空独步，新餐官饭饱孤眠。客恨恰与秋天半，人影何如月色圆？犹是江南佳丽地，徘徊把酒看苍天”（《中秋》），其苍劲之气势，直追杜甫的《秋兴八首》。这些用丹心和泪水写成的诗，寄寓了诗人内心的悲愤和感慨，而其忠坚报国之心，更是溢于言表。

文天祥被囚金陵驿两月余，在即将离别之际，写下了著名的《金陵驿》为题的二首七律诗：

草舍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河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日，化作啼鹃带血归。（其一）

万里金瓯失壮图，衣冠颠倒落泥涂。

空流杜宇声中血，半脱骊龙颌下须。

老去秋风吹我恶，梦回寒月照人孤。

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其二）

其景可哀，其情可悲，其志节更可佩！它是诗人诀别建康。诀别南宋故土的最后誓言。“从今别却江南日”句，传为千古绝唱。

文天祥在建康，曾“有忠义人约夺我于江上，盖真州境也”。^⑨建康义民仍想在仪征附近江面，劫救渡江北上的文天祥，并事先与他取得了联系，约定了时间、地点。可是，在文天祥渡江前，张弘范已带援兵亲临建康，“命兵卫夹舟、陆至扬州”，^⑩作了严密的防范。所以到了八月二十四日，文天祥被押离建康，在东阳（今栖霞东阳镇）渡江上岸时，“淮士有谋夺公江岸者，不果”。^⑪文天祥回首“楼外梁时塔，城中秦氏河”，仰天长叹：“江山如梦耳，天地奈愁何！”（《发建康》）依依作别建康，惘然北行，于是年十月至大都。囚燕三年，终不屈，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尽节于柴市口，年仅47。

（责任编辑 惠 兰）

注：

①邓光荐，《文丞相传》；

②文天祥：“十二日至建康，囚邸中”。而邓却注为十三日到。见《文丞相传》。另据元《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天庆观条：“文丞相天祥、邓侍郎光荐，尝留宿观中，有诗。”

③④⑤⑥文天祥：《东海集·序》，见《指南后录》卷一；

⑦文天祥：《狱中与弟书》，见《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

⑧⑨邓光荐：《文丞相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迅即从重庆还都南京,接收日伪财产,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把躲在大后方的军队调往内战前线,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由美国特使马歇尔写了一个对华报告,国民党政府认为可行,便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南京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这是重庆和谈的继续。

1946年春,国民党中央党部将中共代表团来宁的驻地选址、采办家具等行政事务,一并委托南京市政府(先在中山北路后迁夫子庙明远楼)筹办。接到指示后,市长马超俊和副市长马元放进行了磋商,

决定将此任务交市政府秘书长陈祖平统筹安排。陈祖平又把任务下达给市政府专员王树棧和新闻处主任钮寒冰办理。陈祖平、王树棧和钮寒冰都是湖州同乡,关系密切。秘书处的许多事务工作,陈祖平都直接交王树棧办理。马超俊市长与钮寒冰父亲是挚友,他不仅对钮寒冰很器重,还引导他仿效美国机关的 Information 经验,在市政府内设立了一个类似“不管部”的新闻处,直属市长室领导,把其它部门都不管的事务,如游园活动、来访市长、义民请愿招待

友军等各种对外联络事宜统统包揽起来。当时钮寒冰只有二十几岁,年轻气盛,对此婆婆妈妈的事情毫无兴趣,便推辞说:“唉,我自己的房子还没找好呢?上哪儿给共产党代表团找房子?”陈祖平忙说:“这有何难?自有行家,可以把地政局局长周一葵和工务局局长张剑鸣请来嘛!”当王树棧把两局长请来商量后,周、张二人竟不谋而合,一致举荐了梅园新村17

号、30号、30号后身三幢。

由于国民党还都南京,需大量办公、住宿用房,各民主党派在宁也无办公驻地,故国民政府准备盖一部分房子。当时毗卢寺后面有一部分地产,有几家一直为产权

中共代表团办事处 选定梅园新村经过



● 王德裕 施善革

在打官司,争执不下,由敌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出面调停,案未结却事了,也不知怎的竟成了敌伪南京市长周学昌所属,建成别墅式小洋房,原房主自然不服,为产权事又向地政局申诉,但抗战胜利后已列为敌伪产业,便未予受理。此时,地政局局长周一葵作中人,让民盟的张君迈出面统买下来给地政局,再由地政局过户给中国地产公司。只因建房无规划,建房地产业主又几度更换,房子盖好了却没什么赚头,中国地产公司又将原契交还地政局。地政局核对过户后,始由

展阅东南文化学术成果

《东南文化》简介

《东南文化》是一份综合性的大型学术刊物,以登载中国东南地区古代和近现代文化史研究成果为主,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

主要栏目有:文化史学理论、长江历史文化研究、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历史学、宗教、工艺美术史、建筑文化、吴越文化、民族与民俗学、方志学、区域史研究、博物馆学、博物馆藏品介绍与研究、石刻学、学人与学派、中外文化交流、文物保护新技术,以及有关的书评、学术动态报道等,尤注重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的发表。内有图版插图,具有资料性、学术性和知识性。1985年创刊以来,深受学术界人士的好评。

本刊为双月刊,逢双月出版。由南京博物院主办,《东南文化》杂志社编辑、出版发行。国内订价每期3.70元,外加邮挂费2.00元,全年订费28.00元(含邮资)。国外订价每期5美元(含邮费)。地址:南京中山东路321号。电话:645349,邮政编码:210016。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卓衡之经手向上级有关部门呈报,先拨三幢给中共代表团作办事处用。后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又陆续分派一批房子给励志社、九三学社、新生社、民盟等各民主党派作办事处。因经济不敷,由有关主管的中央机构补贴建房款,各党派自理,未安排到房子的,由中央党部拨款补贴各党派自选他地建房或购房。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以雷震为首的右翼青年党办事处恰好被“分派”在紧靠中央代表团驻地的右侧。

梅园新村 17 号、30 号、30 号后身以及后来通过廖承志姐姐廖梦醒联系、由中央代表团出资购买的 35 号这几幢房屋,是在原毗卢寺后园及附近一座小尼姑庵庵址上新建起来的,尼姑及佛像后来迁到长乐路去了。王树桀他们商定后,马超俊市长便约南京市国民党党部主任、行政上任驻宁参事的杨克天等四人,分坐两辆小汽车去实地察看。那时的梅园新村只是一片刚竣工的新住宅区,既无成章的绿化,又无正规的柏油马路与人行道,只在 17 号边上有过一棵圆锥形的黄杨树和几株高矮不一的杂牌树,当时电线杆也只有一根,若要作为办公之地,尚须再竖几根电线杆。周、张局长推荐的 17 号、30 号、30 号后身几幢房屋恰好尚未安排其它单位或私人住用,加上该处紧靠长江路国民政府又近。马超俊市长等人同意了这个选址方案。还亲自交给陈祖平一个正式签呈,原文系用毛笔在竖红行格宣纸上写:

着 钮寒冰 王树桀办理
知 杨克天

马超俊(签名)

随后,王树桀、钮寒冰手持马市长批文,到长江路 292 号国民政府,找到侍从高参刘汝曾上将(后为十五军军长),由刘汝曾进内室转呈国民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批了一下“可”,并正式加盖了“蒋中正”的大印。后由国民政府转发市政府,市政府再呈递给地政局、工务局备案。全部手续办妥后,马市长与杨克天向中央党部作了汇报,得到了同意和认可,中央党部还指示:要加紧筹备。于是,秘书长陈祖平立即布置工务局和电力公司铺建煤屑路,接通三幢房子电源。因当时国民政府刚还都,还没有专司绿化的机构,陈祖平便以市政府名义令中山陵园管理处送些树和花卉。梅园新村 30 号院内的两棵翠柏、四棵石榴、一棵葡萄、铁树海棠、紫玉兰、桂花、腊梅、白色蔷薇大多是从中山陵园移来的。但外围条件很差,道路是煤渣铺的,化粪池极简陋,一下暴雨,粪便就漫溢出来。

四月份,王树桀与钮寒冰抽调了十几个人到梅园新村打扫这几幢房屋,装配玻璃;设置门锁;办理接通水源,安装水表,申请安装电话、购置家具等。在

安装 17 号楼下右侧第一间(外事组)的电话时,他建议应安在屋后角,但却遭到军统头子滕杰派来的喽罗的呵斥,并强行叫电工安在紧靠门边的床头柜上,为此,钮先生还和他们争吵了。钮让王树桀去问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那伙人趾高气扬地用大姆指朝西头一指:“是隔壁的,怎么样?”政治上颇为敏感的钮寒冰一听就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戴笠、滕杰手下的人。所谓“隔壁”,是指军统办公处,幸好中共代表团有一位二十来岁的陆师傅懂得电工技术,在里边又装了个分机。待全部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军统局派来的人竟出面进行干涉,令钮寒冰、王树桀不许再过问其它事。后来眼看着军统局特务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硬塞进几只抽屉底下安了窃收电线的办公桌,也不敢过问。事后,滕杰手下的军统特务还居然写了黑材料告到市政府,说钮寒冰是共产党嫌疑。后来陈祖平好言相劝,钮寒冰只得主动辞职,设法通过姑夫戴季陶调到民航局戴安国(戴之子,钮的侄女婿)那儿任专员去了。此后,军统局的特务们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周围所搞的各种名堂就无从知晓了。中共代表团驻地便处在军统局的直接“管理”之下,由军统局二处、三处派了专门的小组和中央党部的人一起,在紧靠周恩来办公室的邻近楼房内“办公”(即梅园新村 31 号),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严密的监视。钮寒冰偶然去过一次,见那房间里安放了电话,和一套沙发及多把椅子,并不见卧具。经常在那里值班的是一个高个子的漂亮、时髦会抽烟的女人。有了这个“小组”,梅园的气氛就显得异常紧张,为此,周恩来、董必武很不高兴。而他们却借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董的安全。蒋介石还再三明令,绝不容许任何国民党将军军官穿军服在梅园一带出入,所以到梅园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必须换上便衣。

钮先生还告诉我们,他永远不会忘记 1946 年 5 月初的一个下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中共代表团从浦口和上海分两批而来。先行到达梅园新村的董必武与龙飞虎(周恩来的警卫副官),笑容可掬地与在场的人员一一握手,《新民报》记者为董必武和钮寒冰拍了一张合影,钮寒冰又借用《大公报》记者唐宁的照相机为龙飞虎与王树桀合摄了一张,那天人很多,大都不认识,只认识首都警察厅交际科科长郑良才(郑介民弟)。这两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钮与王曾长期珍贵地保存,可惜后来毁于“文革”。动乱期间所幸钮寒冰先生仍健在,成为中共代表团办公处选定梅园新村地址这一段历史的唯一见证人。据说其间也有人推荐过颐和路 23 号,由于房间少,地方狭小而被否决。从此,梅园新村 17 号、30 号、30 号后身这几幢办事处旧址,随着中共代表团的丰功伟绩而永载史册。(责任编辑 淑玉)

三十年代南京的人力车行

● 许自强

人力车，俗称“黄包车”。我国在清朝光绪年间就有人力车，那就是慈禧太后坐的一辆铁皮车（这部车现陈列在北京颐和园内），这是中国最早的一辆人力车。叫它铁皮车，是因为车轮子还没有安装胶皮里外胎，两个轱辘是用铁皮制成的。这部车子是用黄色油漆漆成，垫子是黄龙缎子做的，所以又叫做“黄包车”。以后逐渐传到民间，形状大致相同，一般都是黑色或是棕色的。早年在日本也有这种车子，故又有“东洋车”和“洋车”之称。在民国初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南京盛行这种靠人力来拉的交通工具，所以通称“人力车”。

早在三十年代南京多有经营出租人力车为业的，多则几十辆，少则三、五辆。也有少数自己购车子自己拉的。南京城南、城北都有人力车行。

凡是拉车的人向车行老板租赁车子，必须要有中人、保人，否则就要付出一笔相当数目的现金，叫做“押板”。待以后还车时，取回押板。租车的班次，一般分早班和晚班。早班上午四、五点钟到下午一、两点钟交班。晚班下午一、两点钟到夜里十二点钟左右。每辆车子每天给车主的租金，要视车子的设备和成色而定，大约四、五角钱。并在租车时，双方言明交付车租的时间。一般都是当天随车子交班时付给，也有的三、五天交一次租钱。

当时的南京城，交通工具很少，而人力车却很多。因此，街头巷尾均有人力车停靠，等待顾客使唤。拉车的人，惯称“车夫”。雇车的人，将所要去的地点讲明，当面谈妥车费，如有携带行李或其他笨重物件，则需酌加车费。

拉车的人每天劳动所得，除了交付车租外，所剩无几。家中妻子儿女，衣食难周。无论严冬或盛夏，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破烂不堪，吃的是少油无盐的粗茶淡饭，住的是难御风寒的破草房。为了活命，尽管冰天雪地，北风刺骨，只得拼命拉车；到了三伏炎夏，骄阳似火，汗水淋漓，依然“跑断腿，拉弯了腰”地挣扎在马路上。一天下来，口干舌燥，筋疲力尽，难以名状。老舍先生的《在烈日和暴雨下》一文，就是对拉车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可是，在旧社会里，一般的穷苦人是坐不起车

的。而坐车的人，大都是有钱有势的阔少、阔老、小姐、太太们，他们哪里会知道拉车人的艰辛滋味！

大凡经营出租人力车的老板，多半是殷实富商，或者是帮会头目，他们与官方的爪牙有往来，否则也会被地痞流氓敲诈勒索。据知，三十年代初，南京三条巷有个姓王的人力车行老板，他就是安清帮头目，手下门徒众多。这位王老板，仗着这些门徒的势力，耀武扬威，飞扬跋扈。有一次，他家车行的修理工（当时惯称铜匠），将一副人力车的里外胎，偷出卖给了丁老板。本来丁老板不想买，可这个修理工苦苦哀求，说好说歹请帮个忙，最后才将车胎买下。可是事隔不久，王家老板发现自家的车胎少了一副。经再三追查，知道是修理工偷的。在其逼问下，最后这个修理工说出是卖给明瓦廊丁老板的。王老板听了勃然大怒，于是带了一伙人，蜂拥来到丁家车行，将丁老板毒打一顿不算，又买通侦缉队（便衣队），把丁老板带到队里关押两天。丁老板被逼承认买赃不对。不但将赃物（车胎一副）原封退回，还在酒馆里摆了两桌酒席，向王老板赔礼道歉，才算了事。那个年头，要开办人力车行，没有一点靠山和势力，是站不住脚的。打这以后，丁老板为了维持自己的车行，也托人介绍参加安清帮会，拜在“穆老太太”的门下为徒。

另外车行还要向主管部门送礼。当时由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工务局主管人力车的登记、颁发车辆执照。每年要换发一次车辆牌照，还要进行车辆检验。如果不送礼、不请客，检车时就横加留难、挑剔，不是说车辆设备不齐全，就是说车辆的质量有问题，不予发给执照。如果领不到车辆执照，就不能营业。于是，车行老板四出奔走寻找“门路”，请客、送礼，才能领到车照。

抗日战争前，规定人力车夫上街拉车，一定要穿上统一的“号衣”。这种“号衣”由工务局制做出售，号衣上印有号码，“号衣”由车行老板负担。为了人力车行能安生立业，车行老板还要向所在的警察分驻所巡官和警察老爷送礼，不然的话，就会不时有人上门找麻烦。总的说来这碗饭是不好吃的。

（责任编辑 霁 明）

蓬勃生机的玄武区市政管理所

● 玄武区市政工程管理所

南京市玄武区市政工程管理所成立于1958年，系全民事业单位，现有职工194人。负责全区90公里道路、91公里下水道和11公里河道等公用设施的维护和管理。拥有固定资产234万元，居南京市各区同行业之首。

这个单位成立时，职工仅有19人，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劳动工具也十分原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实行“改革”以后，无论是在内部管理还是施工能力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经济实力、管理水平和职工福利在全市同行业中都位居前茅。单位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完全是“改革”带来的，以前连一幢宿舍都没有，自1985年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以来，经济效益逐年好转，新建了4幢职工宿舍楼、近百套住房，职工的住房问题基本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给企事业单位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我所1985年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以后，1987年又遵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精神，实行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执行上级规定的“经费包干”，超支不补，增收节支分成”为原则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执行浮动工资（全所月平均工资的20%）与奖金捆在一起的二次分配、按劳动实绩考核定奖制，有奖有罚，大大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消除“大锅饭”，使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得以充分体现。我所还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制定一套与经济承包责任制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形成了行政、业务、施工三个体系，这就是被称之为“三股两室五个队”的职能部门，它们既是独立的工作部门，又是一个完整的团结的整体。每个股室都有工作职责范围，每个管理人员都有岗位责任，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协调，相互配合，理顺了工作程序，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玄武区市政所做为事业单位每年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市政公用局下达的全年各项公用设施的养护指标，任务很大，经费又紧，这一对矛盾是市政养护部门的一大特征，每年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正常养护经

费的缺额较大。我所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同时，合理组织劳力，承接专项工程和代办工程，扩大社会效益，增加经济效益，每年的创收节余除弥补正常经费的不足，更多地是用来扩大再生产、添置设备和职工福利，对扩大社会效益、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和为职工谋福利方面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据统计，我所自1987年实行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以来，承接代办工程、专项工程近500项，共整修道路（含人行道）12.14万平方米，新建、翻建下水道7.5公里，河道护砌驳岸近2公里（单侧），完成工作量772万元，创利257万元。几年中我所利用发展基金购置东风等自卸车4辆，十吨红岩自卸车一辆，沥青喷布车2辆，高压射水车、真空吸污车和道路铣刨机各1辆，新建职工宿舍楼4幢，此外还用发展基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改善社会环境，体现市政建设为社会生产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为扩大社会效益做出了积极贡献。

玄武区市政所之所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社会效益，这不仅与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承包方案有关，同时与一个互相团结，相互支持和配合好的领导班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几年的承包中，我所确立了所长的中心地位，党支部、工会尽自己的职责和力量，起到监督保证作用，行政和党支部既实行党政分工，各行其职，又很好地做到相互合作、支持、分工不分家，重大决策和事情处理都相互商量、通气，取得一致，使得我所始终有一个坚持原则、团结合作的领导班子，对带领全体职工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起到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他们经常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分析、研究落实完成各项任务的具体措施，按时按计划检查任务完成情况。所领导和所改革小组紧紧抓好承包方案、任务落实和各股队二次分配情况，做到既有中心领导，又权力下放，调动了各股队职工的积极性，既保证了目标任务的完成，又做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合理分配。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力争做出新成绩、新贡献。

（责任编辑 吴纪坤）



新型建材 方兴未艾

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 陈雷

新型建筑材料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率先研制的,用于墙体、装饰装修、防水防火、隔热保温等方面的新材料。由于它具有轻质、高强、美观、多功能等特点,很快在全世界推广应用。它的崛起和发展,不但使建材工业发生变革,而且推动了建筑业的技术进步,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居住环境提供了物质条件。我国的新型建材应用开发从七十年代起步,至1980年1月,中国新型建材公司在北京成立。由于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一再指示要重视推广使用新型建材,因而这项工作进展很快。

中国新型建材公司南京分公司成立于1985年8月2日。在市领导的关怀和市建材工业公司、中国新型建材公司的直接领导与具体指导下,经过六年的时间,尤其是近两年的开拓前进,已从一个经营性公司发展成为集科研、生产、贸易、工程、新材房屋开发为一体的实业公司。成为北京新型建材总厂、北京新材制品总厂、杭州西湖壁纸厂、上海平板玻璃厂、苏州新型建筑涂料厂、六合纤维水泥板厂、江苏泗阳人造板厂、呼和浩特市机床附件厂等新型建材生产厂的华东地区和南京市的经销总代理、总经销和特约经销单位。两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完善管理体制,拓宽业务范围,引入竞争机制,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明确指导思想,拓宽业务范围

1989年3月,分公司的领导班子充实调整后,认真总结了前几年经营方向不明,管理不善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确立了以推广应用新型建材为主导,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大胆开拓,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和以新材房屋开发为龙头,建立新材基地为基础,配套经营为方向,装饰工程为依托的多层次、多功能服务的方针,进一步加强了经营销售工作。主动走出去进行市场调查,了解用户需要,把握市场行情。并采用新闻发布会、产销座谈会、业务洽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新型建材的推销活动,改变过去坐等用户上门的状况。因而在1985、1986两年基本持平,和1988年严重亏损的情况下,1989年一举扭亏为盈。几年来,销售额以年平均113.33%的速度递增。

至去年,销售额已是1986年的12.9倍。与此同时,又不断扩大经营品种,拓宽业务范围。1990年上半年在原爱国建筑设计事务所和新材设计室基础上成立了全市第一家新型建材设计所,目前已设计出第一套新型建筑体系,为开发、应用新型建材创造了技术条件。1989年下半年成立的机电产品供应站,1990年提前4个月,超额42%,完成效益指标,并连续2年成为全公司经济效益最好的部门。1990年11月,着手进行新型建材房屋开发。经批准第一期开发2万多平方米,不久将推出我市第一批新功能、新结构、新布局、新材料,冬夏二季室温比一般住宅高或低3~4℃,地处南京江边风景区附近的住宅,为我市推广应用新型建材,迈出可喜的一步。

二、完善管理体制,明确工作重点

两年来,我们从适应扩大业务范围和加强企业管理的需要出发,先后成立了房屋建设开发部、计划部、咨询部和物资部。修改、制订了规章制度,加强了管理,较好地拓展了业务范围,增加了经营服务内容,控制了资金流向,提高了资金利用率,形成了合理的物资储备,缓解了仓储矛盾。同时经市建材工业公司及有关部门批准,兼并了第二建筑材料厂。这个原来利用“三废”生产建筑材料的工厂,将在进行新材房屋开发的基础上,积极开发保温管套、乳胶、墙布胶、地板胶等新型建材产品。在大胆开拓,稳步前进中,逐步把公司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型建材房屋开发上来。

三、引入竞争机制,发挥人才作用

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先后调进了一批勇于开拓的干部,注意在本企业培养人才,调整充实中层干部队伍,形成了一支骨干力量。同时在企业内部实行经营抵押承包责任制,把公司的经济效益与各部门局部利益和职工个人收入联系起来,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内部,从而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职工中不辞辛劳,不畏寒暑,连续奋战的动人事迹不断涌现,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各经营承包单位,经过开拓市场,努力工作,都做到了自盈并上缴公司利润。我公司将在未来的竞争中求得更快地发展。



南京六朝墓葬的分布及特点

● 华国荣

在几千年的南京发展史中,六朝历史堪称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史。从三国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从武昌迁都建业城,开创了南京帝王之都的历史,以后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相继定都南京,世称“六朝古都”。近四个世纪的六朝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墓葬遗产,为我们研究南京六朝的社会各方面情况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资料。

我国古代人们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是绝然分开的。六朝时期这种现象也不例外,当时豪强贵族,还普遍盛行“聚族而葬”的制度,出现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家族墓地。据《建康实录》、《资治通鉴》、《景定建康志》等史籍的记载和一些著名学者的考证,建康城的范围,大体相当于现今南京城中部偏北一带,即以北极阁、鸡鸣寺一带为北端的周长“二十里一十九步”的方形范围内,考古工作者曾在鸡鸣寺发现过属于六朝时期的城墙遗迹。而在这一城区范围内,至今没有发现墓葬存在。从而证明了六朝墓葬也都分布在居住生活区以外的周围地区。

南京城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宁镇丘陵地区,长江天水从其西侧蜿蜒北上东流,北面有异常密集的低山群分布,大小山脉达十余处。如郭家山、北岗山、老虎山、狮子山、象山、幕府山、栖霞山等等。东面有紫金山、灵山、龙王山、孔山、青龙山等作为天然屏障。南面有韩武山、牛首山、祖堂山、方山等。南京城就座落在这种三面倚山,一面傍水的绝好地势之中。

六朝时期,人们非常推崇占卜问卦、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思想。反映在埋葬习俗上,尤其重视风水宝地等说法,为了使自己在升入天堂后仍能享受人间的生活,往往都选择地势较高的山包、土岗作为葬身之地。同时,迄今为止,南京发现的六朝墓葬近98%左右都是用砖砌成的券顶室墓葬。人们通常在山坡上开挖墓坑,用多种规格的长方形青砖砌成墓室。规模大小以墓主人身份等级不同而不同,墓室形状多样,主要有长方形和“凸”字形等,顶部成券顶状,底部均铺地砖。墓中有排水沟、棺床等防水设施;有壁龛、直棂假窗、灯台等模拟照明的设置;有砖门、石门,“祭台”及瓷器、陶器、铜器、玉、石器、金银器等多种陪葬品,整座墓室俨然似一处居家安歇之所。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和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发现南京地区的六朝墓葬主要集中在北面和南面这二大区域内。南京西部区域,即长江沿岸地区至今极少发现有六朝墓葬存在。这同当时长江的水位变迁是分不开的,这一带是一片冲积平原地带,在地质上属于侵蚀堆积阶地。在崇尚“亡后如昔”的六朝时期,人们当然不会选择这种易动的沙质地区来作为升天后的永久极乐之地。南京城的东面,由于巍巍钟山等群山障碍的存在,这一带的六朝墓葬也相对较少。

以下我们对六朝墓葬的分布范围及其特点按现今行政区分述于下:

栖霞区:是现今发现六朝墓葬最多的地区。该区低山、丘陵、土岗密布,倚山傍水,地理环境十分优越,是六朝墓葬理想的所在地。在南京市博物馆发掘的240余座六朝墓中,该区就有120余座。以东晋、南朝墓葬居多,其次是西晋和东吴墓。在这区中,根据墓葬的分布密集程度及特点大体可以分成东、西二小区。西小区墓葬主要集中在幕府山、郭家山、象山、老虎山三角地带。以东晋时期豪强大族王氏、颜氏家族墓地为代表。这类墓葬规模较大,择地排列、砌室等十分考究,随葬品数量较多,种类齐全,且非常精致。如在象山发掘的东晋豪强王彬家族墓,其中有王兴之、王闳之、王丹虎、夏金虎等墓,出土了相当一批精致的瓷器及一批书法、历史价值极高的砖墓志。

又如老虎山发掘的东晋大族颜含家族墓,其中有颜谦妇、颜琳、颜约、颜镇之等墓。出土了几方重要的六朝铜印及一批珍贵的陶、瓷器,与此同时,在幕府山、郭家山、北崑山等地都发掘了一批相对集中的墓葬群,其内涵基本相同,等级较高,显然都是贵族之墓地。从而证明了这一三角地带是东晋时期世家大族的主要集葬地之一。东小区主要包括迈皋桥、吉祥庵、燕子矶、尧化门到栖霞山这一片范围内。这区内最重要的墓葬是甘家巷一带南朝梁代王室成员陵墓群,有:梁安成王萧秀墓,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梁吴平忠侯萧景墓,梁鄱阳忠烈王萧恢墓等等。同时还有经过发掘的梁桂阳王萧融夫妻合葬墓及其子萧象墓等。除了这些等级较高的皇室成员墓群外,在尧化门到甘家巷,六朝墓葬的密集程度是南京周围地区少见的,其中以南朝墓葬居多,证明栖霞一带是六朝重要墓地之一。

雨花区是南京六朝墓第二集中地区,共发现 80 余座,以西晋、东晋墓最多,主要集中在邓府山、铁心桥、油坊桥、西善桥等一些地区。发现了几处重要的豪强家族、贵族墓地及一般平民丛葬地。一是在铁心桥乡大定坊和中华门外戚家山发现的东晋豪族谢氏家族墓地,有谢球、谢琬、谢温、谢鲲墓等。东晋时期,王、谢二家是最负盛名的勋贵世家,他们家族的墓地在南京北郊和南郊相继发现,是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墓中出土的多方砖墓志为研究当时谢、王二家的婚姻关系及社会政治、军事、书法艺术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西善桥、油坊桥这地带六朝墓葬也比较集中,其中重要的是发现了几座南朝时期的画像砖墓。这类墓葬都用多种形式的花纹砖和画像砖砌成,主要是各种莲花、忍冬纹图案,佛教色彩极浓,还有神兽及多类人像。各类图案均模印而成。墓室富丽堂皇,气派非凡,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因此,这一带极有可能是南朝贵族的又一集葬地。特别是 1960 年发掘的西善桥南朝大墓中发现的墓壁镶嵌成“竹林七贤”(即六朝时期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山涛、向秀、王戎等七人)及春秋时期“荣启期”人物的大型壁画,塑造了一幅六朝文人士大夫飘逸洒脱、饮酒取乐的生活场面。它以其巧妙的构思,高超的技艺,逼真生动的形象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堪称罕世珍品。三是在邓府山、石子岗一线的地区六朝墓葬的分布密集程度也是南京地区

少见的。《三国志·吴志》记载:“建邺城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岗,葬者依焉。”说明这一带很早就是死人下葬之地。其墓葬特点是时代跨度较大,从东吴到南朝各期都有,以中、小型墓居多,结构简单,分布凌乱,等级较低,应是六朝下级官吏及平民百姓的墓葬区。

除了栖霞、雨花二区以外,在南京城东部及江宁县境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六朝墓存在。其中重要的是现今城东部的东晋帝陵区。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可知,今鸡鸣寺以南,鼓楼岗南麓是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所在;今钟山以南,是东晋康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恭帝五陵所在。这一地区目前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工作。但根据众多史料记载及南京大学校园、富贵山等地的零星发现,可以证明从鸡鸣寺到富贵山一线地区是东晋的皇陵区所在地。

江宁县:六朝墓葬比较分散,共发现 12 座。重要的有麒麟门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上坊镇梁建安侯萧正立墓及淳化镇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等南朝皇室陵墓。在殷巷、东善桥等地方也有较完整的六朝墓分布。

大厂、浦口、江浦三区县仅有零星的六朝墓分布。

六合、溧水、高淳三县至今无六朝墓葬发现。

经过归纳,在已经发掘的六朝墓中,东晋墓数量最多,共 93 座左右,占总数的约 38.3%,其次是南朝墓,占 27.5%,西晋墓和东吴墓分别占 21.3% 和 12.7%,这中间各时期数量的变化和当时社会政治情况及南京城的发展是相吻合的。六朝时期,东吴政权比较脆弱,国力不强,其主要墓葬分布在湖北武昌,即现今鄂州一带,在南京只是一小部分,西晋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而南京城从东吴建都开始,到东晋建康城,它的发展才达到了顶峰,政治稳定、商业繁荣,反映在墓葬遗存中数量最多,且等级较高的墓很多,更重要的是东晋十一个帝陵基本都分布在建康城的周围。

六朝历史是南京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六朝墓葬是古都南京的一大特色,它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为研究南京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责任编辑 庄淑玉)

南京营造业和“四大金刚”

● 刘 凡

近代南京的建筑施工行业(当时称之为营造业),是发展较快而又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一个新兴行业。

一、南京营造业的兴起

自从清同治年间英、法等商人在南京开设的协隆、隆泰、谈海等洋行开办营造厂,承建西洋式建筑,以及美商上海慎昌洋行在南京设立分行,独家经营水、电和卫生设施安装工程起,南京的营造业就开始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那时,设计、施工统由洋行包揽。先由洋行打样画图,造出预算,造价谈妥后再由洋行出面召募中国工匠,在外国技师和监工的指导、监督下营造。清光绪二十一年(1897),南京有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陈明记营造厂。这家营造厂,是由一个接受西方文化较早的基督教徒,名叫陈明的商人创办的。它的出现,虽比川沙工匠杨斯盛于1880年在上海开办中国第一家华商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清史稿·杨斯盛传》)晚17年,但从此结束了洋人垄断南京营造业的历史。清末时,南京已有营造厂10余家,和专门搭建临时性建筑与施工脚手架的搭棚户8家以及从事内部建筑装饰工程的油漆作10家。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西洋式建筑逐渐增多,近代城市建设事业开始兴办,营造业发展很快。至二十年代初,南京的营造业(包括营造厂、水电行、搭棚社、油漆作)发展到113家。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大兴土木,进行首都建设,营造业应运而兴,上海等地的营造厂纷纷来宁承包建筑工程。1935年,全市登记注册的营造厂达480家,“为京市工厂家数之最者”(《首都志·食货下》)。其中:甲等(资本在5万元以上)63家,乙等(资本万元以上)79家,丙等(资本2000元以上)186家,丁等(资本200元以上)152家。此外还有兼营或专营的水电行60多家,搭棚社11家,油漆作44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大营造厂陆续迁往内地,中、小营造厂纷纷停业,营造业一度凋零。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重建家园,营造业劫后复兴。1946年3月,南京市营造业同业公会成立,选举馥记营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陶桂林为会长。翌年出版定期刊物《营造旬刊》,向全国发行。至1948年上半年,全市营造业已从1947年的635家猛增到1159家。其中:营造厂813家,水电行

91家,搭棚社54家,油漆作201家(《南京市营造业同业公会会员录》)。

这些营造厂,大都没有固定的施工队伍,仅有经理(多由厂主兼任)、技师、翻样、关阙(施工技术人员)、监工、帐房等几个或十几个固定员工。施工实行层层发包,由大包、二包……直到小包头。瓦木匠由小包头临时召集,一般每日在茶馆内接头,夫子庙的奇芳阁就曾经是城南营造业的聚会场所。工程结束各奔东西,仍天天到茶馆听候召集。营造厂主管理施工一般在晚上,把监工、关阙、包工头召集在一起“共进晚餐”,当场拍板,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和安排下一步工作。建筑工程的承包,大多采用招标方式,先由造房单位委托建筑师设计出图纸,再登报公开招标,营造厂在报名投标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和手续费后,领取设计图纸,编出预算,造好标书投上,等待开标。招标分硬标和软标两种,硬标是按最低报价中标,软标则由造房主和建筑师在全面考察营造厂的资金、技术、信誉后再决定由谁中标。内中也有黑幕,如1936年南京金城银行大厦在上海登报招标,投标的有十几家营造厂。8月6日宣布开标结果,依标书报价由低到高为顺序,前七名的造价从40.46万元到45万元不等,均未中标。中标的却是造价45.52万元的第八名申泰营造厂。原因是申泰与金融界人士关系密切,又曾经造过上海金城银行大厦。为此引起轩然大波,营造业联合致函金城银行,要其公开说明原委,金城银行不得不请出著名建筑师陆谦受出面解释、调停,风波才告平息。

二、营造业的“四大金刚”

解放前南京大小几百家营造厂中,最有名的是陈明记、新金记(康号)、陶馥记、陆根记4家营造厂,人们称之为南京营造业的“四大金刚”。他们中间,以陶馥记为最大。而能够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受到赏识、信任,大发其财的则要数陆根记营造厂。这里面有许多内幕传闻,鲜为人知。下面不妨将“四大金刚”逐一加以介绍。

陈明记:1897年2月,由浙江鄞县人陈明创办,是本市首家华商开办的营造厂。厂址在莫愁路87号。1933年由陈明之子陈裕华、陈裕康经营。担任总经理兼技师的是当时年仅31岁的陈裕华,他毕

业于金陵大学,获文理学士学位,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在美国期间,曾担任以利诺大学建筑工程师。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和之江大学建筑土木教授。1927年前,陈明记是南京最大的营造厂,早期的学校、教堂、医院等建筑,大都出自陈明记之手。例如汉中路礼拜堂、下关圣公会礼拜堂、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神学院、明德女子中学、中华女子中学的校舍和马林医院(今鼓楼医院)全部工程以及宝兴、宝庆银楼都是他建造的。

新金记(康号):1919年创办于上海。厂主康金宝,本是姚新记营造厂(全国著名包工,南京的南洋劝业会、中山陵主体工程、和记洋行大厦的建造者)的一个小包头。自己开办营造厂后,因建成上海江湾跑马厅而崭露头角。1927年10月,中山陵第二部工程在上海招标时,他以最低造价中标。随即组织人马来宁,于11月开工。由于承包的大部是土石方工程,康金宝又是泥水匠出身,施工经验丰富。因而工程进展十分顺利,在姚新记承包第一部工程亏损14万两纹银的情况下,他还赚了几万两。初战告捷不但使新金记(康号)在全国营造界名声大振,而且从此在南京站住脚跟。此后新金记(康号)在南京承建了诸如国民会议堂(原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大礼堂)、小红山官邸(今称美龄宫)、杨公井国民大戏院(今人民剧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和一批官僚住宅等较有名的建筑工程。

陶馥记:1923年由木工出身的启东人陶桂林创办。本是上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营造厂。1929年8月来宁承建中山陵第三部工程,5年中先后承建了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和号称远东第一高楼的上海国际饭店大厦三大著名建筑工程,从此成为饮誉全国的营造厂。办公地点设于南京中山东路76号,后在中山东路48号建造了馥记大楼(今新华通讯社江苏分社)作为高级职员宿舍。在中山北路20号建造了馥记大厦(今鼓楼百货商店)作为办公地点。还在上海、广州、汉口、贵阳、昆明等地设有事务所。抗战中迁往重庆,1943年改名馥记营造股份有限公司,陶桂林任总经理。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曾邀请陶先生出席全国工商界名流座谈会。胜利后陶桂林当选为全国营造业同业公会会长。陶馥记在南京承建的工程很多,其中著名建筑有:阵亡将士公墓(灵谷寺内)、中山陵音乐台、谭延闿墓、励志社(今中山东路307号)、国民党党史陈列馆(今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考试院(今市政府大院)、监察院(今中山东路313号)、孙科公馆(中山陵园区内延晖馆)、

宋子文公馆(北极阁)、福昌饭店(今胜利饭店)、美军顾问团公寓(今华东饭店AB大楼)、美国驻华大使馆(今西康路33号)等。1948年陶桂林离开南京去台湾,后在美国定居。

陆根记:厂主陆根泉,是上海浦东二林塘人,泥水匠出身,当过小包头和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1932年,时年29岁的陆根泉在别人帮助下,亮出了陆根记营造厂的招牌,不久因承包百乐门舞厅在上海滩小有名气。1934年,他结识了当时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的褚民谊。在褚的帮助下,于翌年8月来南京承建中央美术陈列馆(今长江路江苏美术馆)、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两项工程总造价为76万余元,外加赶工奖金3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他在工程完工捞足油水后,又委托律师登报声明。大意是:因承包国民大会堂工程亏损甚巨,本人已经破产,所欠债务,只有变卖财产抵偿。由于资不抵债,只能按欠款比例分摊,云云。他本人在卖掉汽车,辞退职员后“失踪”,实际上已跑到南昌继续承包建筑工程。此举坑害了不少建筑材料商,有的甚至被害得家破人亡。当时政府对此不但加追究,反而称赞陆根记为政府承建国民大会堂不惜工本。内中当然有其原因,原来这个善于钻营的陆根泉,来宁后不但肯赔工亏料为褚民谊建造了住宅,而且先后为汪精卫、张学良、吴稚晖、钱大钧、戴笠等人精心营造公馆、别墅,为此得到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赏识。抗战时期陆根泉在重庆又巴结上戴笠、毛人凤、郑介民等特务头子,为军统建造了如松林坡蒋介石的防空洞、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居住的“梅园”、专门招待外国特务的神仙洞招待所以及中美合作所刑事实验室和武器弹药库等秘密工程。陆根泉也被任命为军统保密局少将工程顾问。日本投降后,他作为接收大员乘军用飞机飞回南京,接收沪宁等地的敌伪财产,大发国难财。此后军统在宁建造的工程,如洪公祠军统总部办公大楼(今南京市公安局)、丰富路、灵隐路等地的军统办公处,和平门军统局无线电台,都由他一手包揽。他还为郑介民在武夷路建造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公馆。国民政府批准用7亿元建造戴笠墓,他花掉27亿元,超支部分全部由自己掏腰包,以此表示对戴感恩戴德。十余年中,他从一个泥水匠爬到军统少将的宝座。1947年底,他到了上海,又博得汤恩伯赏识,委任为陆军总司令部营房筹建委员会中将顾问,建造碉堡,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大上海,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1949年5月逃离大陆。1988年,年已85岁的陆根泉在台北结束了他的一生。

(责任编辑 霁 明)

《南京史志》1991 年总目录

题 目	作者 总页码	题 目	作者 总页码
神州风云		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专栏	
回忆解放初参加接管南京	宋任穷 4	八路军代表叶剑英	陈广相 246
炮击金门的前前后后	苗青 14	董必武在梅园新村	曾向东 240
四十年来外国首脑访华录(1)	郑永喜 蒋永才 22	从西山会议派的一员到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许荏华 238
冯玉祥屯兵浦口前后	张连红 12	毛主席关心警卫战士	华金毛 237
美军飞行员脱险记	张衡 吴雪晴 136	方志敏早期在南京的活动	陈家鹤 243
四十年来外国首脑访华录(2)	郑永喜 蒋永才 252	论太平天国运动专栏	
多铎南下风云录	史明星 264	辛亥革命南京城光复纪事	吴雪晴 严华 240
四十年来外国首脑访华录(3)	郑永喜 蒋永才 322	黄兴举兵讨袁经过	陈谦平 294
南京市抗洪抢险实录	曾向东 战学军 356	南京临时政府执政始末	崔之清 胡臣友 297
四十年来外国首脑访华录(4)	郑永喜 蒋永才 388	北伐军攻克南京与帝国主义制造的“南京惨案”	方庆秋 301
汪伪警卫三师起义前后	范长琛 383	孙中山结识蔡公时	王宪章 303
人物春秋		宋庆龄关注叶恭绰	胡明华 305
奋斗不息的女科学家韦钰	闵卓 28	张学良倡导士兵识字教育	沙兰芳 306
朱明瑛“回娘家”	青雨 37	风云都督孙毓筠	王炳毅 308
江南汽车公司总经理吴琢之	施顺福等 44	从南京赴义的黄花岗英烈阮德山	戴志恭 310
为全民抗战鼓与呼的冯玉祥	陈伟华 11	六朝史研究专栏	
邓演达南京殉难	季云飞 52	纪念太平天国运动 140 周年	孙家正 118
日报摄影着色工艺开创者杭松子	华金毛 72	纪念太平天国反侵略的伟大精神	罗尔纲 120
卖国女奸陈璧君	姜中秋 王光远 56	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中国近代传统的集中代表	茅家琦 122
不愿当皇后的徐妙锦	慧兰 62	太平天国的历史功绩	沈嘉荣 124
彭湃被捕及牺牲经过	程堂发 139	太平天国革命与毛泽东的思	经盛鸿 126
日伪高层机构中的红色谍报员	韩贤俊 312	想认识	余安民 116
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教授	董纯 317	南京举行太平天国运动 140 周年纪念会	臧筱春 121
第一位考察欧美的南京人李圭	经盛鸿 320	洪秀全得胜县得胜	益人摘 159
记左笔画家傅小石	董克信 359	洪秀全的后代可能逃到日本	徐健 128
左右逢源的大亚山堂主朱亚雄	程堂发 367	太平天国的图书机构	蒯伟 134
张际春中原军事生涯	王宗伯 高成林 371	太平天国的画匠与画工	
范鸿仙与南京光复	方晓 386	六朝史研究专栏	
张恨水金陵逸事	刘元 396	六朝军事史最新研究成果的交流	卞孝萱 149
华罗庚的启蒙老师	安士才 403	六朝南北战争性质论	周伟洲 150
端纳其人其事	季智洲 364	孙吴“保有江东”基本国策分析	简修炜 153
左宗棠在南京的治水活动	张其立 409	东吴军事思想述略	余大吉 156
寓居如意桥的程廷祚	凌昕 406	东晋南北朝中军补说	邱敏 160
近世南京一怪——汪士铎	陆霄鹏 375	赤壁之战拾遗	万绳楠 164
庆祝党诞辰 70 周年专栏		六朝水军与水战	钟立飞 168
一位流放西伯利亚的我党早期活动家	史平 金振之 226	东吴之舟师及作战特点	周兆望 172
周恩来屠刀下面救战友	吴雪晴 华永义 229	东晋末年建康攻守战	刘曼春 176
项英找党到南京	王辅一 232	后赵“浮海抄略”散论	张学锋 178
		“元嘉之治”及其北伐	王永平 180
		石头城的军事地位和六朝时期防御政策	罗宗真 186

题 目	作者 总页码	题 目	作者 总页码
战争频仍中的六朝江南城市	张 南 182	创造优美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王 风 279
东晋的两府及其战略地位	孙永如 198	为改善人民居住条件作新贡献	颜治平 278
刘宋政权的崛起与北府兵的 兴亡	杨在年 194	在改革中发展的鼓楼区房产经营公司	王稳战 280
宜兴周氏与六朝	叶聚森 188	前进中的鼓楼区绿化管理所	绿化所 281
古都研究		艰苦创业结硕果	戴 彬 陈蕊心 276
建康何处东府城	王少华 218	蓬勃发展的南京“三资”企业	梁学忠 王鲁宁 333
六朝古都建康的都城位置新探	[日]中村圭尔 373	南京同仁堂制药厂的创建与发展	唐富春 335
史海钩沉		第一医疗器材厂靠科技发展企业	宋汉平 336
我国政府在南海诸岛设灯标经过	李琴芳 70	注重旧城改造建设 配套设施 日益完善	陈恩富 337
国民党当局策划皖南事变内幕	钱建明 141	南京营造业和“四大金刚”	刘 凡 428
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抗暴斗争经过	夏 蓓 146	新型建材 方兴未艾	陈 雷 425
秦淮杂忆		蓬勃生机的玄武区市政管理所	管理所 424
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	周 红 66	消费者投诉纪实	叶 舟 380
史沫特莱笔下的南京	王庭岳 64	金陵文教	
于右任搜集王微遗文二三事	宋伯胤 84	华东军政大学的创办	钱家赵 203
建造邓演达烈士陵墓的回忆	麦保曾 54	江苏最大的县级儿童图书馆	王 宏 221
从叶浅予画展说起	潘子农 244	江南图书馆开馆日期辨误	王 玲 216
张宁远渡重洋嫁美国	[美]莫利亚 328	南京血防四十年	吴蔚庆 338
黄宗仰与栖霞寺	孙宅巍 332	原首都中央体育场	周 红 朱秀兰 340
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选定梅园 新村经过	王德裕 施善萍 421	周兴嗣妙著《千字文》	朱 明 414
中统特务是怎样监视中共代 表团的	一 发 379	聚珍书局始末	徐 苏 382
始创时的晓庄师范和冯玉祥	邵仲香 394	白下艺文	
初访冯玉祥	赵纯继 376	乾隆皇帝作《秦淮歌》	袁晓国 96
孙中山三临黄埔军校	冷春煦 392	青溪琴社	陶基富 98
朱德过宁属前后	扶 昌 387	夫子庙地区古今楹联	冯世治 99
对诺那呼图克图的几点补充说明	赵家璧 385	是是非非歌舞厅	叶 舟 季 石 206
南京经济		张大千与《韩熙载夜宴图》	王能伟 卢海鸣 200
南京建筑业十年改革成就	宋懋昌 78	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封家书	[日]阪仓笃秀 217
对建设宁六一级公路的回顾	于守常 孔庆禄 74	邵力子题字	邵黎黎 167
强化服务意识发挥联运优势	韩敬昕 76	曹雪芹金陵家庙考察记	严 中 285
南京客运分公司在竞争中发展	虞梅棠 77	首届中国曲艺节在南京举办	叶 雷 260
金陵金箔	李存寿 高 鹏 80	文天祥赋诗诀别金陵	于 江 419
南京天鹅绒毯	牧咏南 曾昭黔 82	方志研究	
从南京筹建地铁谈地铁	王天庆 108	重大政治运动应以集中记述为主	王能伟 86
新设是南京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开端	徐金元 196	教育志浅议	吴福林 110
利用有利自然条件发挥综合开发作用	戈仁泉 175	认真统稿 提高质量	殷东俊 90
南京医药工业的新星金陵制 药厂	孙 斌 朱 云 204	图表要突出地方性	刘君平 88
城市环境卫生的卫士	吴纪岫 丁尔辰 202	志稿要挤水分	周其高 85
南京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工作	沈富成 王宁宪 277	博采中觅宝 传统中创新	吴孝桐 许振民 190
		增设索引 方便利用	何晓宁 193
		群策群力 继承创新	杨鸿儒 270
		新方志编纂过程中需要注意 的几个问题	傅振伦 343

题 目	作者 总页码	题 目	作者 总页码
服务修志 办出特色	孔令士 345	稀见的青花萧何追韩信图梅瓶	葛玲玲 407
谈民谣民谚的入志问题	梁滨久 蔡华伟 342	南京六朝墓葬的分布及其特点	华国荣 426
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周其高 417	东晋史学家谢沈的六面铜印	李光斗 401
程嗣功与《万历应天府志》	王桂云 418	“辛亥革命”瓦檐	韶 华 398
争鸣园地		建康风情	
也谈曹操与三国	周正章 212	太平天国天京社会风俗	刘 斌 92
曹操当为何时人	蒋作初 213	太平天国的节日	严安林 蒯 伟 94
对《战斗在蒋介石专用电话机 旁的共产党员》一文的意见	电信局党史办 251	明代南京的茶馆	陶 恺 63
《西洲曲》之西洲在金陵	魏芝波 袁 亮 404	金陵绒花	牧咏南 377
也谈江南贡院的最后一次乡试	张铁宝 413	三十年代南京的人力车	许自强 423
三江揽胜		白门掌故	
南京第一公园	俞允尧 100	江南贡院的最后一次乡试	吕华清 37
诸暨重建西施殿	吴章林 51	夫子庙鸱头伏法记	程堂发 107
闲话陶风楼	杨云海 55	世界上最早的“飞车”	魏鹏翔 27
古邗沟寻踪	庄晓明 102	孙中山与复旦大学	张学恕 220
江海咽喉 崇川唇齿	许亚洲 105	用贖金创办图书馆	魏希德 185
石巢园、湘园与陶衡川	凌 昕 222	蒋介石在南京的几处别墅	季智洲 214
和平公园的“还都塔”	霁 明 224	汪精卫在南京的两处公馆	远 秋 135
世间奇绝的枯枝牡丹	杨志萍 171	抗战前南京举办过牲畜比赛会	王长喜 140
明孝陵神道石刻(上)	俞允尧 262	南京状元谱	吴国元 282
玄武湖畔的喇嘛庙和诺那塔	李 源 258	女老板开红色湘绣店	后文洙 288
昔日介寿堂 今为文化宫	孙 祺 257	陈后主宠姬张丽华是谁斩的	王永泉 307
地名探源		马湘兰墓辩误	陶 恺 331
细柳巷、教敷营	陆永贵 211	南京人口普查中的几个数字	李素月 300
就《小重山》词中地名答读者问	陆良庚 145	朱德赠蒋介石战马	田秋平 366
苜蓿园与红花地	陆永贵 395	汪精卫做寿生悲	远 秋 399
梅园新村一名的由来	慰 仙 398	志苑信息	
县镇专栏		《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开放	章义平 60
高淳县淳溪镇的建筑艺术	陈翼雄 415	南京七单位举办“热爱南京振 兴中华”知识竞赛	269
六合文庙	朱振堂 412	城市志指导组西安会议综述	王能伟 349
江东文物		南京千余名青年在雨花台宣誓入党	余安民 311
有关郑谦的两份文献	林善之 103	全国省级地方志刊物主编会召开	347
明代宦官与南京寺观	周裕兴 68	江苏全省地方志刊物会议召开	350
南朝梁始兴忠武王碑修复记	任 庆 63	“热爱南京振兴中华”知识竞赛试题	351
南京发现明代洪武铁权	乐 跃 26	“热爱南京振兴中华”竞赛获奖名单	411
龙潭大士阁及地基碑	管秋慧 27		
新发现的太平天国门牌及其价值	章义平 130		
园馆合璧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施善萃 132		

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 南京分公司



公司办公楼



昇州路营业部



公司经理陈雷



公司所属第二建筑
筑材料厂



公司所属新型建材设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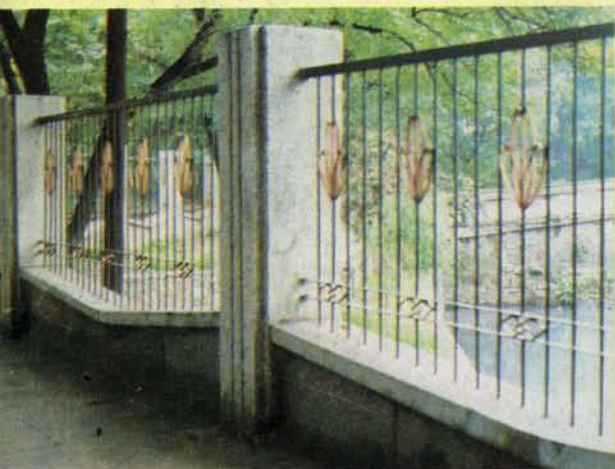
文昌巷装饰工程部及经营部

中山东路营业部

机电产品供应站



南京市玄武区市政工程管理所



护河围墙



玄武区少年宫门前彩色人行道



新改建的太平北路桥

市政工程施工机械



太平北路



整治后的秦淮河北段

